

传承

劉力身 癸巳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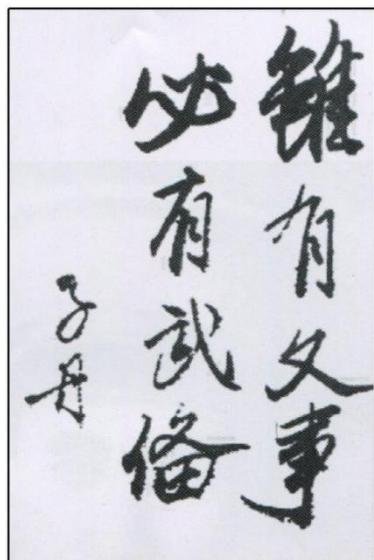
传承

劉力身 癸巳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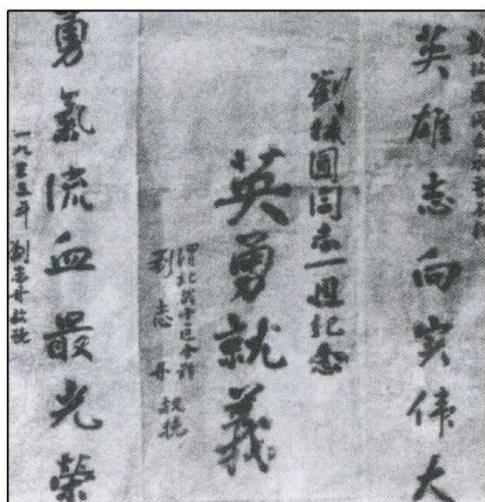
纪念刘志丹诞辰110周年专刊



『1925年刘志丹在黄埔军校』



『刘志丹进入黄埔军校前题词』



『1933年刘志丹为纪念刘林圃
牺牲一周题写的挽联』

厚矣！民族英雄
纪念刘子丹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题词』

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他
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
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
神永垂留在党与人民中间，永有磨灭的。

毛泽东

『毛泽东题词』

上下五千年英雄夢，千
人民的英雄要教劉志丹
一九四三年 周恩來敬書

『周恩来题词』

志丹軍長公志千古
紅軍模範
一九四二
五月
朱德

『朱德题词』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致志丹陵文

呜呼!古圣贤豪杰多矣，有大同之理想且为其理想实践奋斗。如我志丹同志者不多见!古圣贤豪杰道者亦多矣。与大众为一体，自以其血滋养大众之解放事业者更不多见!近百年来，世运剧变，华胄英俊，前仆后继。然而如我志丹同志奋起边地，百折不回，遂而缔造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类解放之基地，陕北一隅，成为全国与全世界所展望。奇功伟绩，实罕其伦，呜呼!非常之时产生非常之人，非常之人作非常之事。而未竟其业，陨命于无情烽火之中，此则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先进人士所同声痛哭者也，况在亲沐其光辉，受其领导之陕甘宁边区之人民乎。血不虚流，人在继起，自公死后，陕甘宁边区已成为障洪流之砥柱。陕甘宁边区人民已成为四万万人之解放最先者。陕甘宁边区军政民之组织与发展，已成为全国之模范，陕甘宁边区之民主政治，正日新而日不同。抗战之年，愈战愈勇，困难虽多，成功已近；黑暗虽在，黎明已临。此皆我志丹同志之遗留而亦可以告慰我志丹同志在天之灵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受人民之付托，继承我志丹同志之事功，发扬人民意志，厉行施政纲领，教化日新，人才日起，经济发展，民主改良，为抗日军之巩固后方，奠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伟大基础。兹当举安遗榭。万众悲歌，敢掬悃忱，敬告我志丹同志之灵，奋斗有人，光明在望，灵其鉴诸。

前 言

黄土情联谊会会长 贾虹生

2013年是刘志丹同志诞辰11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黄土情联谊会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包括这本纪念专刊的编辑。

专刊选录了刘志丹同志的诗、文，他的亲属的回忆文章和曾经与刘志丹同志共同战斗过的老前辈的回忆，以及他们的后代专门为此撰写的纪念文章。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反映了这位伟人的光辉事迹和英雄风范，表达了对刘志丹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无限崇敬和深切缅怀。

刘志丹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创建了陕甘、陕北红军，创立了照金、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通过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把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之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可靠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还在于使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指挥中心和大本营，为中国共产党真正确立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地位，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更在于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们以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毅力、超强的党性、突出的人格魅力所形成的精神财富，以及对这个党、对人民、对后人的启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品质和民族品格的一部分，而这种精神上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深远的和永放光辉并且需要不断传承下去的。

任何优秀的民族都会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不尊重自己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和未来的。而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民族，都一定会尊重和敬仰自己的英雄，因为这也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让我们永远保持对自己历史、文化和英雄的敬畏，永远不忘民族精神，永远争做合格的中国人！

目 录

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		/ 1
刘志丹诗文选录		/ 3
刘志丹谈话摘录		/ 15
刘志丹故事片段	同桂荣	/ 17
离别时分	同桂荣	/ 21
纪念父亲百岁诞辰	刘力贞	/ 24
难忘的教诲	习仲勋	/ 29
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	习仲勋 马文瑞	/ 33
刘志丹太白起义	刘景范	/ 39
初识刘志丹	戴占魁	/ 46
风雪子午岭	李建彤	/ 49
回忆红二十六军红二团	王世泰	/ 58
终南山突围		
——记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山区	王兆相	/ 62
艰难岁月几多事 但留真情在人间		
——记和刘志丹同志在神府的最后几次见面	王兆相	/ 74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10 周年	贾虹生	/ 86
父亲最敬重的人	张元生	/ 91

斯人已逝 情谊绵绵	王又凯	/ 96
恰同学少年		
——纪念刘志丹伯伯诞辰 110 周年	武 越	/ 98
刘志丹与韩练成	刘米拉	/103
刘志丹开创保安和陕甘边兵运纪实	曹东光 曹林鹏	/111
刘志丹的师生情缘	白永东	/117
刘志丹和父亲并肩战斗的日子	赵文芳	/120
刘志丹的少年先锋队	冯亚光	/122
刘志丹让父亲留在地方	谭永毅 谭元媛 谭永林	/131
父亲追随刘志丹的战斗岁月	刘海风	/138
记刘志丹二三事	张西宁	/146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10 周年	张援远	/150
端起饭碗来 想起刘志丹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10 周年	马晓文	/154
永远的怀念		
——纪念刘志丹伯伯诞辰 110 周年	李君燕	/163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张 源	/167
难忘的岁月	杨亚新	/170
一件黄呢大衣的故事		
——纪念刘志丹将军	高赛峰	/173
一幅挽幛的历史追踪		

——记刘志丹与刘林圃的革命情谊	郭 林	/174
永远的记忆	朱 红	/179
父亲敬仰刘志丹	孙晓东	/181
咏赞刘志丹先烈	赵秦胜	/183
纪念刘志丹诞辰 110 周年		
——记父亲刘培基几则难忘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刘玉兰	/184

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

志丹同志名景桂，字志丹，陕西保安人。幼聪明好学，十九岁入榆林中学，因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接受当时潜入学校之革命思潮，慨自奋发，而为前进之师友所推重。民十三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四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秋奉党命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回西北。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西安中山学院教官、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与“清党”祸起，志丹同志被“清出”部队，受党命奔走皖鄂，屡谋起义未遂，辗转归陕。十七年夏，与唐澍、谢子长同志等组织渭华暴动，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暴动失败返陕北，整顿保安党的工作，取得保安县总团总职，团聚革命力量，打击贪官劣绅。十八年，参加陕北党特委，任军委书记，曾和当时党内之投降路线斗争。秋，与谢子长等赴陕甘宁间，进行军事活动，入甘军，任团、旅长职，被反动分子发觉，缴械囚郃县。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旋经师友救释，益加奋勉工作。“九·一八”后，和谢子长同志等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指挥及参谋长。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与参谋长等职。二十一年初，成立红二十六军，志丹同志仍负领导责任。因遭叛徒杜衡陷害，致二十六军于渭华失败。志丹同志与王世泰同志等数人分途化装回陕甘边，与高岗同志等重新恢复扩大红二十六军，组织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陕甘边苏区。二十三年冬，率主力红军与陕北地方游击武装汇合，冲破敌人“围剿”，扩大陕北苏区。二十四年，先后粉碎陕甘宁晋绥数十万大军之三次“围剿”，打通陕北与陕甘边苏区，并扩大而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七军，广泛的开展了陕甘游击战争。时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西北红军在志丹同志领导下，已成为强大之红军矣。

是年秋，与红二十五军会师，任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秋末，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者之错误路线与个人野心，被构陷下狱，几遭毒害，幸党中央北来得释。于是在中央领导下参加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工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望瑶堡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二十五年率部东征，北出葭、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破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之军队不下数十营团；攻坚摧锐，所向披靡。于是年4月中旬于猛攻三交坚固工事之役，负伤阵亡。时年34岁。

志丹同志是陕甘边区与红二十六军创造者，是西北人民领袖，是党内布尔什维克之模范干部。十余年为党奋斗，始终不懈，赴汤蹈火，百折不回。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虽受人诬陷，不自矜功，宁肯自己冤死，毫不失革命立场。其艰苦朴素，知有党不知有身之优良品质，尤堪称道。志丹同志之死，是党之重大损失，亦是全国人民之重大损失。形体虽殁，其精神实炳耀千古。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一日 立

注：由林伯渠撰文、谢觉哉手书的原碑文铭刻在志丹县刘志丹烈士陵园纪念堂左侧碑上。

刘志丹诗文选录

初识榆林①

(一九二二年)

城北一片黄沙场，
城南堆堆黄土梁。
长夜寒歌多悲切，
但见月光冷又凉。

登镇北台②

(一九二二年)

红石峡③急流直下，
镇北台④狂风高旋。
看长城内外破碎，
重收拾有待吾辈。

注释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54 页。

②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55 页。

③ 红石峡，地名，位于榆林城北 3 公里的红山，始建于宋元年间。

④ 镇北台，地名，位于榆林城北 3 公里处，始建于明万历 35 年(公元 1607 年)。

爱国歌①

(一九二四年)

黄河两岸，长城内外，

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
挽弓持戈，驰骋疆场，
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
救我中华万万年。

兄弟共进②

(一九二四年)

同种兄弟心相连，
军阀列强内外患；
汉蒙携手对凶顽，
灭敌除奸争人权。

注释：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56 页。

② 刘志丹为来往榆林的蒙族同胞宣传革命而写的歌词。《喋血先锋》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 页。

为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题词①

(一九二五年)

共进！共进！
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
向帝国主义进攻！
不怕牺牲，
杀开血路！
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

高塘述怀②

(一九二八年)

秦皇逞凶强，百姓横遭殃。
老蒋欲称王，杀戮北伐将。
旗上烈士血，遗志岂能忘。
他日传捷报，祖国浴朝阳。

注释：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57 页。

②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59 页。

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①

(一九二八年)

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
加一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
要账手提桃桃子，打人不分老和幼。
如今穷人要翻身，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
大家同心一齐干，铲除土豪和财东。
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
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

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委主席：刘景桂

前敌总指挥：唐 澍

政治委员：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

注释：

①此布告是 1928 年渭华起义时西北工农革命军的布告。刘景桂，即刘志丹。

赠许唐①

(一九二八年)

二五②进军驻渭华，
插旗暴动起高塘③。
相劝许唐④结同心，
牢记当初志太行。

决心为民要共产⑤

(一九二八年二月)

二月十五夜不眠，
满月陪我上高山。
宝华山⑥上红旗飘，
决心为民要共产。

注释：

①《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58 页。

②二五，指 1928 年 2 月至 5 月间。

③高塘，即陕西省华县高塘镇，是渭华起义时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

④许唐，指许权中和唐澍。

⑤《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1 页。

⑥宝华山，即华山。

风雨夜①

(一九二八年五月)

雨刷刷，风呼呼，
今晚要杀孙敬福②。
为除人民祸根子，
割掉人民害心子。

结盟誓词③

(一九三〇年五月)

我兄弟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背叛者，天诛地灭。此誓。

注释：

①《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0 页。

②孙敬福，华县一地方土豪劣绅。

③1931 年，刘志丹到甘肃庆阳国民党暂编 13 师陈珪璋部做兵运工作，刘志丹与陈珪璋、谢子长、刘宝堂等十八人结拜为异姓兄弟，也称：“结为金兰”。结盟誓词为刘志丹起草，大家同意后，签名盖章，并宣誓。

答白冠五同志①

(一九三一年)

丹心绵绵欲诉君，

五中耿耿千秋铭。
西出阳关击螃蟹，
旭日东升满地红。

荔园堡阅兵②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陕甘儿女有豪气，
赤手空拳争权利。
今日武器扛肩上，
列队阵阵成铜墙。

注释：

①白冠五，陕北佳县人。1930年11月随刘志丹打入国民党军队苏雨生部从事兵运，并负责暗中保护志丹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铜川市政协委员。

②荔园堡，系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今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镇。

我的母亲①

(一九二二年)

从轻淡的薄雾中，露出淡红色的日光，照在一个乡村的院子里，清凉的风，吹个不休，红黄色的树叶儿，不住地从墙外飞到院子里。吱吱的蝉声，断断续续地从风中吹到耳边来，这晚秋的光景，实在令人爽快已极！我正背着臂儿，呆呆地望着一片金色的世界。小弟弟忽从身后跑来，喊着说：“二姐姐回去呢！二哥把牲口也备好了。你不送她吗？”——这是二弟教给三弟说的。

我回头一看，母亲和二姐，已经到了大门口了。我正要和二姐说话时，见母亲的眼帘中，现出许多泪痕，脸上却勉强地带一些微笑。

二姐走了，这时我完全注意在母亲身上了。我的心颤颤地动着，也无心与二姐送行了。只默默地想：“母亲向来是不悲痛的，不知今天为什么落泪？是祖母难为了她？还是父亲难为了她呢？”

忽觉得温柔的手儿，放在我的额角上。发出极慈爱的声音，问道：“儿子！你今天身上爽快吗？”我睁眼一看，原来母亲站在前面，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小弟弟的颈子上，一只手却在我的额上，轻轻地抚着。脸上现出极慈爱而且惊异的神情，说道：“你的头晕吗？怪道你今天早晨没有吃饭！”我忙回答道：“妈妈你放心，我身上爽快，头也不晕！”但是她总不相信，说我哄她，顿时她脸上现出了极端的愁苦和踌躇，站着动也不动。

这时候她的心完全放在我的身上了。我受了这种刺激，几乎要哭出来，但是怕母亲难过，却又忍住了。又不忍使母亲踌躇，所以我连忙说：“我今天早上吃的饭少，因为起得太迟了，身上并不难过。”然而她总是半信半疑，低着头儿，拉着小弟弟，到厨房去了。

不多一会，小弟从厨房里跑出来，叫道：“哥哥！妈妈叫你吃饭呢！”这时我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因为无故把母亲劳了一阵。

到了厨房，见母亲煎下醋汤挂面，已经在桌上摆好了。她说：“你快吃

些!妈妈给你煮下的。”这时我就不得不含着笑多吃一些，使母亲高兴。

母亲眼帘下的泪痕，已经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停了一会我问了母亲，她说：“并没有旁的原故，因为眼里进了一点灰尘，流出泪来。”我总不相信，但是再也问不出什么来。

这天下午，母亲忽然发起冷来，战栗个不休，面庞呈现出灰白的颜色。停了一会又是焦热，鼻孔的呼吸非常沉重。我看了她的病势，知道来源已久，今天早上二姐起身的时候，她眼帘上的泪痕，原是因为这个的恐怕她再见不上二姐——但是她不肯说出来，说出来怕我们难过。就是这时候她还勉强说：“儿呀!你们别着急了，这是今早晨受了一点凉，不要紧。”但是我哪里肯信，一定上城里找冉先生——他是我乡最有名的医生——我就不顾二和三飞也似地跑去。我家到城里有二十多里，赶到时，已经六点多钟了，恰好冉先生没有外出，但是他不在夜里走路，这却难住我了。待了半会，便打定主意，上店里雇了一头驴子，给他骑着，我牵着，恨不得一步就跑到母亲面前。让先生把母亲的病一下拾的撇了。不到两点钟，就到家里。我三步并成一步地跑到母亲房子里，看见母亲端端地坐在床上，说：“我的病好了，叫你白白地跑了半夜!”我虽有些喜气。仍忙招呼先生看脉。

看过了脉，先生便不言语，此时我就疑惑了，路上的希望失掉了吗?我只瞪着眼，张着嘴，也说不出什么来。魂灵儿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和父亲催先生开了一个药方，买药煎好了，让母亲吃下去了，但是……病却一阵比一阵重了。然而她嘴里还说：“我的病不要紧，你快歇去罢!整整叫你跑了半夜!”这时我伤心的泪，便忍不住了，她病到这个地步，还为着我!我呆呆地坐在她身边，注视着她的面庞，却是一阵红一阵白，身上抖颤得不休。真是怕人，天呀!不长眼的天呀!为什么给我母亲这样重的病呢?……

她在晕迷中，还催了我几次，叫我快休息去。

喔喔的鸡声，带些悲哀的余韵!房子里明灭的灯光，一阵比一阵暗了!我开门一望，东方既白。

我跑到医生所住的房子里，请他再来看脉，但希望与我母亲救命的人，已经走了！我气得哭。呆了一阵，把父亲吓出了声：“哎哟我的儿呀！”吓得我魂灵四散，周身软了！便不顾命地跑进去，母亲的四肢已经冰冷了！眼大睁着，嘴里还勉强地说：“玉生儿那，让我看一看！”——玉生是二弟的名儿，昨天送二姐去了。我忙抱了母亲，昏昏沉沉！不知人了什么境地！

扑扑的一声，二弟飞也似地从门外跑进来，叫了两声：“妈妈！妈妈！”母亲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两眼。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眼也合着了！这时我的心里呜呜哭号，眼里却什么也看不见。我的魂灵，已经跳入茫茫的大海了。

父亲抱住了我，在我耳旁鼓力叫了几声，我才从半死中醒了过来。乃是一片哭声，母亲已经长眠去了！只留着我们兄弟姊妹和父亲祖母的痛哭……尤其是我……

回想平时，有了难过，她替我们难过！有了痛苦，她替我们痛苦，但是现在我们……

我母亲辞世已经三天了，今天要出殡呢，就是要和我们永别！阴沉沉的天，下着几点漾漾细雨，好像我母亲告别我们，流着告别的泪……

此时母亲的棺材，已经到了门口了！于杂乱的哭声中，似乎显出母亲的声音：“亲娃娃们！别哭了！虽然……我的灵魂却是常照应着你们的。”

这时我的灵魂儿，却伴着母亲去了！只呼呼的一阵响，睁眼看时，母亲棺材已经埋入黄土堆了！天宽地阔，无母亲的儿子！何处寄托呀！

回到家中，看见一切一切，都和平常不同。随处都会使我痛哭。

我无聊极了！又跑到坟院里，只见一堆黄土，却无母亲的影儿。只听秋蝉吟吟地叫着，一会儿凉风住了，暝暝之中，见母亲依着小弟，含着笑说道：“根生你今年四岁了，再过七年，也就像你哥哥现在那样大了。”我喜极了，睁眼一看，面前还是一堆黄土！

于是我就叫了：“天呀！神呀！我愿你保佑我，愿你保佑我常在梦里与我母亲相见相亲。”

悲痛的生活，流着热泪，过了一冬了，今天是我上榆林中学的前一天。我便回想起：去年我预备到省城里考学校的时候，父亲还怕经费困难，有些犹豫不决的意思。这时母亲便说：“你叫娃去，念书是好事情，咱们在家里殷勤些，俭省些，几十块钱的学费算什么呢！”但是她背过我，却流了几次泪——怕我走远了，她要挂念呢！

后来闹土匪，路不通，终没得去，这可实在辜负了母亲的苦心了！想到这里，我就哭了，我的母亲呀！我慈爱而且有毅力的母亲呀！隐隐

之中，听见好像母亲说道：“你放心去，念书是好事情……”

呀！母亲的灵魂真是时时照着我们。爱着我们，她越爱我！我越伤心！千古的伤心。

万恶的狂风②

(一九二三年)

星期日的早晨，天气十分晴朗。我觉得校园里烦闷，便出北门，独步寻景，见那软嫩的草儿和枝头的小叶儿，都用晚春甜蜜的露水，洗净它们的笑脸，笑嘻嘻地立在朝阳之下，尽量地呼吸那新鲜的空气，以扩充它们的小肺量。一阵徐徐的小风吹来了，它们都手拉手肩并肩高高兴兴地舞着跳着，以锻炼它们的小身躯。那天真烂漫的鸟儿，在一旁唱着歌儿，以催促它们的跳舞，以恭贺它们的强健。这时我的灵魂，也似乎加入它们的跳舞会了。

我任着脚儿，自在地走着。远远地望见那碧绿色的小海女儿(指榆林北的小水湖)，被晓风微微地荡漾着，仰着那金盆似的太阳，哗哗地笑个不休。用上伊带笑的脸儿和柔媚的态度，招呼我同伊一起享受那惠风温日的大幸福！

我到了小海女儿的身边，见这蔚蓝色唯一的自然盖儿，反铺在小海女

儿的底儿上。金盆似的太阳，也跳到水里去洗澡。许许多多的水鸟，浮在这蔚蓝色唯一的自然盖儿上，唱着自由歌儿翱翔着。许许多多的小鱼儿，忽浮忽沉，洋洋自得地做它们的泅水运动。这真是小鸟儿和小鱼儿，同场运动的一个极好的机会。

这时我一切一切的烦闷，都被这蔚蓝色唯一的自然盖儿上所盛的水，洗得干干净净了！脑海中只充满了自然界中的趣味和人生的快乐！

呼噜噜一阵狂风，卷挟着黄沙，吹迷了我的眼睛，耳鼓中只有咆哮的风声和沙沙的沙粒声。这时我进退不能，只得在这凶猛势重的风沙中，呆呆地站着。只觉得黑暗！只觉得愤恨！

停了一会，风声稍息。我勉强地睁开眼睛，往时碧绿带笑的小海女儿，现在变做混浊无光的魔鬼的镜儿了！往里一看，只是苦楚！只是不自由！往时蔚蓝色唯一的自然盖儿，现在变做土黄色烦恼的盖儿了！往时金盆似的太阳，现在变做灰白色的孤星了！强健的小鱼儿不知被狂风飞沙吓得逃到哪里去了！天真的小鸟儿，不知被狂风飞沙卷到哪里去了！只留着软弱的小草儿和可怜的小树叶儿，连哭带跳地说：“苦呀！苦呀！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快乐！都被狂风飞沙剥夺罄尽了！”

我拿起精神，鼓励着它们说，只管伤痛是无用的，盼望你们赶紧召集同伴，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拼命地与狂风飞沙相抵抗。上帝的清风使者，和和平的细雨神仙，将要来了。狂风虽凶，它能敌过上帝的清风使者吗？飞沙虽猛，它能战胜和平的细雨神仙吗？到了这个时候，只有我们的自由！只有我们的光明，抵抗！快起来抵抗吧！

注释：

①志丹在榆林中学就读时，发表在《榆林之花》刊物上的一篇散文。

②刘志丹在榆林中学就读时，发表在《榆中旬刊》上的一篇散文，署名刘景桂。

刘志丹谈话摘录

“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 70 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的多……”

——刘志丹与习仲勋的谈话 1932 年 8 月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战旗上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就是要吃人的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刘志丹与王四海的谈话 1934 年 5 月

“抓革命的枪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装，是一条革命的真理，我们要革命就必须坚持武装斗争。”

——刘志丹讲话 1934 年 7 月阎家洼子会议

“我希望红军和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在胜利面前不要骄傲，要时时不忘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切实做到‘知己知彼’，紧紧依靠党，依靠苏区的父老乡亲，为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继续战斗吧！”

——刘志丹与杨森的谈话 1935 年 9 月

“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

——刘志丹与出狱同志谈话 1935 年冬

“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样才能胸怀广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

——刘志丹与习仲勋等同志的谈话

“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

“要讲爱国爱民的道理。老先生讲孝道也是可以的。孝就是尊重老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如果红军不孝顺，那就会失去民心。”

“我们办事一要方向对，二要合情合理，民众最讲这后一条。”

——刘志丹与苏维埃政府同志的谈话 1935 年

“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因此才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对同志总是以真诚对待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会计较的。我相信正直也会感动有良心的人，一定会战胜邪恶。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献出一切。”

——刘志丹与妻子的谈话 1936 年 2 月

刘志丹故事片断

同桂荣

一件棉袄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了我们家，挖了刘家的祖坟，焚尸扬骨。我背上女儿贞娃(刘力贞)逃进梢林里找红军，后经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寻找，才接到陕甘根据地南梁。我到了红军被服厂，每天缝衣做鞋。

这年冬天可冷啦，红军缺衣少盖。我想法子给志丹缝了一件棉袄。那时十分困难，无钱买布。我只好找来平时剪下的绺绺斜斜的布块，其中有新的，有旧的，有黑色的，有蓝色的，‘也有白色的，块块绺绺缝起来，几个老乡给我凑了些棉花，总算缝起了一件七花八样的棉袄。志丹穿上很高兴，说厚实暖和，我也放下了心。过了几天，他打仗回来，这件棉袄不见了。我问：“咋不穿棉袄呢？”他说：“行军中一个战士跌在河里，捞出来身上成了冰，我脱下给他穿了。”

怎么办呀？志丹又要出征走。我干脆把自己身上穿的大偏襟棉袄脱下，连夜往宽往长改了给他穿上。他问我：“我穿了，你穿什么？”我说：“你上战场要紧，我拆咱那破被子再缝！”这件偏襟女式棉袄虽然有些小，但穿上可挡冷。他在外边套了一件老山羊皮袄，也没有什么不好看。可熟悉他的人开玩笑说刘军长里面是“男扮女装”！

森林灭火

1934年腊月一天，志丹回到南梁。我见他的头发和胡子被火燎得怪难看。正张口问是怎么回事时，志丹笑咪咪地开腔了：“我这算得了什么，几个战士肉皮烧起了泡，惠子俊同志(当时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的眉毛被

全燎完了，森林起火了，我们把它扑灭了。”

原来是这样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四五百人马护送志丹和子俊到甘泉一带去。行军中，突然发现一片森林着了火，火越烧越大。

志丹和子俊很快下马，领着战士们一起挖开隔火沟，清理干柴枯叶，奋战了一个多小时，把大火扑灭了。志丹和子俊还把点火的三个放牛娃叫来谈话，批评得小鬼们再不敢耍火破坏森林了。同时对认为兵荒马乱年月何必管这闲事的一些战士进行了教育。当年参加灭火的十连一排排长王四海曾对我说：“刘军长领导我们把火灭下去，当场开会严肃地讲道理：我们怎能见火不灭呢？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有责任保护人民的财产。森林是座大宝库，天下雨离不开森林，咱红军打游击也离不开森林……”。

不唯成份论

1935年，志丹率红二十六军来到安定县。部队住在杨成生家。

那年，杨成生16岁，在中学念书。他见红军小青年扛着枪，唱着歌，生气勃勃，十分羡慕，便找二团领导要求参加红军。团里一个领导说，成生家是富农，是斗争对象，不能收他当红军。

志丹得知这一情况，马上找那位同志谈话，我们不能光看家庭成份，要看他的思想和政治表现。只要是真心革命，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我们也欢迎他当红军。经向当地党组织了解，成生在学校表现好，就决定让他当了红军。他有文化，在部队做文书工作，积极认真，连续立功。后来做了领导工作，曾任中央民政部部长助理，还任过陕西省政府顾问。在西安，杨成生每次来看我，都凝视着志丹遗像，激动地说：“是刘军长让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呀！”

关心战士

刘志丹时刻关心着战士。他经常深入到连队与战士们谈心，了解他们

的学习、生活、身体、家庭和婚姻等情况。每到一处总要设法让当地的战士回家看看父母和亲人。

1932年志丹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他率部在旬邑、黄陵、淳化、洛川等地打了50多次胜仗，游击区扩大到1万多平方公里，部队扩大到2000多人马，红军少年先锋队也扩大到四五百人。一年后，他又带部队来到旬邑，这时，这里一些地方被敌人占了。少年先锋队里有个叫师建章的红小鬼，他们村又成了白区。红军驻地离小师家隔一条大沟。志丹得知小师的母亲有病，就派了两个战士，经化装护送小师回到了家。他的父母见儿子腰里插着手枪，个子也长高了，又练下了武艺，并知是刘志丹派人专门探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风儿一传开，乡亲们都说红军到底是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在白区的红军家属更是高兴，知道自己的亲人走的是共产党的光明大道，小师老家的几个青年也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参加红军。同年志丹率红军到达南梁，建立起革命政权和赤卫军，组织穷人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当地群众编歌唱道：“日头上来端又端，南梁来了刘志丹，老刘练兵又宣传，要把世事颠倒颠。”

志丹出狱回来

1935年腊月的一个深夜，我抱着女儿贞娃蜷缩在瓦窑堡沙家巷一间冰冷的平房里。没有褥子，也没有枕头，母女俩躺在光席子上，盖着一块薄薄的被子。这要比前些天好多了。志丹被党中央和毛主席从监狱里救出，娘儿俩离开管制队，可以自由行动，单另住房，还多了一张薄被。

街上的狗又咬起来。贞娃怕得把我抱得很紧。我的心蹦蹦直跳。忽然间，手电筒光在窗子上亮了两下，紧接着有人敲门。又出了什么事？我颤着手把灯点着下地开了门。

志丹回来了，带着狱伤出现在亲人面前。贞娃看见久别的爸爸，一下子扑到怀里呜呜哭起来，并泣不成声地说：“爸爸——蛮娃吃药毒死了——我想弟弟呀！”我也禁不住内心悲伤，失声痛哭起来。他刚骨骨地站在那里，

一手抱着贞娃，一手紧抓着炕棱，点点泪珠滴在女儿的脸上。

我们5个月的儿子，是发高烧服了国民党部队一个俘虏医生给的中药死的(出事后这个军医偷跑了)。蛮娃死的消息传到劳山战场，志丹把眼泪咽在肚里，精心指挥战争，歼灭敌军数千。我日日夜夜盼望他回来，而回来了咋能哭哩。这个铁人擦干了泪水直立立地站在那里。我看见他在狱中上刑露骨的指头，想起两个儿子被活活折磨死去，不由两腿发软，眼前泪花直转，一下跌倒在灶火圪崂。

志丹不顾狱伤痛疼急忙把我扶上炕，并给我擦着眼泪说：“桂荣，你要想开些，干革命要舍得一切，要豁出自己的生命，包括亲人在内。只有站起来英勇奋斗，彻底消灭反动派，才能有我们的自由和幸福……”

鸡叫了，东边亮了。志丹坐在我身旁一边讲革命道理，一边捻麻绳。我振作起精神，和他在灯下给毛主席做起棉鞋来。

(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

离别时分

同桂荣

1936年2月，志丹东征前，夜夜和我长谈，好像要把他的心思全讲出。他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他说：“我从历史上知道，有学问的人，要干正义的事业，一定会碰不少钉子，受磨难，受挫折，受诬陷，甚至送命。但逆境也是一种锻炼，人的一生中一定会碰到有人耍手段、搞诡计，但我对同志总是以真诚对待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会计较的。我相信正直也会感动有良心的人，一定会战胜邪恶。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他特别郑重地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这一去时间可能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的。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得不够，你要谅解。”

他临走那天还问我：“我给你说的记下了没有？”我赶紧回答说：“全记下了，你放心。”他抱起孩子亲吻，并说：“你是父亲的好女儿。”

我像他过去上前线一样，望着他的身影，心里说：“他一定会胜利归来的！”

志丹的祖父、父亲对志丹从小教管很严，祖父教他要“泛爱众”、“苦其身”、“勤其力”、“立其志”……村中人都说他懂道理，有礼貌，有分寸。他很孝敬父母，他在家时经常给父母倒尿盆。他对我们家雇的长工张万银老汉很尊敬，叫他“干大”（叔父）。他组织游击队时，把张老汉的儿子张明科，和他的弟弟刘景范一起带去参加革命。他对人说，明科也是他的弟弟。他对革命同志都是以诚相待。

1930年组建革命武装，省委派来的领导人借口“整军”，突然袭击，把刘志丹所部的一位负责人当场枪毙，并命令缴枪。志丹在主席台上看着，

很是气愤，战士们都看着他，但他压下了心火，命令大家把枪交了。他自己也把枪交给了那位领导人。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火并熄灭了。1932年，志丹任总指挥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省委书记杜衡又突然宣布，由他任政委，撤销了志丹的一切职务。志丹没有作任何辩解，后来在团长王世泰和战士的要求下，才答应叫他去随军学校当教官，他没说二话接受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杜衡叛变，志丹和王世泰指挥边打边退，又重新集合起人马，在照金恢复了红二十六军。

张庆孚是上海中央1934年派来陕甘边根据地的特派员，他一来就是指责，但经志丹说服，他看了事实，心服口服，接受了志丹的意见。1935年冬“肃反”时，“左”倾分子把他也逮捕了，还说他是“叛徒”，变成了志丹的“走卒”。

志丹多次对我讲，他办事是按人的常理常情，“左”倾分子不分青红皂白，乱斗人乱杀人，常常把地主家的佣人也杀掉。而志丹把好几股土匪、哥老会、民团的头子和国民党的一些军官都团结过来了，成为革命的力量，而这却成了他们整志丹的借口。

志丹还说，群众很讲究孝道，常常分一个人的好坏，就看他孝敬不孝敬父母。可“左”倾分子硬要知识分子和父母划清界限，人家父母在国民党政府作一般的职员，也说人家是反革命，甚至把留剪发头的妇女也看成敌人，搞到了荒谬的程度。

他说，不爱父老，不爱家乡的人，说爱国爱民，是不可能的。他说残暴绝对不合乎人情，残暴恐怖的办法，不是革命的办法。如果一个人有野心，没才能，刚愎自用，又打上“革命”的旗号整人，那把革命一定搞失败，他说这是事实已经证明了的。但他牺牲前还戴着“右”倾的帽子，在这点上他一定很惋惜，可是他仍然承受着压力而奋勇去战斗！正如他平常所说：“我能忍受一切，都是为了救国。”

在延安时，有的老同志对力贞说：“你爸爸什么都好，就是太让人了，连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这一点你可不要学。”我说：“志丹正是因为有这

点，才感动了天地，才干出了一番事业。”他是顾全大局的人，以革命利益和党的事业为重的人。这样的人才能作出历史贡献，才能为人民办成好事，才是道德高尚的人。

在纪念志丹牺牲 60 周年时，我这 92 岁高龄的人思绪万千。我希望我们国家要继续搞好改革开放，发展大好形势，很快走向繁荣富强。一定把握好大政方针，千万不能再出现“左”的错误，这就是对志丹的最好纪念。

(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

纪念父亲百岁诞辰

刘力贞

今年10月4日是我父亲刘志丹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离开人世已经67年多了，去世时还不满33周岁。父亲参加革命后与家人离多聚少，只是在1934年春国民党军队抄了我们的家，4岁的我与母亲到了陕甘根据地，才与父亲相处了两年多时间。当时，父亲也是经常率领红军出外打仗，有时我与母亲也随军转移，颠簸在马背上。生活的艰苦不在话下，我半岁的小弟弟因医生投错药而夭折，让人心痛。还没过一个月，我父亲参加指挥的劳山战役刚刚结束，他就被“左”倾分子“肃反”关押起来，还挖了土坑，准备活埋。母亲也被打人劳改队，这使我们更难以承受。幸而党中央到瓦窑堡，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父亲和他的战友。父亲带着狱中被折磨的伤疤走出监狱，但他脸上仍带着微笑。没有休息一天，就投入紧张的工作。白天开会，晚上在麻油灯下写材料，母亲劝他休息，他说：“任务紧迫，时间不等人。”紧接着他下乡扩兵，筹建红二十八军。直罗镇战役，父亲又带着地方红军在外围堵截敌军。

1936年2月，他率红二十八军出发准备东征，离开的前一天，他要求母亲带我去送送他。第二天，我们刚要出门时，父亲的战友——走另一路东征的杨森来向母亲告别，母亲与他只说了几句话，当我们赶到父亲出发地点时，已经人去场空。母亲和我感到十分惆怅，然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失去了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1936年4月下旬，重病中的母亲，突然听到父亲在东征前线阵亡，她立刻昏厥过去。组织上见她如此悲痛，没有让她看父亲的遗体，只是在下葬那天，让人用担架把她抬到墓地，当母亲看到要下葬的棺木时，撕肝裂肺般痛哭，扑着身子要与父亲同去，在场的人无不泪如泉涌。当时我6岁了，这场面令人心碎，终生难忘。母亲性子刚强，心胸开阔。过后她说：“人生在世，谁无一死。你父亲为革命牺牲，就是死得其所。”为了纪念父亲，

中央在 1936 年决定把我们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1 年，又在志丹县城为父亲修了陵墓。1943 年 5 月 2 日举行了隆重的安葬活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给陵墓题词，高度评价父亲的革命业绩和高贵品德，母亲对此十分感激。她所痛惜的是父亲英年早逝，特别是他出狱时，还戴着一顶“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她一想到此，心就不由得一阵阵紧缩，泪水如注。直到 1942 年父亲才得到彻底平反。

父亲生前，我们父女相处时间虽然很短，但就在那短短时间里，在日常的细微小事中，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去世后，长辈们、他的战友们，以及见过他的乡亲们，常常说出他许多感人的事情，更加深了我对父亲的认识，这自然影响着我的一生。

父亲最感人的地方，是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由此产生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父亲的祖父与父亲都是乡村私塾先生，他的祖父刘士杰老先生，一生以教书为业，为人耿直。他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秀才，年轻时教过私塾，后在金汤镇民团作过短时副官(文书)，他在金汤镇上还开过小客店，后回家务农。我祖父开始不同意我父亲搞革命，怕惹杀身之祸，连累家庭。后在父亲的影响下转而支持革命，他卖骡子换枪给父亲。父亲的战友谢子长、阎红彦到我家养病，他杀鸡宰羊招待，走时送路费，派家人送。父亲把二叔、三叔，我家长工都带到游击队，搞得家中连个男劳力都没有了，祖父只得带着儿媳干农活。1934 年春，祖父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国民党军队抄了我们的家，烧了房子，掘地三尺，挖了祖坟。幸而事先得到消息，全家人出逃进了梢山，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得知后，派游击队员把我们全家接到根据地。父亲见了祖父说：“儿子不孝，让父亲受苦了！”祖父却说：“你做的事是为国为民的大事，对着哩！”

母亲见到父亲，诉说我们钻山水洞受的惊怕。父亲却说：“这次敌人‘围剿’乱杀乱烧，你们能逃出来就是大幸。”

父亲虽然是总指挥，但处处与大家一样，他对母亲说：“红军没有人带

家属，你来了，也要参加工作，去组织周围村妇女给红军做被服。”母亲心灵手巧，又在部队学会做军旗。部队物资缺乏，父亲对母亲说：“做军服剪下来的布头，要留下，可补衣服用。”同志们受了伤或是生了病，母亲就去照顾。我们的窑洞，既是卧室，也是父亲开会办公的地方，父亲的战友们来开会，父亲总是让母亲做好吃的。母亲的拿手好饭是羊肉哨子、剁荞面。直到解放后，老同志见了母亲还说：“我们还想吃刘嫂子的剁荞面。”

有的乡亲以为父亲当了总指挥，就想捞好处，家门中他的一位叔叔到游击队想当个什么“长”，父亲让他去当战士。教育他说：“干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想当官就别来，要来就要吃苦，就要不怕死。”我的两个叔叔，还有家门的叔叔，到红军后都是先当战士。

父亲对红军指战员关怀备至，待他们亲如兄弟。部队行军到了哪个战士家附近，就叫给两块大洋让他们送回家去。老百姓都说：“把娃娃送到老刘那儿，我们放心。”行军打仗时，他常把马给走不动路的小战士或伤病员骑。有一次，宣传干部孔令甫腿受了伤，父亲与杨森同志亲自抬他。孔令甫后来一见人就说：“太难为了总指挥。”游击队生活艰苦，有一次一个同志打仗把棉衣丢了，父亲就把自己的棉衣脱给他穿。母亲看见了，就又把身上穿的花棉袄叫父亲穿在里面，她赶紧找布拼凑着给父亲再做一件新棉衣。王世泰叔叔回忆说，一年冬天，他与父亲同盖一床被子和一个棉大衣睡觉，世泰叔叔小父亲7岁，个头高，他睡熟后把被子全裹到他身上，还伸腿放到父亲身上，父亲被冻醒了，但他怕耽误了世泰叔叔睡觉，自己就披上大衣睡。红军作战休息好很重要，因此每到一宿营地，父亲总是前后看，同志们的吃饭是不是安排好了，有时还亲自为部队同志炖羊肉。他不仅关心同志们的生活，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一有空就教小战士认字，还亲自教他们射击、骑马。有一次战士教我骑马，马惊了跑了一里多路，但我没有摔下来，父亲看见，先惊后喜，说：“我女儿练出来了。”他还与战士摔跤，有的同志遇到不开心的事，他去开导。出了毛病，他善意批评教育。有的战士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骂人家是地主的“龟孙子”，还说

“那种人不能参加红军！”父亲说，“出身不由他，但走什么路可以选择。只要有觉悟，为什么不能参加红军。”富农家庭出身的杨成森同志就是父亲批准参加红军的，他表现很好，解放后当了民政部部长助理。

父亲时刻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他治军严格，亲自为部队起草了十八条军纪，让战士们背熟，遵照执行，并率先垂范。父亲自己有了过失，主动请罚。一次，父亲与战士练习摔跤，不小心把战士摔伤了。父亲主动请罚下厨做饭三天，战士们说这三天的饭特别香。都说：“老刘厨艺也呱呱叫。”红军行军打仗，从不骚扰百姓。缴获敌人的物资，除武器外，粮食、衣物大部分分给穷苦群众。在打靖边的路上，父亲听说当地群众缺粮，就让部队多吃南瓜省下粮。军队行军遇到森林火灾，父亲亲自指挥灭火。红军纪律好、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把红军作为自己的子弟兵，争着为红军送信、带路、抬担架，红军不论到哪个村子，群众总争着把红军带到自己家中住宿。

父亲全身心投入革命，他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失败的痛苦，但他从不灰心，而是把失败作为成功之母。他深知书本上的知识，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1928年渭华起义中，他看我军牺牲很大，很痛心，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对得起烈士，要继续前进！”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决定到敌人统治薄弱的黄土高原搞武装斗争。回到陕北后，一天一天壮大了人民武装。

父亲深知，为人民打天下，不是少数人能完成的事业，要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说朋友越多越好。他不仅在劳苦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还团结了陕甘“哥老会”许多“大爷”，例如永宁山的马海旺，他主动支援红军，常来我家，后来当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他的孙子至今与我们还来往。黄龙山“大王”郭宝珊被父亲争取过来参加革命，解放后当了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红军时他常来我家，他的孩子和我们至今是好朋友。那时不叫“统战工作”，叫“交朋友”。这也是实践要你这样做的。

父亲去世时，他的皮包里只有 6 支香烟、半截铅笔。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物，他干革命后家也被敌人抄了。但是，他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就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还有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高贵品德。今天，时代不同了，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大局为重的品德，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宗旨不能变，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国富民，为党争光。

(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

刘力贞(1929 一)女，陕西省保安(今志丹)人，刘志丹女儿。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历任西安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院长、陕西省第五至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难忘的教诲

习仲勋

我一算今年是刘志丹诞辰 90 周年，很想写一些纪念的话。

两当兵变失败后，1932 年 7 月间，我在耀县杨柳坪找到了陕甘游击队。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我们一见面，刘志丹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很理解我的心情，他鼓励我干革命不能怕失败。他亲切而深刻地告诉我：“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 70 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

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他比我大 10 岁)，从工作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我。1933 年，我只有 19 岁，他见到我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又会做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他让我多作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他离开照金根据地时，把他的特务队(警卫队)留给我，要我们继续扩大游击队，除了保卫根据地，还可以给红军补充兵员。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我按照他的指示去工作，确实有效。我们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作了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我们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

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1934年，我们在南梁(今甘肃华池县内)建立了革命政权，我被选为革命政府主席(后改为苏维埃政府)。建立政府时，志丹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因为我在照金作过政府副主席，在这里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选了我。志丹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一次，他正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看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并向我敬了一个军礼，欢迎我给大家讲话。一时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事后他对我说：“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他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20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志丹同志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他是和群众紧密联系的模范，陕甘边的一山一水他都熟悉，大村庄有几口锅，能容纳多少人，他都能说出来，大家说他是“活地图”。在反“围剿”中，我们常打胜仗，就是因为我们有群众，敌人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敌人进来，见不到人，什么也问不到，像瞎子，只能挨打，不能招架。

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洁当做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

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我们定了法，贪污 10 块大洋就要枪毙。

这年十月革命节，要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结果只花了一点钱。群众来得多，又敲锣打鼓，十分热闹。

志丹同志十分注意经济工作，一开始就让根据地建立集市，欢迎白区商人来经商。他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农忙时，红军要帮助农民耕地、收割。”我们在边区还发行了用木版洋布印的货币，把经济搞活了，物资广为交流，干部用上了手电筒，战士用上了洋瓷碗。

志丹爱护战士干部是有名的，他平等待人，大家很少称他“总指挥”、“军长”，而是称他“老刘”。有一次，一个小战士也叫他“老刘”，我马上说他：“这娃一点礼貌也没有。”志丹笑着说：“那就得叫我伯伯了。这不成了家长。”我说：“不是，不是，应该叫刘总指挥。”志丹说：“这不是太啰嗦了吗！”所以，“老刘”就成了大家对他的称呼。

说起来，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 80 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 90 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原载《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24 日)

习仲勋(1913—2002)陕西省富平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 年 4 月 2 日在甘肃领导了两当起义。1933 年 3 月起，历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关中专署专员、关中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米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军政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当选为第五、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委，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

习仲勋马文瑞

今年10月4日，是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我们现在已是85岁以上的人了，虽然有些事已过去60多年了，但他所作的仍然深深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更让我们想念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日。例如他善做团结工作这一点，就难以忘怀，在今天仍值得重视和学习。

—

大革命中，志丹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工作，冯很赏识他，看他 是西北人，就派他去马鸿逵的第四路军任政治处处长(也是党代表)。志丹 说服马鸿逵脱离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支回民骑兵军队)和军阀主义，用 新思想和新方法训练军队。马鸿逵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志丹的具体指导下， 很快使这支军队的素质得到了提高，在参加解围西安之战中，显示了威力。 又出兵河南，攻打北洋军阀吴佩孚，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7月，国民 党反共“清党”，志丹被驱逐出冯军，但他已在这支军队中交了不少朋友， 例如第四路军的一营长韩练成，志丹见他本质好，就向他讲革命道理，要 他做革命的人，不久他加入了共青团。志丹对他说：“不管在哪里，不管跟 着谁都不要忘记做革命的人，处处为民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绝 不做反对革命的事。”韩练成此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并升为中将， 但始终记着志丹的教诲。他利用自己的身份秘密为党送情报，为我军华东 的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作了贡献。解放后，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被 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他1984年病逝前，汪锋同志去看他，他深情地 说：“刘志丹将军为咱西北培养了大批人才，我是从他那知道要走革命道路 的。”马鸿逵后来追随蒋介石，彻底失败，逃到台湾，被任命到阿富汗作“大 使”，客死任上。死前对随从人员说：“我没有听刘志丹的话，落到这样的

结果，一言难尽……”

再如刘保堂，在国民党甘军陈硅璋部任旅长，志丹小时和他同过学，志丹到陈部作兵运工作时，就和刘保堂进一步交朋友，无所不谈。后刘保堂想加入红军，志丹说，“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他一直暗地为党工作到抗战中期，1941年被敌发现，设计暗杀了。但在他军队中的进步军官后来都参加到革命队伍，他的子女都参加了革命。他的长子刘汉说：“我父亲在世时，常教导我们要学习做刘志丹那样的人。”解放战争中我军抓住了杀害刘保堂的凶犯张廷芝，公审枪毙，为他报了仇。志丹还给当时在敌军担任团长的左协中、曹又参多次写信，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走向革命，抗战后期他们率部起义了。他们还保存着志丹给他们的信，拿出来说：“你看，这可是大手笔呀！大道理小道理都感人至深。”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

再如牛化东，大革命中，志丹两次派他去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第二次他不想去了，说：“正人披上狼皮，太不光彩了。”志丹对他说：“你那边军队中有关系，有条件为党工作。这就是在敌人营垒中闹革命，外白内红，同志们最后会理解你，会对你苦心孤诣的工作，给以加倍的欢迎。”他长期隐蔽于国民党军队中，后任国民党邓宝珊部新编11旅的团长，1945年10月，参加领导了该旅的起义。解放战争中，牛任该旅副旅长，领导部队浴血战斗，作出了重要贡献。牛化东常对人说：“我在敌人军队中隐蔽了20多年，这是刘志丹给我做的思想工作，也是他给我教的工作方法。”

大家知道，志丹也做哥老会的工作、绿林好汉的工作，使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了革命，成为党的著名干部，如马锡五、郭宝珊等。他曾使民团团总马海旺走向进步，后来成为边区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受志丹教导或影响参加革命的真是成千上万。志丹常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

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样才能胸怀扩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回想起来，我们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的思想分不开的。

二

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志丹也是处处讲团结的。当然，他的团结是有原则的。但怎样运用得好，这是个思想水平的问题。

30年代初，他和其他同志辛辛苦苦组织了游击队，但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使下，中共陕西省委的几位领导，来到游击队总是说成分不纯，不打阵地战，搞分田不彻底等等，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以至撤职。按理讲，他的主张是对的，又有兵权，完全可以不听他们的话，但他在不能说服他们的情况下，接受了他们对他的错误处理。同志们不服气，要闹。他劝同志们要有耐心，不要闹。这就是因为他从大局考虑，如果一闹他们就会说是反党，在敌人面前造成共产党的分裂，这更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存在。他在被领导的岗位上，仍对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尽量减少“左”的危害。因为许多指战员仍听刘志丹的建议，“左”的领导也不得不听从他的一些建议。例如省委代表李艮要求游击区土改，而且限期20天内搞完。志丹说不行，农民也说，“分了田，你们一走，敌人会报复残杀我们”，不要分给他们的地，这才使李艮罢休。打阵地战，死伤了同志，也保不住阵地，这才教育了他，不敢再胡指挥了。这时刘志丹再去劝说，他才有了转变。

志丹对事不对人，不因李艮整了他，就对他记恨，而是说他是学生出身，没有经验，实践会教育他，我们应当帮助，而不应反目成仇。他还用李陵、杨修、李岩等历史故事，告诫同志们，说事物往往是很曲折复杂的，自己要有精神准备，要受得起委屈，要不变革命初衷。

1933年，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又撤了志丹的职，强令部队

南下关中，遇到强敌“围剿”，结果全军覆没。志丹和王世泰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挽回败局。这时有的同志责怪刘志丹没负起责任，志丹一点也不为自己解脱，他说：“现在我们赶快用各种办法，联系失散的同志回根据地，重建部队。”他又说：“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葬送了，他又叛变投降敌人了，这是对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事情未经历过，总是不深刻，这下我们就知道‘左’是什么东西了。”剩余的同志返回根据地后，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革命家。

三

志丹在党内斗争中很讲艺术，1934年7月，中央北方局代表有两个指示，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挑起矛盾。但在会上，志丹回避这些指责，引导大家讨论当前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使会议有了团结气氛，决定了粉碎当前敌人“围剿”的方针。这年还从中央来了一位代表叫张庆孚，他一来也是批志丹的“右”，但志丹耐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带着他看事实，使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央的说法是不对的。后来“左”倾分子把他也关了起来。最使人难忘的是在1935年西北根据地在志丹的领导下，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解放了6座县城和广大农村，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地扩大了西北根据地和革命军队。但“左”倾分子却把他诬陷为“反革命”，要逮捕他。当通信员把逮捕密件送到他手中后，他以光明磊落的气魄，单身回到瓦窑堡，到保卫局澄清事非，但他们不容分辩，立刻把他投入监狱并欲杀害。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到陕北后，才救他出了监狱。但由于中央刚到陕北，短时间难以澄清全部事实，因此虽然平反了“反革命”罪名，仍然留有犯“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这件事他一直未对任何人讲过。只是在东征出发前对妻子同桂荣说：“这次出征对我仍然是一个考验，事实会证明一切的。如果我死了，是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牺牲的。”他牺牲后，他的夫人才想起这句话的分量。直到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才为志丹

彻底平了反，认为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在党内的斗争中，可以看出，虽然他是领导者，也是群众心目中的领袖，但他更有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唯我独尊。他常说，自己也犯错误，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就是犯的大错误。虽说那时党还处于幼稚时期，但从个人来说，还是年轻气盛，感情冲动，而不能理性思维，空想就会走到“左”的方向。他说要避免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他没有一点架子，大家见了他都如兄弟。内部的事，对他不利，他都能忍耐，再危险、再困难的事他也勇于承担。“左”倾分子在狱中拷打审问他和杨虎城部旅长张汉民(共产党员)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来往？志丹知道这是寻找“罪证”。他说：“张汉民是好同志，只有我一个人和张汉民有来往。别的同志根本不知道他。”“左”倾分子说张汉民是反革命军官，你和他勾结在一起，就给他增加了一条“勾结国民党军官”的罪名。这样，就保护了和张汉民有关系的其他同志。

志丹能听进不同意见，所以他少犯错误，有了错误也能很快纠正。他办事总是和大家商量，几次打仗，命令已下了，同志们根据新情况提出不好打，或者损失太大，他马上改变。有的人违犯政策，他要处分，同志们反映这个同志是偶犯，或者过去立过功，他就改为从轻处分。

正因为如此，在他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时候，党内是团结的，注重统一战线工作是成功的，革命事业是有成绩的。我们今天纪念他，继承他重视团结工作的思想，善于做团结工作的方法，我们相信，在新的时期也会起大作用。

(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8日)

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子洲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绥德县委委员、团委书记、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陕北特委

委员、共青团特委书记、南路特派员。1933年在佳县、神府、三边开展兵运工作。后在南梁军政干校任政治教官。1935年任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陕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分区、庆环分区党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三八五旅政委、中共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兼西北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西北局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西北局副书记、国家劳动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委、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至第七届委员，全国人大第四至第六届代表。

刘志丹太白起义

刘景范

永宁山是保安县(今志丹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政府就设在这个山上。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进行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也在这座山上。

1930年9月14日的黄昏。保安县永宁山国民党的民团团总曹力如，(永宁山中共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坐在炕桌边，一面看着几封向他打听刘志丹的信，一面自言自语地叨念着：

“为什么还不见消息？……”

忽然门外喊了一声：“报告！”曹力如抬起头，一个站岗的团丁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说：“外边有个人要见团总。”

曹力如警惕地收起信件。问：“是什么样人？”

“穿一身蓝布衣服，头上戴顶大麦秆草帽，中等个子，瘦瘦的，深眼窝，高鼻子，看来有二十几岁，口音象本地人。”

曹力如笑了笑，心想：一定是刘志丹同志，这个新来的团丁不认识他。忙说：“快请他进来！”

曹力如忙下地，抢先跑了出去，一把拉着刘志丹的手笑着说：“老弟，我正在念算你，你就来了。真是说起风就是雨。”

刘志丹笑道：“雨是雨，就是不及时。”

刘志丹进门把草帽往桌上一扔，坐在炕沿上。曹力如从文件箱中拿出几封信递给刘志丹。刘志丹靠在炕桌上，左手托着额角，翻着从宁夏、榆林、延安等地做兵运工作同志的来信。

两个老友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儿。他们谈起今后如何继续开展兵运工作的问题。

刘志丹说：“党要我们搞兵运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组织自己的武装。根据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南方搞武装的经验证明：革命的武装必须是在

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形成和生长起来。我们必须趁目前边界敌人力量空虚的机会，瞅准目标，坚决地消灭他们，搞起自己的武装，打游击……”

“可是，人、枪一时可搞不起多少呵！”

刘志丹思索了一阵，一字一板地说：“哪里能抓就抓一把。人还是有，两个月前在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搞兵运工作的卢连长、刘连长、老杨都可以找回来呀！干革命的人，不下决心可不行呵！周围这些反革命武装，我们为什么不想法先搞它个把呢！”他沉思一会儿，又盯着曹力如问道：“周围这些民团，我们掌握哪个情况多？哪个武器好？”

“比较起来，还是太白民团的情况了解的多些。据说他们都从寨子上搬到街上来住了，住的很分散。民团改编为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后，对老百姓勒索的粮款更多，听说最近还打死几个老百姓……”

谈到半夜，曹力如送刘志丹到另一个房子去睡了。

早晨，曹力如走进刘志丹住的房间，看见地上扔满了烟头。刘志丹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两手盘在胸前，靠在罗圈椅上。一双沉思的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

“昨晚睡的好吧？”曹力如用亲切的口吻说。

刘志丹扭过头来向曹力如笑了笑，拿起两个哈德门烟的空盒子说：“这就是昨晚的成绩，我给你们站了一夜岗……”

开会前，卢连长、刘连长，马福记等七八个同志，陆续集中到永宁山团聚。

还有从宜川、延安、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的贺彦龙，魏佑民等四、五个同志。

刘志丹和这些同志们商谈如何搞武装的事。恰好，老杨也从庆阳回来了。他对刘志丹说：“我在三道川脱险后，逃到庆阳，见到了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谭世麟还假仁假义说，要我把你‘招抚’回来，还是担任他的骑兵第六营营长。咱们骑兵第六营搞兵变的事，他一无所知，同时他还把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的王营副叫来，当面交代，要他协助这件事。王营副

也奉承说，他听过你讲话，很佩服你，……”

刘志丹听完老杨这一席话，沉默了一会，就笑着向老杨说：“‘招抚’？看谁招抚谁！老杨，我们这两天正愁没法搞他们，你倒给咱带来了办法。”他又回过头对曹力如说：“力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象有了，办法也有了。”大家商量了很久，第二天，曹力如把这个计划报告党支部作了研究。决定将计就计，一面派老杨再去太白镇通知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要他们准备粮草，骑兵六营随后就来，先稳定敌人。

刘志丹和其他同志分头集合人马，屯积粮草。他们设法从永宁山民团和公安局抽出一些枪支和马匹，加上同志们从各地带来的，一共凑起长短枪二十支，战马二十多匹。此外，还赶做了一些军衣和旗号。

过了两天，人马调齐了。一天晚上二更时分，刘志丹带着这支二十多人(其中有十多个共产党员)的骑兵部队，静悄悄地从永宁山出发了。天明以前到达距永宁山四十里路的白砂川。

白砂川，古来是个大镇，经历代战争的破坏，现在只住着几家穷人。周围森林繁密，前些年，除了土匪以外，很少有人来往。

第二天早饭后，刘志丹向全队作了动员以后，把队伍带到村子外面的野地里，进行临时训练；不会打枪的人学着打枪，不会骑马的人练习骑马，然后，又练习了突然袭击敌人及收缴敌人枪支的动作。

9月28日拂晓，趁着云雾弥漫，刘志丹带着所谓“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从白砂川出发了。通过森林，队伍沿葫芦河前进。刘志丹骑着一匹铁青色的高头大马，全身穿戴着民团军军官服装。一个战士打着一面“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子走在先头，后面一长串人都穿着民团军的军服，骑着各色各样的战马，当天下午，队伍进了太白镇。

太白镇是合水县东边的一个小镇，镇上有两条东西交岔的斜街，中间有一条河流，街上有不少开店的，街的东南头有个烧坊，掌柜的外号叫“蒜客”，刘志丹的军队这天就驻在蒜客的烧坊里。

蒜客官名叫李绪增，约五十多岁，此人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人都

称他绿林好汉，也喜欢交往一些闹革命的人。

他老早就和刘志丹认识，很佩服刘志丹的行动。许多做革命工作的人，路过太白镇都住过他的烧坊。蒜客见了刘志丹的面，就讲起：太白民团团总黄毓麟(外号黄二子)，他的官兵常上酒店喝酒不给钱，因此他对黄二子十分不满。

当天晚上，在黄二子营当兵的赵连璧，(我们派到这个营工作的同志)托喝酒为名来找刘志丹，他报告了关于黄二子部队内部的具体情况。

从9月29日的早晨，到30日晚上，除了刘志丹、老杨与黄二子、王营副打些交道外，其余的人员分别进行了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工作。在和他们接触中，一面虚张声势，扬言后面还有许多部队要来，一面侦察对方的动静。

30日晚上，在蒜客的烧坊里，几个负责同志，详细研究了黄二子营的具体情况。提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因此，决定：刘志丹和老杨把敌人的营长和营副活捉起来，要他们下令部队缴枪；如果活捉不成，就先打死这两个坏蛋；同时由卢连长负责带几个同志与敌第一连的官兵联欢，伺机收他们的枪；蒜客负责准备酒菜。

10月1日早上，太阳刚出山，浓雾还没有消散，刘志丹、老杨、赵副官(他化装传令兵)来到王营副住的房子里。刘志丹和王营副拉了几句闲话以后，接着很认真地说：“王营副，我们马上又要来一百多人，怎么住法？……还需要些粮草，想和黄营长商量一下。”

因为两天来彼此已经很熟，王营副想了一会就写了个条儿，派护兵去请黄营长。这时，刘志丹给赵副官使了个眼色。

赵副官领会了刘志丹的意思，立刻跑到烧坊里，告诉卢连长作准备。过了一会，黄营长来了。他走进房子，与刘志丹打了个招呼，然后坐了下来。

刘志丹的护兵路四，别人称他为神枪手，这几天，他已经和黄二子、王营副的护兵搞得挺热火。王营副的护兵很狡猾，路四叫他小兔子，黄二

子的护兵是个大个子，路四叫他大汉。这时候，路四一面放哨，一面和小兔子说话。小兔子把大汉叫到房里去。路四便在门外偷听。只听小兔子说：“王副营长要我们注意，不对就先下手……”大个子说：“我听营长说，营副胆子太小，他们都是细腿子(指刘志丹他们都是些学生出身)，敢把咱怎样？”小兔子骂大汉太傻。

说着，两个人走出房来，站在王营副的门口，动也不动。路四着急了，拿出一包哈德门香烟，向大汉说：“请你和你的伙计来抽烟。”

大汉拉着小兔子的手跑来。路四递给他俩每人一支烟说：“吃吧！这是营长给我的。”

三个人在外边，边抽边谈论。

屋里的王营副端着大烟盘子，让刘志丹和黄营长上炕抽烟，刘志丹再三说不会抽，只有黄营长爬上炕去。刘志丹正盘算怎样下手。突然外边叭的响了一枪，紧跟着赵副官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黄营长，你的兵变了！”

王营副听说兵变，正要掏手枪，刘志丹抽出枪对准他的脑袋“叭”一下子，结束了他的性命。黄营长正忙着爬起，又被老杨一枪打死了。

原来刚才那枪是路四打的。路四正在外边和两个护兵谈着，小兔子一溜烟跑到马棚里备了两匹马，路四问他：“备马干什么？”

小兔子胡乱支吾。路四见势头不对，心想不能让他跑掉，正在着急，刚好赵副官走进院子，他忙向赵副官使了个眼色。

赵副官点头示意后，路四一枪打倒了小兔子。把大汉吓得把枪一扔，跪下哀求饶命。

这时候，在蒜客的烧坊里，院子里，摆着好几桌酒菜。卢连长和几个同志都提着酒壶给黄营的官兵灌酒，有些人已被灌得醺醺大醉，东倒西歪，没醉的还在一心一意地红着脸划拳喊叫。

卢连长听见枪声，把酒壶一丢，用枪口对准敌人大喊一声，“缴枪！”所有的人都把枪口对准了敌人。

这时，赵连璧举起枪大声说：“弟兄们！刘志丹的军队是咱们穷人的军

队，咱们都是受苦人，还是跟他们走吧！”

敌人的连长楞了一下，准备抵抗，被卢连长一枪打倒。其他敌人乱成一团，有的钻在桌子底下，有的把枪甩下跑了。有的还在顽强抵抗，双方对打一阵，才把敌人消灭。

刘志丹他们几个人，完成任务后，急忙往烧坊里走去。刚出大门，迎面跑来四个敌人。刘志丹喊声：“缴枪！”四个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当刘志丹赶到烧坊时，这里的敌人基本上已消灭，少数敌人钻到了老百姓的草堆和坑洞里，也被搜出来了。仅在蒜客烧坊里就缴了四十多支枪，二十五匹骡马，三十头毛驴。

黄家砭的敌人第二连，听到街上枪响，都冲出来向山上跑，这时，卢连长又带着人马从烧坊赶来，和魏佑民一块，带了二十多个骑兵追上去打了一阵，缴获了几匹马、几支枪，其余的敌人跑散了。

中午，太白战斗胜利地结束了，太白人民的祸害消除了，红军准备出发，镇子上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挤在街上看热闹。刘志丹给群众讲了几句话，就带上队伍向林锦庙急进。走到距太白镇三十里路的枣刺砭，恰巧碰上敌人第三连连长马建有的两个随从兵在道旁蹈马，刘连长缴了他们的枪。问道：“你们连长呢？”“在这里逛‘破鞋’。”

刘连长带着人跑到一个“破鞋”家里，捉住了马建有，把他捆在马上。当晚二更时分赶到林锦庙，马建有被迫缴出了自己的全部枪支和马匹，然后把他释放了。

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六十多支，骡马几十匹。有十几名俘虏也自动地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天晚上，战士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吹号的吹号，打鼓的打鼓，庆祝胜利，互相比较着缴来的枪。他们说：“这下我们可有了枪了！”

以后，刘志丹领导着这支武装，在合水、保安、安塞一带开展了游击战争。队伍也迅速地壮大起来。

刘景范(1910—1990)陕西省志丹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队长。1933年组建保安游击队，任队长。1934年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1935年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年7月任保安县委书记兼县长。1937年后，历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边区政府副主席。第一野战军前委常委、后勤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党组书记、婚姻法贯彻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初识刘志丹

戴占魁

1930年秋，在我还是个放牛娃的时候，就听说过红军，听说过刘志丹同志领导红军打倒军阀和地主的故事。很幸运地，因为一匹马的关系，我能有幸结识这位威震陕北的将军，后来我在战斗中受伤，将军还亲自过问我的伤情，并安排我去养伤。

那个时候，我在崖寨村给一个乡绅白兴田家放牛。刘志丹同志带领骑兵队伍，从太白镇川北，到了崖寨村，临时驻扎。我刚刚吃过早饭，还没有把牛放出来，骑兵队伍就进村了。下了马以后，就喊：“放牛娃过来”，他们让我去溜溜马。我捡了两匹大马，在村子前面土台上遛着马。当时对我这个放牛娃来说，红军是很神秘的队伍，只是听别人说起过他们打仗有多不怕死，经常打胜仗，我对他们这支队伍充满了好奇。我看见骑兵队伍的人员都背着枪，褂着马刀，有穿黄灰色衣服的，有穿蓝色和黑色的，衣服穿的很不统一。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左胳膊上都扎着一条红绸子布。其中像是带头模样的人向老百姓宣传说：“老乡们，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已经把太白街的黄二狗子和王营长队伍的枪没收了，并且把黄二狗子和王营长都枪决了，给你们除了害。你们以后再也不用给他们的队伍送粮草交税款了。你们联合起来，抗粮抗捐税，你们敢不敢呀。”院子里的老百姓半信半疑，谁也不敢说话。骑兵队走了以后，我才听说这

就是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队伍。而我溜的两匹大马中其中一匹就是刘志丹同志骑的马。当时我很高兴，也算是一种和中国革命、和刘志丹同志的一种缘分吧。我也在心里下定决心，以后也要像刘志丹同志那样，扛起枪，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骑兵队，把太白街的恶霸头子黄二狗子和土匪头子王营长消灭了，真是为我们除了大害。黄二狗子是甘肃军阀刘宝堂的二十四营营长。他和土匪头子王营长部队合编的队伍，一共有二百余人和马匹。

他们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这次他们的人和马匹，都被刘志丹的红军队伍消灭了。战斗进行的很顺利，除有个别的逃窜外，其余全部编入红军。太白街酒厂老板目老先生，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骑兵队伍在崖寨村吃过饭后，就出发向葫芦河川北上到二将川林锦庙寨子途中，又收缴了敌人第三连连长马建有部队的枪支马匹。随即急行军到荔园堡，消灭了驻扎在荔园堡的张廷芝部的梁帮东的骑兵营，并击毙了土匪头子梁帮东。至此刘志丹带领的骑兵队伍，两天打了三仗，消灭了敌人两个营加一个骑兵连，由三十人的骑兵队，一下子发展了几百人的骑兵队和步兵队伍。三战三胜以后，就向陕北保安县挺进了。

刘志丹同志领导的这支红军队伍，就活跃在东华池川、豹子川、白沙川、平定川、葫芦川、西上庆阳县的方圆三百多公里地区，打击敌人。华池川到葫芦川就成了红军队伍往返的必经之路了。以后当地群众有一个歌子，流传至今。歌子是这样唱的：“歌颂刘志丹，三十匹马队两杆号，一杆红旗空中飘，刘志丹的队伍，又来了，穷哥们都喜欢迎。”

1933年正月我参加红军，在陕甘边庆阳红军游击队跟着刘志丹同志参加了很多战斗，1935年的6月份，那时我已经是一名游击队长。红二、三团、骑兵团和义勇军攻打镇靖城那天，天刚亮，战斗就打响了，我队一马当先登上城墙上，打击南门楼上的敌人。我带的这个小队都是娃娃兵，一刀一枪同敌人拼，在战斗中我受了伤，头部擦掉一层皮，左脚被子弹打穿了。当时由于战斗还在继续，我就和牺牲的战友们躺在了一起，由于风沙大，再加上口渴，流血过多，我昏迷了过去。大概中午时，部队打进了县城，消灭敌人数百人。战斗结束后，部队打扫战场，把我和其他受伤的同志背到街上房檐下。过了一会儿刘志丹总指挥来了，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伤情，并让我静静养伤，然后让通信员把他的马牵来让我骑上，我一看这就是我一年多前当放牛娃时溜过的其中一匹马，然后把我送到了河西边的村子里，交给赤卫队，后来他们又把我送到安定县白庙岔老乡家里养伤去了。

刘志丹同志的一匹马，我的一次遛马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看到了红军队伍是真真正正的全天下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在我心里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使我更加认识到刘志丹同志是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倒军阀地主，让老百姓翻身做主人的革命领路人。从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刘志丹同志的形象将永远伴随我！

戴占魁(1914—1988)甘肃华池县人，1933年2月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陕甘边庆阳游击支队一大队队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连长、七十八师特务连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南军区特务营长、军区教导队中队长、七旅十九团三营副营长、南宫县独立营营长、十三旅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凌源县支队队长、热东地区武装部部长、四野四纵独立师十五团团团长、四野南下干部团大队长、五十三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职。1958年离职休养，副军职。

风雪子午岭

李建彤

打罢太白镇，在永宁山只住了一夜，刘志丹就把队伍带到保安、安塞的交界处，打了几家土豪，给穷人分了东西，队伍扩大了，就撤到永宁山南边的瓦子川，在石崩湾安下指挥部，竖起“人民革命军”的旗帜，摆出阵势，要在这里扎根。队伍撤出去几条川，康家沟、蔡家砭、刘家老庄、定边集、旦八寨子附近，都有人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些地方老百姓被欺压怕了，见了兵就逃跑。开始刚到，战士们吃完饭，把钱放在锅里，还写个条子：“我们是人民革命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买公卖。”然后又满处贴上标语：“推翻旧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穷人要翻身”“打倒土豪劣绅！”

不管认字的，不认字的，都偷偷跑去看。那些留下看家的老年人，见军队不打不骂，不抢东西，说话和气，进老百姓屋子，先在门外打招呼，就认定“这是好人中的好人”。不等动员，就跑到梢林里找家里人。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跑反的人都回来了。开了会，拉了话，打了土豪，又分牛羊牲畜。群众再不害怕，还拉着战士，要拈香“拜把子”，一生一世做弟兄，这是这里的风俗习惯，照他们的想法，拜了把子，才是最亲的人。有的叫他们“革命军”，有的叫他们“游击队”，有的叫“红军”，有的就叫“刘志丹的队伍”。贫农团，雇农工会，各种群众组织，都成立起来了。年轻小伙子三三两两，结伴来参军。打罢真武洞、镰刀湾回来，缴枪多了，群众又撵来要学打枪。刘志丹觉得，连打了几个胜仗，收了二三百农民战士，也该整顿整顿，训练训练了。就趁这个机会，把队伍集中到石崩湾大练兵。打靶，上操，又讲军事，讲政治。爱唱歌的，随口编起《信天游》：

李闯王造反黄河边，
刘志丹练兵石崩湾。

要把那世事颠倒颠，
受苦人跟上刘志丹。

石崩湾是深山密林地带，外边人很少进来。那天清早，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战士们还是一个劲儿冒雪操练。刘志丹从旁指点。

训练结束，战士们抱着松柏枝子，忙着装点门面。进窑里看看，战士们把炕烧得热腾腾的。有拉有唱，有说有笑。景范研了一碗墨，炕上摊着纸，正替老百姓写对联。一问才知道要过旧历年。这几天，志丹忙着练兵，把过年的事情都忘了。心想，许多人头回离家，一定把年节看得很重，应该叫大家过得快快活活。回来叫供给主任：“锡五同志，你去买些猪肉，给大家会餐。”锡五正拿个铅笔，趴在桌上计算，见志丹嘱咐，忙说：“不用你操心，吃的喝的都齐全，好几天以前，百姓们就送来了！”志丹问：“付钱没有？”锡五说：“我正为难哩！送一回，退一回，没有人要。”正说着，参谋葛明山在外面嚷着：“老马，快来卸驮子，又送吃的来了！”锡五出门看，窑前赶来七八条毛驴，都驮着东西，猪肉粉条，油炸糕，油酥散子，黄米馍馍，还有两罐子黄米甜酒。明山咧着大嘴笑说：“这个年可过美了！”锡五迎上去，跟老乡打了招呼，志丹悄声说：“东西要照价收买，人要留下过年。”

锡五忙着找人卸驮子，政治部霍主任又来找志丹商量军民联欢的事。他说：“各村都捎了话，请咱们去过年，这个村十来家人，家家都要请吃饭。简直应付不了。我想，等人来请，不如咱们主动些，把各村代表请来联欢。”志丹说：“对！这也是个政治工作，你安排一下，最好也派几个人到各村当客人，还带点礼物。”霍主任说：“这事好办，打真武洞弄到的布匹，还存了不少。山里缺布，一家送几尺。”志丹说：“好吧，人来齐了，你出面讲讲话，苍沟马大爷来请过几回了，人乡随乡，今天又是他孙子满月，我得去看看他！”

马大爷本名马海旺，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说起这哥老会，原是一种

无业游民的封建行帮组织，在下层社会很有势力。梢山地区，文化落后，又加官府压迫，人们有难无处求助，不少劳苦农民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想求个互相帮助。这地方的哥老会，大都是劳动人民，有钱人极少。哥老会也确实神通广大，官府办不到的事，它能办到，官府探不到的消息，它能探到，官府到不了的地方，它也能到。讲起义气，颇似梁山好汉。这些人被革命利用了，能做好事，被反革命利用了，也很能做坏事。刘志丹早看到这一点，这个阵地我们不占领，反革命就要占领。在山区活动，不把哥老会争取过来，就难站住脚。根据不同的政治态度，对哥老会的头面人物，志丹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敌视革命的，坚决打击；徘徊观望的，努力争取；倾向革命的，加强团结。目的就是要跟敌人争夺群众。这个马大爷，当地人都说他正直，是个好老头子，周围百十里，哥老会的人都听他的。马大爷又爱给人帮忙出气，远近都有威望。当初在永宁山竞选团总，志丹找他谈过话，在绅士里活动，他也出过力。队伍进了梢山，他又帮着探信儿，买东西。如今到了年下，再忙也得看看他。

驻地的窑洞内外，正忙着摆席，请周围的乡亲来过年。哨兵跑来报告说，永宁山来人找老刘。明山丢下酒壶，出村一看，原来是王子宜，拉着马上来了。

子宜不慌不忙，进了窑洞。问：“老刘呢？”明山说：“去苍沟了。咱们先喝两盅！”力如说：“快打发人找他，有急信！”明山不敢怠慢，牵出匹马，直奔苍沟。

石崩湾离苍沟十几里路，骑着马一阵就到。马大爷正在窑前张望，远远看见志丹来了，忙迎上去，接了缰绳，又让志丹进屋，拿炕笤帚扫雪。志丹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也备了一点礼物，向马大爷道了喜，拿出一双虎头鞋，一顶兔皮铃铛帽。马大爷连声道谢说：“我可不是为做满月请你来的。有大喜事！”说着拿出一条新马拐枪：“你看看，这是咱们新造的物件。”

革命军的“兵工厂”就设在马大爷家里，只有两三个工人，平日修理修理枪械，现在竟能造枪了。志丹把枪拿在手里，看了好久，称赞说：“咱

们也能造枪了，不简单！马大哥，这都是你的功劳！”马大爷说：“一家人不说外气话，大家的事大家办。你为的谁？一个心都是百姓。说实话，这辈子不遇上你，我这份力气也没处使。如今有处使了，还不都拿出来！”说完，放声大笑。给志丹点上烟袋锅，吩咐家里人端出酒菜。马大爷知道志丹忙，出来一趟不容易，特为志丹做了“八大碗”等着。

正一边吃一边说笑，明山骑马跑来说声：“子宜找你，快回！”扭头就打着马跑了。志丹忙起身告辞。马大爷猜出有要紧事，也不挽留。志丹嘱咐说：

“马大哥，这儿的事都交给你了。”马大爷一口应承说：“你放心吧！我已托人上榆林买机器，等运回来了，我再去请你。”

志丹回到指挥部，子宜焦急地说：“你可回来了，有急信！”忙打开捎裤，取出一包文件，一封信递给志丹。志丹拆开看，信是延安区委来的。上面说，高双城正在调集兵力，要来“围剿”，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叫快作准备。志丹看完信问：“高双城队伍到了哪里？”子宜说：“我出来时，听说到了县川！还有，阎小盛昨天来了信，他在太白川张家砭消灭了合水民团，队伍已发展到一百来人，四十条枪，前些时又消灭了古城川民团，想来会合。我看情况有变化，把人打发回去了。”

志丹问：“你怎么打算？”子宜说：“永宁山这块阵地还得守，我留下来坚持，万一情况再变，把永宁山民团也拉出来。你看怎样？”志丹思索了好久，才说：“永宁山已完成了历史任务，民团也该拉出来了。如果能早些撤出，都到合水集合，我们接你。”

当下开了党委会，作出快定，避实就虚，转移合水，集中兵力，突破“围剿”。志丹命令景范：“马上带一小队人出发，去和阎小盛联系。”景范刚吃罢饭，被一群老乡扯着，正说《三国》，得到命令，跳下炕就走，老乡们才散了。

刘志丹送走子宜，给干部布置了任务，抽一个人到山西去买弹药，同时给特委送个信，派人去苍沟，设个后方留守处，今后各方面一切联系，

都通过留守处。写信托马大爷照看。明山答应着，一阵风走了。

大年夜里，发生敌情，只好通知战士们，早点睡觉。后半夜，雪下大了，队伍怕惊动老乡们，悄悄集合开拔。老乡们心里过意不去，把猪肉白面，一应过年物品，都打上驮子，赶上毛驴，一路送上走。送了一天，志丹苦苦劝说，才返回去。

部队行军一天一夜，雪仍不止。积雪渐深，脚步愈沉。上山打滑，下山出溜，战士们一个拉着一个的衣角，挣扎前进。天快亮，休息一下，又冒着雪走，夜里过了子午岭，到平正川，人困马乏。侦察报告，东边敌人追来了。志丹马上传令：“走路的骑马，骑马的走路，连夜急行军，通过葫芦河。”自己便把马交给步行的同志，大踏步走在前边。人们屏着气，紧紧跟上。又走一天，到太白镇西边，要翻过桥山中段。走到山脚下，马乏了，打死也不肯走。人们只得下来，在前边拉着缰绳。鸡叫二遍，爬上山顶，总算摆脱了敌人，队伍停下休息。

桥山上，雪急风猛。战士们找到避风处，打柴烧火，围起来抱着枪，背靠背，坐在地上睡着了。冷风吹，大雪飘，雪片在睫毛上结成冰珠，在嘴唇上化成雪水。渐渐，人也埋在雪花里，透过山风，传出均匀的呼吸声。刘志丹睡得正甜，突然冻醒了。猛地睁开眼坐起来，一片雪光，天亮了。摸摸脸上身上全是雪，怀里裹进去个雪疙瘩，化成水。他站起来使劲抖了抖，立时感到彻骨的寒冷，上下牙得得打架。四下一望，天连地，地连天，银光耀眼，不禁叫道：“好雪！”又见前边后边，左边右边，人们横躺竖卧，身上都盖了一层，象些雪丘。志丹怕冻坏了同志们，忙招呼大家起来。

马全低着头啃干草，冻得打响鼻。志丹绕过一个个雪丘，心头滚热。铺雪盖雪，还睡得这么安然！这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纯钢铸成的人，风雪冻不透他们的心，冷不透他们的理想。理想永远是火热的，可以融化冰，可以充饥御寒。志丹见眼前睡个大个子，就圪蹴下来，轻轻推了一下：“世泰！”世泰抓了一把脸上的雪，完全清醒过来，问道：“行动吗？”志丹摇摇头，替他扑打着雪，一边问：“冷坏了吧？”世泰说：“够受！”，志丹说：“快叫

大家起来，睡久了会冻病的。”世泰点点头，推推旁边的人：“值日一班长，快吹哨子！”又大声叫着：“哦！起床了！”好多人翻身坐起来。有人抓一把脸上的雪说：“这一觉睡得真痛快！”顺手捏个雪疙瘩，朝睡着的人抛去，一时雪球满天飞，战士们叫闹着，打起雪仗。

哨子一响，马上站队集合。雪丘变成了雪窝。空中又落下雪片，把雪窝填满。身上抖落一层，又堆满一层。战士们成了雪人，都挂着枪，拉着马，踏雪前进。正月初三，来到了古城川。

古城川有个堡子，当地人称作“古城”，堡子内没有人家，东西两边，各有个村子，叫古城村。队伍就住在东村。刚安顿下，景范回来报告：阎小盛带着队伍开到了西村。志丹说：“这么快？”戴上帽子跑了出去。走到半路，阎小盛带着几个人，深一脚，浅一脚，从雪地里跑来了。志丹见小盛又换上老羊皮袄，就说：“怎么又是老打扮？”小盛说：“我讨厌民团那身狗皮，还是老羊皮袄好，冬天正穿，夏天翻穿，热不着，冷不着。”志丹又问：“队伍安顿好了吗？”小盛说：“这是熟地方，各人进村住各人的，还安顿啥？”志丹说：“那好，咱们进村说话。”扭头看见小盛旁边站着个年轻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小盛介绍说：“这是姜海银。”志丹忙去握手说：“我好象听过这名字。”小盛笑说：“你们也算老乡，他父亲是姜老大，你记得吧？那年在吴旗镇庙会上，被张家逼死的！”姜海银说：“张家不逼到这一步，我哪能到处揽工闹事哩！”又问道：“高双城出来多少人？子午岭西北有敌人，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志丹暗想：“这年轻人懂事不少！”

大家拥着志丹，说说笑笑，踏着雪走。回到窑洞，小盛才得空报告队伍发展的情况：“这支队伍，成分比较复杂，里面有不少横山饥民，是我在边沿区组织的，海银带来的几十个人，大半是揽工汉。还有一部分人，从前跟过宝魁也都跑了来。其余的，来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刚组织起两三个月，还没有受过什么革命教育。”志丹听罢说：“成分复杂不怕，问题是要教育。愿意来革命，总是好事情，况且成分也不算坏，基本上是劳动人民，被压迫阶级。”

当晚，在东村召开干部会，会罢又研究编制、配备干部。刘志丹是总指挥，霍力坚是党委书记，把队伍编成四个大队，一大队长赵宝魁，二大队长阎小盛，三大队长姜海银，四大队长由力坚兼任。景范，世泰都分在各队。景范当副大队长，世泰当班长。这几个大队长，就数海银年轻，才十九岁。志丹跟他谈了很久，才知道，他已经拉了两年队伍，是个“老资格”。

第二天一早，宣布编制，志丹向全军讲了话。休整了两天，队伍出发，南下甘肃宁县，一边打土豪，一边打土匪民团。这一带也是山区，沟上有塬，塬上有山，人家不多，给养、弹药补充都很困难。先消灭了一股土匪，打了一家大土豪，然后去袭击早胜镇。开到张皮塬，刚吃过早饭，忽然哨兵跑来报告：“发现敌人。”

志丹和一大队住在前村，侦察员也来报告：是陈畦璋手下谢牛一个旅，从宁县来袭击。陈畦璋的队伍从前就跟赵宝魁打过仗，还几次托人说合，要收编，都被拒绝。这一阵听说队伍闹大了，更是眼红。谢牛手下人多是亡命之徒，打仗又刁又狠。敌人说来就来，战斗已不可避免，志丹对力坚说：“快作准备！”命令一大队正面抗击，派护兵路大昌去调二大队上来，三、四大队向东撤退。赵宝魁一听打仗，全身精神抖撒，提着盒子枪，带着人飞奔出村。到了塬畔，敌人一个连已到脚下，宝魁喊声“打！”战士们如猛虎扑食，齐扑上去，敌人见来势猛烈，扭头就跑。宝魁紧追，敌人大队拥上来，正好阎小盛带着二大队，从侧面猛扑，敌人顶不住，扭头又跑，就象一群黑老鸦，拂晓找不着宿处，满天乱飞。小盛追了一程，拣的有枪，也有毛皮帽子。

忽然，敌人的骑兵插到背后，把三、四大队截断了。大行李、骡驮子、粮食驮子冲得四散，人挤人，马踏马，整个塬上，只见敌人的马群往来冲杀。赵宝魁急红了跟，见马就砍，见人就杀。一匹白马闪电似的迎面奔来，赵宝魁把刀一横，削掉半个马嘴，那马带着刀，四脚腾空，马上的人跌下来，头倒插在雪地里。宝魁回过头，又去找大队。

四处枪声零乱，左一堆，右一堆，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人，雪地上，东倒一匹死马，西倒一具死尸。遍地撒的粮食，骡驮架子，破布片，烂麻袋。

志丹这边，也被敌人骑兵割成几股。志丹身边只跟着力坚和一个警卫班。他们且战且走，敌人越来越密，看看四面合拢，阎小盛提着短枪，领着十来个人，一路冲杀过来。两股人胶合起来，再打不散，来了个反冲锋，敌人退了半里。志丹命令：“撤退！”志丹在前，小盛在后，敌人的步兵又攻上来。景范和世泰也提着枪赶到，两人拦住敌人就打，掩护志丹他们撤退。志丹他们走远了，景范、世泰的子弹也打光了，只好用大刀矛子杀开条路冲出来，去找志丹。志丹跑到一个山嘴子上，了望着远方，又命令：“插起红旗，集合队伍！”宝魁看见红旗，跑到这边山上，累得脸色焦黄，赤着两脚，被冰碴子扎得稀烂。一停下来，就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啃雪。

一场遭遇战，打到天黑，还没有结束。在山头上集合起二百来人，力坚、宝魁、景范、小盛、海银、世泰都在眼前，独独锡五不知下落。队伍打散大半，战士们情绪波动，志丹走过来，沉静地说：“同志们！咱们打了败仗！五百多人只剩下二百来人，这是因为咱们才到新地方，人生地不熟，吃了遭遇战的亏。不过，用不着垂头丧气，咱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要为穷人打天下，战士们都是有志气的，打散了还会回来，胜利总是咱们的！可是敌人就不同了。敌人是死一个少一个。打跑一个，就不再回去。他们的兵是雇来的，拉来的，真心卖命的没有几个。有个三长两短，就各打各的主意。同志们！要把眼光放远，一两个战斗打败了，算不得什么……”战士们又累又饿，本来都在雪地上，东倒西歪，听见志丹讲话，都站起来，整整衣服，挺起胸膛。

志丹整顿了队伍，连夜撤到麻子掌。老百姓听见枪响，逃走一空，黑灯瞎火，吃没吃的，喝没喝的。队伍在村里正进退不得，马锡五赶着几匹骡子，从另一条路跟来。骡子上还有些粮食，炊事员跑丢了，也没法做饭。志丹叫队伍找些烂窑暂时歇着。又叫路大昌跟锡五去找水，黑更半夜，找

不到井，就化些雪水，下了米，煮得半生不熟，无碗无筷，用帽子兜着，一把把抓着，胡乱吃了。天明，敌人又来围攻。后边高双城的队伍也赶到了。革命军处境不利，人无粮，马无草，枪无弹，志丹决定迅速摆脱敌人，指挥队伍钻进了芦保梁大森林。

李建彤(1920—2005)女，河南许昌人，原名韩愈之，笔名秋心、秋茵。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8年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历任抗大医院支部书记，抗大卫生处政治干事，西北文工团音乐组长，鲁艺音乐系学员，延安专署一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秘书，中央财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国务院监察部主任监察专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

回忆红二十六军红二团

王世泰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以下简称红二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边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它的建立，曾为创建、发展、巩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幸得很，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人杜衡(后叛变投敌)把持领导权，致使红二团在建立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由胜利转为失败，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红二团的作用和影响，深深地扎在根据地人民的心里；红二团的全体指战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红二团得以幸存的骨干，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振奋精神继续前进了。

转角改编

1932年4月20日，党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并强调“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8月下旬，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团，争取在近期内改编成一个师，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通过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二十六军决议案。9月中旬，省委又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12月18日，省委命令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接着，杜衡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杜本人说的，后得知当时他已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身份，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来陕甘游击队。

杜衡是带着框框来的。这个框框代表着省委一些人对以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多年浴血苦战创建的陕甘游击队的看法。他们坐镇西安遥控，违背客观实际，多次强制陕甘游击队做它力所不及的工作，10个月内撤换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四任总指挥，使一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游击队，几经挫折，元气大伤。在他们的眼里，陕甘游击队是一伙“乌合之众”；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是“机会主义分子”。

因此，1932年12月22日，杜衡以省委书记和即将上任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名义，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杜衡首先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大讲一通“全国大好形势”，最后声色俱厉地陈述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的所谓错误，扣上“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等大帽子。言称，必须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当场宣布撤销刘、谢、阎的职务，强令他们离队赴上海中央局受训。

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对党绝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地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们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12月24日，部队开到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选举团长，共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举，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两个候选人，有曹胜荣(中队长，连级干部)和我(班长)，我当选；军人大会选举，结果我又当选。接着，杜衡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当场拿出由中央军委署名的红军番号任命书。与此同时，杜衡以军政委名义任命红二团各级领导。据回忆：

团长：王世泰
团政委：杜 衡(兼)
团参谋长：郑 毅
团参谋处长：杨重远
团经理处长：刘约三
团管理处长：杨琪
共青团委书记：师克寿
骑兵连连长：曹胜荣
指导员：张秀山
步兵连连长：李亚夫
指导员：李秉荣
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
指导员：魏武

全团共计 200 余人，枪支弹药齐备。

这样的改编，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但敢怒而不敢言。部分战士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志丹、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子长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志丹留下。而我则闹得更凶，表示坚决不当团长，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我虽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一直是个普通的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了大为光火，不容分辨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我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

杜衡给我作了好一阵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

作为一个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党性所不允许的。所以，我最后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领导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思索了一会儿，问我：“你看留下谁合适？”

我说：“留志丹。”因为子长提出过留志丹。

杜衡最后同意把志丹留下来，但只给了个政治部副主任职务。找了杜衡，我又找志丹说。自从1930年跟志丹参加武装斗争以来，我最钦佩他、尊重他，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问题，我想不通，就愿意找他谈，即使挨一顿批评，也心甘情愿。我对志丹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

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接着又说：“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帮你的。”

听了志丹的话，我好像吃了“定心丸”。事实上，嗣后的仗大多都是由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志丹在受排挤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

随后，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王世泰(1910—2008)陕西省洛川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团长、陕西省军事部副部长。1937年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留守兵团警三旅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第二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政府副主席、铁道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人大主任。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一、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终南山突围

——记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山区

王兆相

1932年5、6月间，我和王兆贤，杨文谟，王金泉等几个共产党员奉陕北特委和神府党组织的委派，先后两次在陕北特委委员马明方，当时的陕北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我的兄长王兆卿的带领下历经了种种艰难去寻找刘志丹、谢子长所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战斗中向刘志丹、谢子长这两位传奇人物学习开展红军游击战的经验。

1932年10月，在甘肃合水县廉家砭村找到了红军陕甘游击队。

首先见到的是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他带我们去见了当时被老乡们尊称为谢青天的谢子长。当我把陕北特委的组织介绍信交给谢子长后，他高兴地说：“陕北特委真支持我们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及时送来一批优秀的年青共产党员。”

第二天，我被分配到阎红彦、杨重远的骑兵大队一中队二班当战士。一中队长是强世卿，二班长贺耀华，在这个班里有比我早来一个月的杨文谟，还有我的堂弟王兆贤（王三格蛋）等人。班长贺耀华发给我一支很好的小马枪和一匹大骟马，马一身花豹斑，走的又稳又快，同志们叫他豹花马。

第三天，我们骑兵大队和步兵大队会合到一块，我见许多红军战士围着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热情的说说笑笑，我很奇怪的问我班上一个战士：“这是什么人？大家这样拥戴他？”这个红军战士笑着说：“怎么？你连他都不认识？我说：“我刚来几天，我怎会认识？”他马上说：“这就是鼎鼎大名，老百姓拥护，白军最怕的刘志丹啊。”我当时心想：“好啊！这就是我心目中一直想见到的英雄人物，原来是这么平易近人。”我哥哥王兆卿常给我讲述刘志丹、谢子长这两位传奇人物“闹红”的故事。他送我们来参加陕甘红军时，还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军事知识，跟着他们好

好干革命。现在我终于见到他们俩，并将在他们的领导下学习、生活、战斗。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陕北特委派我们来向刘志丹、谢子长两位传奇英雄人物学习开展红军游击战经验的期望。

在红军游击队，我通过一系列不停的战斗，学会了打枪和一手马上战斗的好功夫。

1932年11月，在打罢旬邑土桥镇的民团后，由于我在历次战斗中的表现，又是老党员，被选为骑兵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并被任命为宣传队长和没收队长。

12月，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按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红二十六军的政治委员兼第二团政治委员。

杜衡来后首先批判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走的是“梢山路线”，并提出让他们必须离开部队。

部队到转角镇后的一天晚上，杜衡突然召集步兵大队五、六个党员，骑兵大队的贺耀华、我和杨文谟等五个党员在一个山洞中开会。在会上杜衡宣布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不能再作为领导留在红二团，必须立即离开部队，并提出要从现有人员中选出一个人来作团长。他并规定必须从贫雇农和工人家庭出身的班长以下人中去选，班长(包括班长)以下人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班长以上人员有选举权无被选举权。杜衡提出的这两条实际上就完全把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都排除在外了。在讨论中，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样作是不对的，但杜衡以省委名义和他政委的身份强压大家必须按此执行。在杜衡的强压下，经过再三讨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大家认为按杜衡提出的条件，只有步兵大队的班长王世泰同志符合这个条件。王世泰同志出身好，战斗勇敢，团结同志也好，最后讨论决定只能选他。但作为一个班长，他怎么带几百号人去战斗，这点连杜衡自己心里也明白，让一个班长突然去指挥一个几百人的团是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好的。现在虽然把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排挤走了，但自己在军事指挥上

也不行，于是在大家一致的要求下，杜衡同意留下刘志丹，但只让刘志丹作了个政治处主任。实际上后来部队行军打仗，指挥权仍在刘志丹手中，不久刘志丹又被改任参谋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下设了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连和随营学校，李亚夫、曹胜荣、吴岱峰、张秀山、高锦纯、杨文谟等分别担任了连长、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汪锋任学校政委，郑毅任参谋长。从各班抽调了十二名政治上可靠、年轻力壮的战士，其中有四个党员，几个团员，成立一个特务队，也叫警卫队或执法队，当时我被任命为队长和党的支部书记。

警卫队十二个人，配的武器了都比较好，有六支长枪，六支驳克枪，虽然当时我入党较早又做了队长和支书，但因出身是上中农，又上过一年中学，所以只能背长枪。开始谈话还让我作红二团团委书记，但我认为自己文化低，经验又少，干不了，作个团委委员还可以，于是绥德人李成兰同志作了团委书记。

陕甘红军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后，部队进行了焦家坪、香山寺、庙湾、芋园、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等一系列的战斗。刘志丹虽开始被排挤为政治处主任，后又改任参谋长，但实际具体指挥战斗仍然是刘志丹。我作为警卫队长，同时也是特务队长和执法队长也就紧跟在刘志丹的左右，我们吃、住在一块，战斗在一块。在这段日子里，我从刘志丹身上学到了不少如何带领部队作战指挥的经验和他的良好作风，优秀品质。

在战斗中由于杜衡的独断专衡，在打了一些胜仗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采取了一系列打乱仗、乱打仗的“左”倾路线。使部队和根据地都受到了一些损失。在敌人大举围攻面前，杜衡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力量，根据地的被围困和红军的失利，使他失掉了在陕甘边、照金建立根据地的信心。

1933年5月间，红二团在北梁村召开党委会，李怀茂、习仲勋也参加了。杜衡忽然讲，敌人10个团的兵力“围剿”，陕甘地广人稀，红军无法

扩大，创造不了苏区，无法粉碎敌人“围剿”。提出放弃建立陕甘、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渭南商洛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右倾逃跑决定。刘志丹，李怀茂等同志们都列举事实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正因为陕甘地区广阔，在敌人大部队“围剿”下才能迂回，与敌人打游击。但杜衡作为党的负责人，身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团政委一意孤行，强制部队南下。

5月29日，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奉命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经淳化进入三原等地，与渭北游击队联合作战，沿途打了几仗，国民党派重兵围追堵截，红二团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陷入困境。在部队到了寇家庄后不久，杜衡借口去向省委请示汇报离开部队，指定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离开部队到西安后不久，便被敌人逮捕叛变，出卖了省委，最后沦落为国民党特务。）

杜衡走后，红二团在敌人的围追下只能继续向南进发，从高陵以南过了渭河，在灞桥打了敌人的邮政汽车：沿途消灭了几股民团的袭扰堵击。

红二团在刘志丹等领导的带领下进入到蓝田县境内，经厚子镇向东到箭峪口，从此处进入了终南山区。

终南山区属秦岭山脉，山高林深，坡陡路窄，沟狭水急，森林茂密，草深云低，成天阴雨连绵。到处是乱石成堆，人、马都走不动，骑兵在这个地方更是无法行动。马在爬山越岭中，许多马的马掌逐渐磨损脱落，行走很困难，有的马走一步一个血蹄印，有的干脆卧下就起不来了。

红二团由于对地形不熟，在当地群众中虽有红军渭华暴动的影响，但多数还是对南下红军不了解，对红二十六军知之甚少，与当地党组织也在联系配合上存在一些困难，此时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孤军深入，陷入了较大困境。

红二团到张家坪后休整一天，第二天一早，团党委正在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此时敌警备一旅已利用大雾悄悄包围了张家坪。红二团仓促应战，混战中红二团分散突围，我和杨琪带着骑兵和警卫队跟随刘志丹向西突出了包围。王世泰、汪锋也各自带一部份红军从其它方向突围出去。

在此次分散突围后红二团再也没能集中起来。

突围后，刘志丹带领了我和杨琪等几十人在蓝桥一带的深山中与敌军周旋。在深山中不断与敌遭遇作战，马成了累赘。刘志丹、杨琪下令放弃所有马匹。杨琪的马是一匹漂亮的大白马，跑的特别快，他舍不得让敌人捉了去，几次掏出手枪想打死它，但都不忍下手，最后还是放它走了。我的豹花马跟我时间长了，我也很是舍不得，但也只好忍痛放走了它。

不久，在与敌一次遭遇战中，杨琪连长也和我们(刘志丹等人)失散。在此期间，刘志丹多次派人去寻找汪锋和王世泰等人，都没有音讯，现在杨琪连长又失散了，刘志丹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少，只有我们几十人还是紧跟着刘志丹。

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志丹把我们这些跟随在身边的几十个人集合在一块讲了一次话。他说：“目前形势对我们不利，但这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部队重新集合在一块，“突破敌人的包围，即使一时联络不上，我们也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要突出敌人的包围，回到照金根据地去。要相信共产党，红军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万一我们再一次被冲散，大家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回到陕甘边去，回到照金根据地去，我们的红旗倒不了，就算剩下我刘志丹一个人，也要把咱红二十六军的红旗扛倒底……”。我们听了刘志丹的一席话都受到了极大鼓舞，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返回陕甘边根据地去继续战斗。

一天，刘志丹召集还跟随在身边的团党委委员开会，当时团党委成员只剩下刘志丹、贺耀华和我等四、五人，一个渭南县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志丹提出如何在渭南山区开展游击战的问题，会上还决定要留人、留枪，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渭南根据地。正谈论间，敌人的搜山部队攻上来了，刘志丹让我马上带少数人阻击攻上来的敌人，掩护大多数同志和渭南县委的同志向密林深处撤去。

我带着人击退敌人的进攻，撤到山上密林中时，身边只剩十几个人，志丹和其它同志也不见了身影，失去了联系，从此再没能找到。

我们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回到陕甘根据地去，按照志丹所讲的那样，一定要把红二十六军的红旗扛下去。

不久，我们又与敌人遭遇，战斗中我们再一次被冲散，我们几人撤到了一个悬崖绝壁，绝壁下是深深的河谷，绝壁旁有一个不到一米宽的斜坡，地很湿，斜坡石壁上长了一层青苔，滑的厉害，稍不留神，就会滑落到深谷里。有几个同志轻轻的抓住石缝中的小树，一点一点勉强顺坡过去了，团部的一个马夫在过斜坡时一不小心，滑落下去，只听惊叫一声就没了动静。我从后面看着满是青苔的斜坡，低头把脚底擦了擦，然后从石缝中抠出一些土撒在斜坡上，抓着小树慢慢往下溜，当时我就想即使被摔死也不能让敌人抓住。于是小心翼翼慢慢下到沟底，下去后我们在乱石堆中到处寻找摔下去的马夫，但怎么也未能找到，只好离去。

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想找点吃的，我带头先进去，突然看见一个国民党兵背着枪向我走来，我马上开了一枪并大喊“快撤！有敌人！”战友们飞快钻进山林。敌人开始排队搜山，一边搜一边喊“你们的杨琪连长缴枪了，你们的队长王兆相也被我们捉住了，快缴枪吧！”“谁缴枪，给谁二十块钱作路费回家去”，山下一个劲喊“快下山缴枪吧，缴枪不杀”。敌人满山遍野的喊叫着。

黄昏时分，敌军仍在山下不停地喊叫，这时我突然看到山林里面有三个红军战士正在下山，就扔下去一块石头叫住他们。

我大声喊：“你们于啥去？山下有敌人，快上来。”

一个战士回答：“他们喊话说，杨琪连长投降了，你也被抓住了，只要缴了枪就发给二十元路费，可以回家……。”

我立刻说：“你们别听敌人造谣，杨琪连长决不会向敌人投降，我现在不是就站在这里吗？老刘讲了，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把红二十六军的红旗扛下去，要战斗到底。我是党员，绝不会去缴枪。敌人的话不能信，你们即使缴了枪，敌人也不会放过你们。快上来罢。”

那三个战士听我这么一说，立刻答应：“好！我们跟你们走。”

天一直在下雨，我们找到一处石崖避雨，在石崖下睡了一觉，天亮后，我们继续往山上走。此时正好碰上了也与队伍失散了的共产党员谭生彬，我当时特别高兴，想到这下可好了，有两个党员就好办了。

这时，我们已有一天一夜在这深山老林中寻找出路，一直没吃饭。于是我提议：“咱们寻找敌人的空隙下山去找点吃的吧”。大家都同意，并且大家说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想办法回到渭北、陕甘去找红军。

我们刚下山不久就遇上敌人，我与战友们一边射击，一边向山林中退去，结果几个人又跑散了，等到进入深林，只有谭生彬还紧紧和我在一块。

我和谭生彬在一个山沟中找到一户人家，在此见到红二团的一个伙夫在给老乡锄地，我们双方见面都很高兴。这位伙夫说他暂时在此找点活干，以后再找机会回渭北。由他出面给这家老乡说了许多好话，老乡很同情我们的遭遇，给我俩吃了一顿饭，还告诉我俩：。沟口驻有敌一个营，让我俩顺沟走，水声大，敌人听不见你们的脚步声，到沟口后多看看有无驻军再走。

我和谭生彬一边走，一边商讨，现在两个人的手中枪已没一颗子弹，不如把枪埋了，省的碰上敌人也没用。于是我俩把枪机卸下分别扔到树林深处，把枪挖坑埋好了。我们一前一后向沟口走去。天黑后，我们刚接近沟口，看似没人，突然从草丛中钻出几个端着枪的敌兵，大喊：“什么人？不许动！”，我马上回答：“老百姓”。敌兵端着枪向我俩走过来，我对身后的谭生彬说：“快跑！”我回头就向树丛中跑去，身后的谭生彬也跳到一条小沟中跑了。几个敌兵分头追了一阵，晚上看不清，也没开枪，追了一阵也不追了。没想到就是这次与敌遭遇，让我和谭生彬也失去了联系。

这时我明白根本无法从沟口出去，我只好顺沟往里走。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个破草房，我走过去仔细观察后，听到房里有打呼噜的声音，我明白这是看庄稼的老乡在睡觉，我敲醒了老乡。老乡睡在顶棚上，他问你是什么人？我如实告诉他，我是红军下来的人。老乡马上说：“红军是好人，那年高塘塬暴动时，红军可是打富济贫的人啊。”老乡又说：“外边雨下的

大，你一定很累，快上来歇歇，睡一会儿，别怕，我给你看着。”

天明后又来了一个红二团先锋连的小战士，老乡给我俩吃了点干粮。老乡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一定救你们出山，不会有问题，这里没啥吃的，我回家给你们弄点吃的去”。

中午，老乡背着箩筐回来了，他说：“本想帮你们帮倒底，可现在不行了，村里来了许多兵，硬说我藏了红军，把我捆了起来，还是村长出面说我是老实庄户人，是好人，才放了我。”老乡挽起袖子，手腕上有明显被勒过的痕迹。我看着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老乡说：“没事，只是我没法送你们出沟了。”他拿出吃的让我和小战士快吃，吃后就快走吧，他说很怕敌人进沟来让他们发现了。饭后，我问老乡：“从这个沟口到临近那边的沟口有几里路。”

他说：“有八里，但那边沟口也驻有白军”，他又说：“中间四里左右处没有白军，那里有一户陕北人，有兄弟几人，可都是好人，你们去找他们，他们定会想办法帮助你们的。”

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老乡答应带我们去找那户陕北农户。此时天已亮了。敌人又开始搜山，只听满山遍野喊叫着，“哟喝，啊哈！”“缴枪不杀！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带路的老乡听到这些喊叫声，吓的不敢再往前走。为了安抚老乡，我耐心的给他解释：“别怕，山上大雾可以作掩护，在这深山老林中这么大的雾，白军跟本看不到我们，就是到了跟前我们也是可以躲开的。”老乡带我们翻过一座山，又往下走了一段。老乡对我们说：“前面走不远就是那户陕北人家了，不要怕，他们肯定会帮你俩的。”

我们两个找到那户人家，敲门后让进去，屋里坐着三个男人，一个妇女，他们都惊奇的看着我俩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们是从陕北下来的红军，想出山回渭北去，请你们帮帮忙”。那个妇女一听高兴地说：“红军是好人，我们听说陕北下来了红军，白军正在搜捕你们呢，快坐下休息。”三个男人马上起来让座，其中一个说：“在家不能住，白军来了怎么办？”

那个妇女说：“你们快把人家领到上边场院的草房去休息，白军不会到那边去的。”

她又对我说：“你们带什么吃的没有？”我马上把前面那个老乡临走时给的一点豆面交给那个妇女，她拿去作饭了。这时她低头看见我的鞋底都快掉了，马上找出一双鞋让我换上，嘴里还念叨着：“鞋都破的穿不住了，这怎么能回到陕北去，快换上。”

男人们把我们领到树林边的场院草棚住下休息。经过交谈了解这家人是蒲城县的人，兄弟四人，有一个在附近的民团里当团丁，不一会儿这个团丁也回家来了，他对我说：“你们如把枪交出来，我可以想办法给你们每人二十元钱，并给你们办一个证件回家。”我立即说：“枪找不到了”。但我心里想不管何种情况，我们红军也不会把枪交给白军的。那个团丁笑着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们红军是不会交枪出来的，我不会勉强你们，由你，不管怎样我们交你这个红军朋友，保你无事。”

吃过饭，其中两个弟兄护送我们走了一段路后，对我们说：“前面不会有啥事，你们顺水流方向走，这水向北流，千万别离开水，顺着水走就可以出山了。”我们告别了兄弟二人，大约走了有二三十里，回头还能看到南山。

天明时分我们终于走出了终南山。来到渭河南岸的高塘塬。因我是一口陕北神木土话，两人口音相差太大，为防遇敌不方便，俩人决定分头往北走。

我走到高塘塬，实在饿的不行，就去给一户农家做小工，往地里送粪，干了一上午，吃了两顿饭。下午从华县和渭南交界的赤水镇绕了过去，晚上到了马庄。找不到活干，只好一家一家去要点吃的，勉强解决了一点饥饿的问题。

一天，我看到一户农家便上去要点饭吃，那家人说：“年轻轻的要饭，这样罢，你去给我家从牲口圈里把粪起出来，不给钱，我管你饭吃。”我便在这家整挖了一天粪，吃了两顿饭。这家人看我干活很出力，又把我介绍

给另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户家去锄地。说好锄地每天可以给四十个铜板。在这家，我和一个哑巴给这户人家锄地，这家人看我锄地又快又好，很满意。在这家干了两天活，又锄地又挖粪。第三天早上我离开了这家，赚了八十个铜板，临走这户农家还给了我三个馍馍。

到了马庄时已离开终南山数天了，我顺渭河北上，到了仓头镇码头，船老大看了看我，要了四十个铜板才让我登船过渭河。船刚离岸，就见三四个民团的团兵持枪跑来，喊叫着船不能开，要上船搜查，说要封锁渭河，防止红军混过渭河去，让船老大把船靠岸检查。我见此情况很着急，如团丁上船检查，一听口音，就会被发现。我上船时，船老大已看出我不是渭河南边人，所以要了我四十个铜板。此时船老大看了我一眼，对岸上的团丁说：“船已离岸，不好再回靠了，上船时已都检查过，都是本乡本土的人，相互都认识，没有什么红军。”一边说一边让船工使劲推篙。船进入航道，没一会工夫船就靠到了渭河对岸。我这才松了口气。

过了渭河，直奔富平地区。我不走大道，不入城镇，依然到处要饭，实在要不到时，我利用身上锄地赚的还剩下的四十个铜板买点吃的。一路上我睡过山崖洞，住过破庙，满腿伤痕，流着黄水，肿的难受，这时我跟本顾不了这些，一瘸一拐急急的向三原区走去。

在三原县北，我突然听到枪声，问当地老乡才知是王泰吉骑兵团兵变参加了红军，杨虎城派兵在打呢。老乡说这是心字区。我知道这是到了我们红二十六军原来的游击区了。在老乡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赤卫队和当地党组织。一个同志认出了我，介绍给当地党组织说：“他就是红二十六军跟着老刘的警卫队长，骑兵连的负责人，赶快把他送区委”。到了区委我的两条腿已肿的不能再走路了。当地区委找了一个驴车把我送到一个秘密的村庄。在那里理了发，休息了十多天，治疗了腿伤。

在这里我知道刘志丹、杨琪连长和不少同志都先后回到了根据地，我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们。把腿脚上的伤治好，我化装成木工，回到了老根据地薛家寨子，首先见到的是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渭北游击队政

委张秀山，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同时也见到了许多从终南山脱险归来的同志。有杨琪、高锦纯、惠泽仁、刘约三、康健民、牛岗等等。

我一路历经艰险，终于回到根据地，回到战友们当中。

几十年来我对这段艰难险恶的经历都难以忘怀，一直铭记在心里。我一直记得刘志丹给我们讲的：“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但这是暂时的……要有战胜敌人的信心……相信共产党和红军一定能够胜利……只要我刘志丹在，红二十六军的红旗就一定打到底。”1935年，神府佳榆根据地和神府红军受到特派员的“左”右倾错误指挥受到重大损失，处于低谷危难时，特派员也借机离开了。这时我想到了刘志丹所讲的那些深深扎根于我心中的那段话。凭借这些话，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下，给我很大信心，让我和战友们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坚持斗争，依靠神府佳榆的人民，把神府佳榆红三团的大旗高高举起，最终又发展扩大了红军，恢复了神府佳榆红色根据地。

我也一直记得在我从终南山突险回来路上，老乡们是如何帮助我的。我多次给人讲，共产党和红军是离不开人民的支持的。终南山的突险如没有老乡们的帮助，我王兆相早就不存在了。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那几位农户和那一家子蒲城人，不知他们情况如何，我想写信给他们，但不知往那儿写。七、八十年代我两次到西安，就很想到终南山、高塘塬、赤水镇、马庄、渭河苍头镇看看，想找一下那些帮过我们的老乡。在西安我向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马文瑞谈起那段经历，马文瑞曾答应和我一起找时间去看看，但终没能找到机会。

2002年，已年近94岁的我，还让我的长子延生给渭南、华县民政局和党史办写信，请他们查找那几户农民和那家蒲城人。同时我的长子还把我的回忆录《战争年代的回忆》寄了几本给当地民政局和党史办，希望他们按回忆录中写的地址查讯，但终未回音。总之，终南山的突险经历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大影响。

跟随刘志丹战斗的岁月和终南山突险的经历，我一直把它当作自己人生的宝贵财富。我知道是刘志丹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他那胸怀坦荡，不计名

利，一心为党，一心为了革命的高尚品格。这段经历，是对我参加革命后一次难得的磨炼。在以后的革命岁月里，我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风险、委屈，我都坚定地相信党，相信人民，困难是暂时的，最终胜利永远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

王兆相(1908—2009)，陕西神木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宣传委员、队长、连党支部书记、团长、师政委、副部长、师长等职，参加了神府佳榆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长、支队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保卫黄河河防、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承德保卫战、三下江南、四平攻坚战、辽沈、衡宝等战役战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艰难岁月几多事 但留真情在人间

——记和刘志丹同志在神府的最后几次见面

王兆相

1936年3月初，刘志丹，宋任穷奉中央命令率领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负责打通神府佳榆苏区和陕甘宁苏区联系，为中央红军东征过黄河作准备工作。一路上他们打了几个漂亮的仗，消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在杨家院子战斗中，他们一举歼灭了敌人八十六师两个连，还俘虏了一个副营长。刘志丹带红二十八军打到神府来的消息传得很快，对神府佳榆根据地进行“围剿”还没撤走的敌人也闻风而逃。神府根据地的军民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象过节一样热闹。我当时正被1月份新到神府的特委书记杨和亭(特委书记杨和亭同志是1936年1月份中央及陕北省委专门派来神府佳榆苏区整顿党组织和红军的)奉党中央和陕北省委指示，免除了红三团团长职务，准备送去受训，只因路不通无法走。开始时安排我做了个特委军事部干事，后又改任为军事副部长的闲职，负责各游击队的联络工作，并要我带领新组建的新三支队过黄河在山西兴县一带开辟新区。听到刘志丹带红二十八军打到神府佳榆红色根据地来的消息后，我急不可待地想见到这位与自己出生入死战斗过的传奇般的老首长。不知他还能记得当年我这个追随他左右的警卫队长吗？当天就传来消息，让我立即到红二十八军军部所在地神木陈家坪镇去见刘志丹军长和宋任穷政委。

在军部，刘志丹一见到我就一把拉住我的手，我说：“军长你好吧……”，没等我说完，他就高兴地说：“好，王兆相你也好吧，我们又见面了，在商洛山区突围失散后我们就一直没见到你，回到根据地才知你也突围出来了，习仲勋同志让你回神府地区去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了，搞的不错吗，我从敌人的报纸上也知道不少你的消息……”。刘志丹高兴不停地说。我这时激动地紧盯着刘志丹同志连就：“军长我一直想你，想同志们……”。刘志丹同

志高兴地问这问那说个不停，宋任穷政委和唐仁杰参谋长笑着一直看着我俩。刘志丹同志这时才拉着我的手给宋任穷政委和唐仁杰参谋长介绍说：“咳！光顾高兴了，也忘了给你们介绍，兆相在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战斗过，曾是警卫队长，骑兵连支部书记”。宋任穷政委和唐仁杰参谋长笑着说：“早听你在路上就说过了，你们熟悉得很吗。王兆相的大名在敌人的报上已登过不少次了，快坐下说吧。”我们坐下相互谈了不少分开后的情况。这时，刘志丹突然说：“这次我们从南面上来到你们神府地区，打了几个胜仗，也俘虏了一些敌人，今天让你见一个人，就算我们送给你们的见面礼吧。”随后，志丹叫人带进来一个人，原来是俘虏的敌八十六师的一个副营长。刘志丹指着我问那个副营长：“你认识他吗？”“不认识。”那个副营长看着我就。志丹哈哈大笑说：“你们八十六师和他们打了几年仗，还出几千块大洋要他的人头，现在站在你面前都不认识他是谁，他就是王兆相，你们不是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什么子弹也打不着的黑狸虎吗？”那个副营长一听说我就是王兆相，惊奇的直瞪瞪的看着我。我笑着说：“你可看好啊！我可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是什么三头六臂，血盆大口，獠牙利齿的怪物，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放羊倌。”此时，这个副营长连连道歉，一个劲说对不起。宋任穷政委笑着说：“好了，事情都过去了，我们红军对俘虏是宽大的，今后再别跟着国民党军队做坏事，别反对共产党，反对红军就行了，回去好好做人”。俘虏被带走后，刘、宋，唐首长问了很多神府佳榆苏维埃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根据地内几个红军支队，红三团等的成长发展情况，同时对根据地周围敌人的布防也作了全面了解。对红二十八军首长们的各种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详细回答。后来他们对特委书记杨和亭就：“王兆相对神府佳榆地区的地形、群众、敌我情况都很熟悉，目前他也没什么主要工作，就让他留在我们这儿，给我们当个高级参谋，高级向导吧。”杨和亭问我怎么样，我马上就：“没问题，我正想和首长们在一起多呆一段时间呢”。而后刘、宋首长交待我：“兆相，你主要帮我们提供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和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随即我向杨和亭同志提出：“那

得派几个助手给我。”他问我：“你要谁吧？”我说：“搞供给工作离不开王道山，杨孝先(杨文谟的哥哥)，把他们调给我。”杨和亭同意了。

红二十八军到神府佳榆地区时正是1936年的3月初，天气很冷，还有冰雪，但红二十八军的静多指战员还光脚板穿着露脚趾的破鞋，神府佳榆苏区的群众看到这些都很心痛。这时苏区村村户户都发动起来，在短短几天时间就给红二十八军做了两千多双鞋袜，还送来了不少白面、猪羊肉、鸡蛋、大红枣等等东西。

不久，红二十八军移驻贺家川，刘、宋首长决定打沙峁镇的敌骑兵部队。这股敌骑兵约有三百人左右，三个连的编制，一色黄马，号称“黄马队”。我把敌骑兵部队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我边介绍边分析说：“敌骑兵在沙峁镇内，从地形上看，山上敌人修了土围子，山背后和村内也修了一些掩体工事。此时窟野河水正在解冻，河上不能行走，部队难以过河。敌人依山傍水，我军大部队施展不开，攻起来十分困难，我军硬攻肯定能消灭这股敌人，但伤亡会较大。当然敌人是骑兵，在这么狭窄的地段他们也活动不开，战斗力也发挥不出来。”刘、宋首长考虑沙峁镇位于苏区中心内，所以决定必须把这个敌人插在苏区的钉子拔掉，恢复、扩大、巩固苏区。红二十八军三个团大约二千人马，有重机枪八挺，迫击炮两门，兵力上优于敌人。刘、宋首长决定二团由贺家川移驻梁家仑，准备占领沙峁西面刘家坡村；一团、军部移驻孟家焉村，准备由山上来占领沙峁镇背后山头；三团由王桑塔村顺河滩向沙峁镇进攻。进攻在拂晓开始，由于敌人有山上的土围子和工事掩护，大部队一时难以在狭长的河滩和山路上展开来，冲了两次，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部队也有些伤亡，一时也难以彻底解决战斗。刘、宋、唐首长研究后认为，硬攻是可以攻下来的，但我们的伤亡可能会加大。他们问我：“如果我们暂停不打，估计敌人会有什么行动？”我说：“敌人肯定要跑！一是敌人深入苏区孤立无援，石窑上敌骑兵最近也距此四十里，骑兵沿河走不通，走山路也有困难，如来救援也须经一天时间到达，况且一天对骑兵走山路来讲也很紧张；二是敌人的骑兵在这里发

挥不了作用，全是黄土山地和即将开冻的河道，这里不是内蒙古大草原，骑兵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三是我们有重机枪、迫击炮，这个架式他们跟本就没见过，吓也把他们吓跑了。”志丹首长问：“敌人如逃跑，可能会从哪条路走？”我说“现在河刚开冻，留离的冰块多，河水又大，过河不可能，他们只有从北面走石角塔上山到红教寺，从石角塔爬到红教寺山，再到瓦罗、兰杆堡，除此之外别无它路。如果我们今晚把部队埋伏在红教寺山上，敌人明天肯定从这里逃走，我们居高临下，可以全部歼灭它。”刘、宋、唐同意了我的意见，把部队移到石绊村去，那里是敌人去红教寺的必经之路。吃了晚饭，我请示志丹：“队伍是不是该出发了？”志丹反过来问我：“敌人会不会走？如果敌人不逃走，又不走红教寺，我们把部队调动也不好办。”我说：“敌人一定要走的，红二十八军的到来他们早已恐惧，现在他们得不到供应和支援，加上今天我们对他的打击，他们必然逃跑，目前他们也只有走红教寺一条路可以逃脱。”志丹说：“我们刚才研究了一下，部队到神府佳榆后连续打了几仗，今天又打了半天，一直没能好好休整，太疲劳了，今晚就不把部队拉上山了，我们静观敌人的动静吧。”

第二天天刚亮，我和志丹到就近的山头上拿望远镜察看敌人的动静，发现敌人正在沙峁山头上做工事。志丹说：“兆相你看，敌人还在修工事，看来是不会逃走的，我们先困他一天再消灭他也不迟。”我们回来吃了早饭，不一会，沙峁镇有老乡跑出来找我说：“敌人开始准备撤退了，很多反革命分子都准备跟着走。”沙峁镇距我们驻地还有八、九里路，听老乡讲后，刘、宋、唐首长和我都到就近山头上看。敌人先头部队已由石角塔半山腰向红教寺走去。志丹转身问我还能不能赶上？我说不行了，这里距红教寺十来里路，而且要经土洼村，要翻山，还要跳一个很大的石沟，看起不远，翻山跃沟路不好走。志丹看着远去的敌人自言自语说：“可惜，让这股敌人溜了。”

在沙峁镇住时，老乡们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断来找我谈这谈那，热情的很。一天，我正在门口与老乡谈话，听到志丹对宋政委说：“你

看，兆相在这一带很有群众基础吗，群众很信任他啊。”我听到后转身对志丹说：“没有根据地的这些热心的群众，我们各个红军支队和红三团就难以生存发展啊。”第二天，红二十八军就移驻到贺家川，刘、宋首长让我在沙峁镇负责整顿秩序，以防大部队走后敌人破坏，完事后迅速到贺家川与他们汇合。

我和留下的同志把沙峁镇的老乡们集合起来，召开了会议，建立和恢复了村政权，赤卫队等组织，要他们自己把秩序维持好，严防敌人破坏。村里的群众革命热情很高，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赤卫队，有的还坚决要跟着我随新红三支队一块走。留在村上的人一再表示维持秩序没问题，敌人如有什么动向会立即向我们报告。这个镇子原本就是我们神府佳榆苏区的根据地之一，村内有许多同志在外参加革命，而且有一些都是革命的骨干力量和领导者，所以整顿恢复秩序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第二天我就赶到贺家川向刘志丹军长报到，带新红三支队与红二十八军汇合在一块。这次沙峁战斗虽未歼灭敌(黄马队)人，但把驻守在神木城的敌人可吓坏了。他们听说刘志丹带大部队上来了，装备有机枪和大炮，人数众多，所以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一旦刘志丹的红军打到，就随时可以逃跑。趁此大好形势，神木、府谷两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把不久前在敌人第三次“围剿”苏区时失去的地区都恢复扩大了。这次沙峁战斗吓跑敌人的主要原因，是刘志丹同志领导下的红二十八军北上，造成了极大声势，国民党的部队和还乡团、反革命分子对刘志丹的威名早有耳闻，听到志丹的到来都唯恐跑不及，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再加上红二十八军北上神府佳榆苏区后，贯彻了1935年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沿路打了数仗，经过了静多敌占区，很好地贯彻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充分发动了群众，使许多敌占区的老乡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说刘志丹来了，不会乱杀人，所以许多村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把地主武装、还乡团赶跑了，府谷地区被敌人占去的地方也全恢复了。神府特委及时派了各级党组织去领导组织恢复苏维埃政权机构，做好各方面的善后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使原有的苏区得到了恢复扩大，许多青壮年

纷纷要求加入红三团、新红三支队、红十一支队、府谷红七支队等，去保卫苏区，整个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景象。红二十八军在沙峁战斗结束后，到贺家川进行了休整训练，刘、宋首长每天仍然与我们一块研究分析敌我情况，准备带领红二十八军继续北上府谷，找机会再给“围剿”苏区的敌人一个更沉重地打击。晚上闲时，我们几个点上小油灯，坐在土坑上款天就地，谈过去，说未来，好像总有就不完的话，想靛出来才感到痛快。记得有一次，大家谈到党内某些人的“左”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时，我突然问了一句：“军长，听说你被党内一些人抓起来后，也受了不少苦？还给你上了刑，是真的吗？”志丹同志说：“是啊，你看我为什么老是流稀鼻涕，这就是辣椒水给造成的。多亏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及时救下我们这批人，把我们放出来，解决了一些问题，要不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坐在这畅谈了，那些个学生娃懂个啥，只有一点空洞的、自己都没搞明白的理论知识，什么社会经验也没有，不搞‘左’的那一套他们又能干什么呢？他们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辞，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中央会给我们搞清楚的，历史必将会做出正确的结论。”（注：刘志丹同志虽然被放了出来，并被任命了重要职务，据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还没摘）我听着志丹同志的话，深有感触地说：“军长，你受苦了，我们神府佳榆苏区静多同志也曾受到过不少打击，有的也因此没了性命……”。接着我也谈了自己从七个人的特务队到三支队、红三团被多次撤职，父亲也被特派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等等事情时，我忍不住掉泪了。我告诉他，我父亲一直支持兄长王兆卿和我参加革命，并曾多次掩护资助过许多陕北党的负责人。志丹听到这里说：“别难过了，‘左’的那一套对革命伤害太大了，我们那里也害死了一些好同志，有些问题，时间会做出结论的，相信我们党中央会把问题搞清的，现在你看，我们不是都挺好吗，我们现在又见面了，而且还一起战斗。”这时志丹又说：“你哥王兆卿可是个好同志，他是25年入党的，搞兵运很有经验，我和子长同志与他很熟悉，可惜他牺牲太早。那时我们都叫他王麻子呢。”听着志丹同志轻松愉快的谈话，我深

深感觉到，志丹同志的胸怀是那么开阔，他为了整个大局的利益而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几天来，与志丹、任穷同志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好的品质。

没几天，部队接到中央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给红二十八军的电报，命令立即打开黄河东岸山西罗峪口和黑峪口两个重要渡口，接应中央东征部队，把神府佳榆苏区作为红十五军团的巩固后方，准备安置伤病员等工作。接中央指示后，志丹军长、宋任穷政委和我们研究，过黄河必须解决渡船的问题，于是我立即派王道山去黄河岸边他的家乡王家沟了解船的情况，同时军首长与我们一块研究了山西罗峪口的地形和晋军布防情况，并一块到沙峁头后山、下王家坪山头上实地勘察了一下黄河对岸罗峪口的地形。这里正和罗峪口隔河相望，河虽不宽，但水流湍急。罗峪口驻防有阎锡山的一个编制不满的营，沿河构筑了不少工事，整个河面一条船也没有，全被山西晋军给抢走了，晋军认为红军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过不了黄河。回到贺家川，刘、宋首长已下决心打下山西罗峪口，消灭对岸晋军。但过河唯一条件就是船，而船必须要在三、五天内至迟七、八天内弄到。此时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也赶到了军部，他们都问我怎么办，能否搞到船。我说：“军长，没问题，我已派王道山回王家沟想办法搞船，虽然目前一条船也没有，但只要我们去沙峁头上游二、三十里的王家沟、采林、刘家湾一带动员一下群众就能解决问题，那里村庄多，人口多，全靠黄河，人人都会放船，很多老乡会造船。那一带靠黄河，村庄都紧靠山脚，山高，沟多，极好隐蔽，那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革命热情高，保密安全，利于我们的造船行动。”志丹问我在几天之内能造出三、五条大船吗？我说：“行！”刘、宋首长听了后说：“兆相，这可不是耍的！真行吗？”我就：“首长，放心吧，没问题”。志丹军长看着我就：“好，兆相，这就交给你去办了，最多只有七天时间给你。”杨和亭同志看事情重大，又特别紧急，就说：“我和你一块去。”

我和杨和亭同志当天晚上就动身，一路走一路说话。和亭同志问我：“兆

相，七天之内造五条大船你有把握吗？”我说：“你就放心吧，你来咱苏区时间不长(刚到二个月)，还不完全了解这里的群众，这是咱老根据地，这里群众只要红军有事，他们会把自己的命豁上去做的。”走到距采林村二十里的高家山一带时，杨和亭同志自言自语地说：“红二十八军过山西配合中央红军东征这样重大的任务，我们应该派人配合他们的行动才好，也可以趁此机会开辟一下山西的根据地，并作好接应红军东征部队的工作，这样重要的任务，必须找一个得力的人去才放心，你看靛合适？”和亭一边走，一边反复踱了几遍。我知道他是对我说的。开始我故做没注意，也没说蠢，后来让他唠叨的我忍不住了，就说：“得，和亭同志，你就痛痛快快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吧，我现在跟随刘军长和宋政委，如特委仍信得过我，认为我带人去山西合适，给刘军长说一声，我就去，你也别吞吞吐吐的了。”和亭一听我这么说可高兴坏了，马上就说：“你真愿意去？太好了，你和刘军长熟悉，黄河两岸的情况你也清楚，你去，我们就放心了，你把新红三支队带上好了”。(注：老红三支队 1934 年 9 月 18 日改编为红三团后，又组建了一个新红三支队，剧组建时只有二十几个人)

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已到采林村，找到先期回王家沟的王道山同志，当夜便召集附近几个村的干部开会，由杨和亭同志做了动员，我布置了任务，各村干部听了都特别高兴，他们裁，树有的是，人也有的是，造船没问题。最后大家又共同想出了不少好办法，决定了这次造船任务的具体组织领导者，提出把造船和木工手艺活好的人如何编排，并决定了在哪条沟中造船更加保密，更加安全等问题。大家一致表示，一定按军部和特委指示，保质保量提前完成这次任务。散会后他们回到村内，各自连夜组织骨干，积极分子布置任务，紧张地行动起来。当群众听到刘志丹带红军要打黄河对岸的罗峪口时，个个摩拳擦掌，情绪十分高涨。在特委领导下，几个村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他们日夜三班工作，把七天当成二十一个工作日。许多群众把自己家的门板都拿来造船板用，经过努力，只用了六天时间就全部完成了红二十八军刘、宋首长交待的任务。刘志丹和特委领导同

志专门召开造船工人大会，刘志丹向他们讲了话，还敬了酒，紧接着又向船工作了抢渡黄河的动员。

在造船工作进入正常运转后，我便把组织工作交给了王道山等同志，奉特委指示作过黄河配合中央红军东征开辟山西新区的准备工作。我到二区找到在此待命的新红三支队，向他们交待了配合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罗峪口，并在山西开辟新根据地的任务，同志们听说跟刘志丹上前线高兴得都快跳起来了。许多人还没见过刘志丹，都想亲眼看看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我带红新三支队迅速赶到沙峁头镇时，红二十八军于当天早上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抢渡黄河成功，并把盘踞在山西罗峪口的晋军一个营全部消灭了，还俘虏了敌营长，紧接着三支队和红三团的一连连长吴子明奉命过河接受新的任务。我在处理完沙峁头的善后事宜后，把杨孝先同志留在沙峁头负责后勤供应，便于当天中午过河到达红二十八军军部，进门就看到刘志丹、宋任穷二位首长在那里生气，发脾气，严厉批评一些同志违反政策，把不该没收的商号的财产也给没收了，下令把负责后勤供应，此次行动的负责人王道山关起来，还说要严肃军纪处理他。我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对志丹和任穷同志说：“王道山是个很好的同志，对敌斗争坚决，工作积极肯干，他负责后勤供应，筹款筹粮的工作，到新区政策性不强，这与我们过去政策教育不够有关，我们应负有责任，再者他也是为部队供应着急而犯错误的，还是放了他，让他负责把善后工作做好吧。”志丹征求了一下宋政委的意见，把王道山放了，而后又对我说：“好吧，兆相，这个善后工作你叫人去处理吧，一定要使商号老乡满意才行。”于是我让王道山和红二十八军政治部的几个同志，把没收商号的东西都找了回来还给商号，损坏了的东西全部如数赔了款，并向老乡一再道歉。商号老乡很满意，到处传说红军好，刘志丹的部队好。这次把王道山也吓坏了，他说：“好家伙，险些把命给丢了”。我说：“这一次也算对我们每个人的一次教训吧，我们过去对政策的学习太不够了。”

第二天，红二十八军奉命北上攻打山西黑峪口，此时红十五军团已到

山西岚县、兴县一带了。刘、宋命我带队留下，任务是：一、要尽快把山西罗峪口和神府沙峁头渡口秩序整顿好，维持好；二、要保持与神府佳榆苏区的联系，准备接应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团的东征工作；三、要准备转运红军伤病员和后方供应前方的物资。罗峪口是山西省临县、兴县和陕西神府地区商业往来的重要渡口，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人口有二、三千，商业买卖很多，是沟通山、陕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因此闫锡山经常派重兵把守，并设了各种机关和关卡。我奉命很认真地整顿了罗峪口的社会治安，建立了以王道山同志为主席的苏维埃政权和相应的各类机构，为中央红军的东征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神府地区自红二十八军打上来了，形势一派大好，当地一些青壮年听说我带红新三支队到山西去开辟新区，配合红二十八军东征，都纷纷跑来找我参军。红新三支队很快就增加了一百多人，编了三个连。红十五军团送来一些替下来的轻机枪、步枪和子弹，迅速把这支部队装备起来了，这比我们原红三团的装备都好。我在俘虏里把打罗峪口时俘来的那个营长找来，向他讲明了政策，要他在俘虏里帮我们挑选两个老实的、懂得机枪性能、会训练部队的人。那个营长满口应承，保证找两个合格人选。他找来一个叫尹福善，一个叫梁仁富，经过时间检验，这两个人确实不错，无论是训练部队，还是教战术技术都可以，后来尹福善还当了副连长，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梁仁富在战斗中表现也不错。从新红三支队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后来被扩充为红四团。在罗峪口我们给俘虏作了一些教育工作，除留下当教员和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全部给路费释放。不久，红十五军团给红二十八军送来几万发子弹，要我亲自送给红二十八军。我把守卫罗峪口的任务交给王道山和后来过河的红三团吴子明一个连，带上红三支队押运弹药追赶红二十八军。我们这支一百多人的部队步枪齐全，有八挺轻机枪，子弹充足，加上这些天的强化训练，还很是象个样子，一些在神府地区养伤病的原红三团的部份干部、战士，听说我要带新红三支队走，也偷偷跑到三支队来了，三支队的战斗力和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到了桑湾村顶头就碰到红二十八军南来了，正好

也赶上闫锡山派飞机来阻挠部队前进，他们一通轰炸、扫射，似乎在庆祝我们的会师一样。我把部队分散隐蔽起来后，就直接找到刘志丹、宋任穷、唐仁杰等同志，把红十五军团送来子弹的事向他们做了汇报，在交接子弹后，刘志丹同志笑着突然问我：“兆相，你老实告诉我，你们到底打了多少埋伏？”啊哈，我留下几千发子弹，军长一下子就知道了，我心想，我还想向你再要点呢。于是我笑着说：“军长，我可没打埋伏，我还想向军长再要点子弹呢。”宋政委、唐参谋长都笑着看我，唐参谋长笑着说：“你王兆相如果不打埋伏，那才怪了。”志丹军长笑着对我说：“好了，兆相，我理解你们的困难，我不管你打了多少埋伏，你们守渡口，接应中央红军东征，转运物资和伤病员，责任重大，我现在再给你二百发子弹，加上你打埋伏下的也不少了。”我马上说：“谢谢军长关心。”接着刘军长、宋政委给我简要谈了一下情况，说黑峪口敌人已闻风而逃了，红十五军团到了岚县一带，红二十八军奉命南下和中央红军主力汇合，准备集中主力歼灭闫老西几个师，他们说：如果这个战斗任务完成的好，对我们今后在山西与闫老西的斗争和巩固陕北根据地大有好处。志丹和任穷同志又向我交待：“你不跟我们南下，你负责维护罗峪口、黑峪口这两个重要渡口秩序，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地方政权，渡口是我们东征红军与苏区联系的通道，保护好它以利主力红军作战。”志丹又说：“目前闫老西调了几个团在保德县一带集结，企图沿河而下强占这两个渡口，截断主力红军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你要加强侦察和戒备，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注意经常和我们取得联系……。”

红二十八军南下后，我便带领新红三支队直接进入黑峪口镇，原驻守在黑峪口的晋军一个连，听说刘志丹的部队打上来了，早就吓得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我与三支队的同志立即开始整顿黑峪口的治安和社会秩序，建立各种相应的政权组织，并派出部队监视保德一带晋军的动向。刘志丹、宋任穷等同志带领红二十八军从兴县康宁镇、白文、临县、离石县与敌战斗数次，最后打到中阳县，包围了三交镇的敌人，在1936年4月14日视察攻击突破口时，刘志丹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不久，当我听到刘志丹同志

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万没有想到这一次见面就是我和志丹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三支队的许多指战员知道后，有的眼睛都哭肿了。这些同志虽然与刘志丹同志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刘军长的胆略以及他高尚的品质、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刘志丹同志的牺牲使我们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我失去了一个好领导，好战友。这次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到神府佳榆苏区，一方面把神府佳榆苏区和陕北、陕甘苏区之间打通了关系，另一方面也为中央红军东征做好了大后方的准备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10 周年

贾虹生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是毛泽东主席对刘志丹同志的崇高评价。作为中央军委认定的三十六位革命军事家之一，刘志丹不仅对西北地区工农武装斗争和革命政权建设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历史性贡献，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不尊重自己的历史，而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都会敬仰自己的英雄。刘志丹同志短短三十三年的传奇经历，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值得国人世世代代纪念、传颂、学习和继承。这就是我们在纪念这位伟大民族英雄诞辰 110 周年时所表达的心情。

刘志丹和西北的老革命家们创建和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在他们率领下，通过反“围剿”斗争，把陕北革命根据地也连在一起，形成了包括三十多个县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可靠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可以说，这在中国革命进程的大局层面上，起到了挽救红军，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作用。正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没有陕北，我们下不得地”。而如果没有这个硕果仅存且扎实的根据地，以及后来在中共中央统筹领导下，把它造就成革命的大本营和战略指挥中心，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以这样的角度，重新审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时，就更觉得刘志丹等西北老革命群体贡献的重大。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仅存的硕果，绝不是偶然的。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带领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工农红军将士和广大劳苦大众，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建立武装割据，开展人民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重视根据地政权建设，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一系列的做法，是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最基本、最成功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体现。

同时，西北地区又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等同志提出，要以红色的、灰色的、白色的多种形式，即工农武装起义，改造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土匪武装，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运。虽然曾被“左”倾的领导批评为“土匪武装”，“队伍不纯”，但实践证明，它是切合当地实际而且极为有效的策略，否则，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同时建立陕北、关中两个游击区，三者互为犄角，形成“品”字格局的做法，虽然被“左”倾的领导批评为“梢山主义”、“逃跑主义”，但实践证明，它既适合陕、甘地区的特点，也完全符合军事斗争原则，否则，这些红色根据地怎么得来？又怎么不被攻破？连毛主席都赞扬这种“狡兔三窟”的做法高明。

比如，西北的红军普遍与“哥老会”关系较好，还经常得到他们的物资支持。与杨虎城的西北军有互不侵犯协议，与一些地方民团也有互不侵犯的“默契”，致使红军和红色政权得以生存、休整、壮大。虽然被“左”倾领导批评为“投降主义”、“勾结反动政权”，但事实证明，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策略，最终被总结、提升为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比如，在土地改革中，对地主、富农不搞扫地出门，而是也分给他们“坏地”，让他们自食其力。虽然被“左”倾领导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是“革命不彻底”，但实践证明，这种较为“人性化”的政策，削弱了敌对势力的反抗，能得到更广大群众的认同，从而避免了过于激烈的“左”的做法，使土地改革得以有效推进。这样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是更加良好的，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更为有利。

再比如，陕甘边根据地不仅开展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军事斗争，同时还努力搞好政权建设。以“豆选”方式，多次进行民主选举，选出以习仲勋

为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刘志丹同志在公开场合向习仲勋敬礼，自觉维护群众选举而来的政府威信。

还比如，根据地积极开展与国统区和国民党军队的贸易，经济政策也十分灵活，使根据地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开展文化教育，创办“列宁小学”等等措施，都为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支持。认真研究陕甘边根据地的“七月决议”、“十大政策”就会发现，这块“硕果”之所以能够“仅存”，是完全有道理的。人们说：“细节决定成败”。在陕甘边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也能证明这一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刘志丹等老革命家的成熟风范和居功至伟。

我的父亲贾拓夫也是陕北的老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就一直参加陕北的革命斗争。1929年在榆林召开的“红石峡会议”上，时年17岁的他就结识了刘志丹同志，是陕北、陕甘搞“三色”武装斗争决定的见证者。之后，他调到西安，任团市委书记，又被派往陕南，代理陕南特委书记。1932年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也负责一些组织和巡视工作，与陕甘边游击队、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等多有联系。他代表省委向这些部队派去不少骨干，杨森、张秀山、高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933年7月28日，我父亲和当时省军委巡视员高岗与省委书记袁岳栋、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西安福盛楼以吃饭为掩护，召开临时省委会议时，被敌特发现。袁岳栋和杜衡被捕，我父亲和高岗逃脱，袁、杜随即叛变，致使陕西省委遭到巨大破坏。我父亲在做了一系列紧急处理后，于8月中启程向北方局和党中央去汇报情况。他在1933年11月向党中央的书面汇报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的过程和紧急应对措施，并提到：“渭华我们已与县委书记讨论了。我们离开陕西时还在渭华留了一天，解决了些问题，并决定子丹、子文、世泰们的工作(二十六(军)失败后，他们四、五个人藏在渭华)。(注：子丹即刘志丹，子文即黄子文，世泰即王世泰)派子丹、世泰到四团去，子文到韩城梁占魁部去工作，把梁组织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

路旗帜下。我找见高麻子(即高岗)，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

报告中还提到，“二十六军的问题，我在河北时，也曾与河北负责同志谈过，派浩如(即谢子长)与鸿雁(即阎红彦)回去，鸿雁到二十六(军)去，浩如到陕北游击队去。”

后来事情的发展过程表明，上述建议和安排都实现了，而且在他们的领导下，红二十六军旗帜不倒，并从一、两个团扩大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陕北游击队扩大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刘、谢会谈，组成统一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刘志丹的指导下，取得反“围剿”胜利，把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陕甘边和陕北的武装斗争是多么艰险。他们能坚持下来，前赴后继，最终打出二片西北革命根据地，又是多么不容易!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有“左”倾路线的影响和叛徒的出卖，但陕西的党组织在贯彻党的开展武装割据，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大方向上，一直是坚定的。

今天，我们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10 周年，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就是要牢记他们的巨大贡献，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把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保护好，建设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同时，我还想说：历史是需要鸟瞰的，特别是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所谓的“细节”，“历史真相”以及“恩恩怨怨”中。在大量的历史信息和“信息爆炸”所形成的“碎片化”时代，如果没有整体的、全面的和历史的、客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大方向，就不能真正起到总结经验教训，凝聚共识，团结向前的作用。作为后人，我们应接过革命前辈的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一代一代地奋斗下去。

贾拓夫(1912——1967)陕西神木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关中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父亲最敬重的人

张元生

刘志丹是我父亲张秀山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从1931年到1936年，在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刘志丹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深重。只要他在家休息，歌唱刘志丹的音乐就回响在家中。在晚年，他写下了多篇回忆刘志丹的文章。

父亲与刘志丹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4月。当时，刘志丹刚刚出狱来到甘肃平凉，父亲也从定西到了那里。在这之前，父亲同他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却相当熟悉，也听到过一些他的革命事迹。他是西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1924年入团，第二年春入党，上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在广州受到过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教育。八七会议后，他回到陕西，参与部署陕西各路的起义计划，亲身领导1928年著名的“渭华起义”。党的六大后，他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后并代理陕北特委书记，直接领导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的这些经历，使父亲十分敬佩。

父亲说：志丹同志在创建陕甘、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从而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他重视理论，也善于学习，而且学习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他善于从革命的实践中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于西北革命的具体实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刘志丹联系自己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深深体会到中央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他在军阀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时，几次同父亲谈到这个问题，并一再告诫父亲，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当时对旧军队中文职人员的称呼）。他对父亲讲了在大革命时的沉痛教训。他说，那时，他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个营或一个

团，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允许，让他在马鸿逵的部队中当了个政治处长。结果，“武汉政变”一发生，他便被从军队中赶了出来。他说，如果他那时带兵，本来是可以起义的。

刘志丹在陈部搞兵运工作时，并没有忘记农民，他曾多次派人去陕西南梁一带组织党员，联系当地的农民武装，建立革命队伍。后来，这支队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重要力量。他向往井冈山道路，多次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我们一定要象毛泽东、朱德同志那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他说了，也做到了。陕甘、陕北根据地就是学习井冈山道路建立起来的。

八十年代初，父亲一出来工作就来到陕甘，在南梁他对力贞姐说：志丹有远见创建了这块根据地。

父亲说：志丹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思考问题。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1933年8月，薛家寨失守后，使我们想到根据地要在哪里建立？志丹、高岗和我一起研究这样的问题。我说：兔子有三个窝。兔子为什么要有三个窝？因为一个窝恐怕人或者别的走兽捉住它。在一个窝里住长了、经常住，就容易被别人知道。所以，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1933年冬，志丹根据西北形势的特点，和我们一起研究起草了“陕甘边关于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决议”。这个决议提出，在陕北、陕甘边和关中建立三个革命根据地，以利我军取得较大的回旋余地，机动作战，各个击破敌人。这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在此之前，红二十六军已派强世清、魏武、杨重远、白雪山、王兆相等同志去安定、绥德、清涧、神府一带在地方党领导下建立了游击队。同时，志丹提出在关中、陇东地区展开攻势，建立了合水、保安、庆阳游击队，派杨琪同志任二路总指挥。在关中，红二十六军派出张仲良、王安民等同志组成三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反复的斗争，上述设想终于实现，为粉碎敌人“围剿”，把各个苏区联成一片，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父亲说：志丹同志有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他能及时抓住有利战机，积极、主动、灵活、果断地消灭敌人。1934年2月，志丹指挥红军由照金北上，沿途歼灭了姚曲、小石板、五雷镇等地的民团，经张村驿、直罗镇、黑水寺直到东华池。在从东华池出发时，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部队要向安塞、安定进军，但部队进至保安县刘家砭时，突然掉头西去，经三道川，奔袭蔺家砭，出敌不意，一举歼灭了张廷芝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骑兵连。接着，封锁消息，断绝了西去的交通。第二天，迅速出击，消灭了元城子、李家梁两地的民团。之后，又挥师南下，经合水抵达西华池。这时，敌人随后追来，红军乘敌尚未展开之际，立即发起攻击，红三团正面出击，骑兵团侧翼迂回，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一举歼敌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红军取胜后，回到南梁，稍加休整，又南下消灭了槐树庄之敌。就这样，红军在短短的半个月内连续作战，打了九个胜仗，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我军则越战越强。

志丹指挥作战，之所以常常取得胜利，还由于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长期战斗中，他争取一些地方势力，暂时保持了中立，从而使我军得以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

父亲说：志丹党性强，守纪律，有全局观点。他曾多次遭受错误路线和宗派活动在“整军”、“反右”、“肃反”等名目下进行的打击，但他一直能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出发，坚持真理，顾全大局，从不计较私人恩怨和个人的得失。父亲讲过几个事例。

事例一，1933年6月，红二团南下后，照金根据地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仍在坚持和发展。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王泰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组成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以及耀县游击队，先后来到了照金根据地。为统一领导，在特委召开的陈家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游击队连续出击获胜，并打下了旬邑县城张洪镇，使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刘志

丹回来后，大家既关心他的身体，也关心他的工作。谈到工作时，他说：“你们原来怎么做的，还照样做，以泰吉同志为主，我可以协助他工作。”这样，他就担任了总指挥部参谋长。

事例二，在陕甘时期，红二十六军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直进行斗争，但没有采取打击政策，只在师委领导机关进行思想斗争，一个一个地耐心说服。如，某某团长，叫他领导关中游击队，他钻在山里买些肉酒吃，不敢出去，结果敌人来了，把游击队打垮了。他还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活动。当党委确定开除他党籍时，他正在生病，写好了决议准备给他。刘志丹说他正在生病，等他病好了再通知他。党内斗争中始终是爱护，总是耐心教育。对拥护他的下面的干部，也不撤职，当觉悟后还提拔，一个也没有开除党籍。对党内机会主义决不是排斥他们，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采取这种方法，才是真正的党内斗争。

实例三，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召开的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上，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以及郭洪涛讲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二十六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项大帽子”。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刘志丹等陕甘边特委的领导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四十二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四十二师的部分主力红三团到陕北协助作战。

实例四，陕甘虽远处西北一隅，但刘志丹心怀全局，一直向往着全党，向往着中央，关注着其他苏区的斗争形势。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陕北时，他十分高兴，大力动员群众热情接待这些战友和同志。他还一再号召大家向红二十五军学习。当他得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北上陕北时，他立即建议红十五军团去接应中央红军。

刘志丹胸怀坦荡，作风正派，联系群众，深受西北军民的爱戴，在人

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他是父亲最敬重的人。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领导甘肃靖远兵变。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大队长,第二十六军连长、团政委、师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绥德县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松江省委、辽宁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七大代表、中顾委委员。

斯人已逝 情谊绵绵

王又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搞武装斗争创建西北红军的时代，父亲汪锋与刘志丹有了同志情谊。父亲最早认识刘志丹是在1928年爆发的渭华起义时期。父亲当时是以党员身份和其他同志率领100多人的民团驻守起义中心附近的厚子镇、许庙，山王村等地，配合起义主力阻击南路之敌。后来在家乡的流峪口、张家坪一线接应和掩护退却下来的队伍。在蓝田县委统战关系工作的作用下，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将受困于秦岭深处霸龙庙的刘志丹接到张家坪，与许权中，王泰吉等汇合。1931年底，受陕西省军委的指示，父亲通过张汉民、阎揆要等同志，为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送去了部队急需的物资。1932年到33年之间，父亲先后在陕西省军委、渭北特委军委和在三原中心县委工作，都与刘志丹有工作上的来往。后来受党的委派，父亲于1933年3月到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组创的红二十六军工作，和刘志丹一起共同生活战斗了4个月。7月上旬，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父亲腿部负伤离开了部队，转而去陕南工作，两人就此分开。1935年，父亲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刘志丹在前线，没有见面的机会。后陕北“肃反”，父亲被关押，虽然和刘志丹关押在一个地方却无缘相见。12月，父亲受毛主席亲自指定，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和杨虎城将军谈判。接受任务匆忙，因此他第一个离开了“肃反”关押地，而此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还在继续关押，也不能见面。1936年2月，父亲从西安返回，不久就传来了刘志丹在东征前线牺牲的消息。

父亲生前每每提起刘志丹，总是有无限的回忆并表露出眷念之情。1974年路过西安，他带着我步行七扭八拐地找到了刘志丹爱人同桂荣的家，进门就叫我叫妈妈。两个老人半蜷着腿坐在床沿上唠嗑，说得都是老故事。说到了“刘嫂子”的臊子饴烙是赞不绝口，非说“刘嫂子”还欠他一顿。当得知“刘嫂子”家有人身体不好，父亲想了想说：“有个麝香包子就好办

了”，并说：“嫂子放心，我来搞。”后来父亲回到甘肃果然不食言，多方打听设法终于在甘南地区搞到了两个，让我把东西寄出后，他那天很高兴。只要过西安，“刘嫂子”他是必须去家里看的。

父亲生前多次写文章和诗词缅怀刘志丹，但从南下失败后两人未能再得一见，对此他总是如鲠在喉，多次遗憾地说过：“如再见一次就好了。”

汪锋(1910—1998)陕西省蓝田人。192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渭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工委书记、陕南特委书记、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1937年后，历任鄂豫陕边区党委书记、军委书记。1946年任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政委，后任陕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1949年至1954年，历任西北局常委、统战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委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主任。1958年兼任中共宁夏区委第一书记，196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任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1986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大候补中委，十一大中央委员、十二大中顾委委员。

恰同学少年

——纪念刘志丹伯伯诞辰 110 周年

武 越

志丹伯伯是我父亲武开章最钦佩最敬重的人，我父亲与志丹伯伯是陕西榆林中学的同学。志丹伯伯 1922 年春考入榆中，在己班，时年 19 岁；我父亲 1924 年春考入，在辛班，比志丹伯伯低两班，时年也是 19 岁。榆林中学创建于 1903 年，当时叫“榆阳学堂”，1915 年——1927 年，改称“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那时，榆林中学是陕北 23 县中唯一的一所中学，它不仅是陕北的高等学府，是陕北青年学子极为向往的读书圣地，更是陕北革命的摇篮。1918 年，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进步知识分子杜斌丞先生，就任榆中校长职务。杜先生毕业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上世纪 40 年代他曾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名重一时），他任校长后，大胆采用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方针，选贤任能，先后从北京请来了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王懋廷、呼延震东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这些进步教师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宣讲“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仅把《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向导》、《共进》（半月刊）、《北方红旗》（中共北方局主办）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及《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带到榆林中学，还先后创办了《榆林之花》、《榆中旬刊》、《塞声》和《姊妹旬刊》等校园进步刊物，指导学生成立了“读书会”、“文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等团体。这批思想先进、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以他们进步的思想 and 渊博的学识，影响和培养着大批榆中学子，再加之杜斌丞先生“德智体三育并重”办学宗旨的贯彻落实，使榆中充满了勃勃生机。“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和抱负，逐渐在刘志丹等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心中树立起来。父亲一入学，

就置身于浓郁的革命思想氛围中。

父亲入学后，很快就知晓了志丹伯伯的大名，并认识了他。志丹伯伯当时叫刘景桂，任榆中学生自治会主席，是校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他不但积极组织、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而且非常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尊重师长、团结同学、主持正义、乐于助人，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尊重、拥戴。但刚开始，父亲并不知道志丹伯伯已在进行革命活动。父亲从佳县高等小学考入榆中，从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县城到了当时陕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商贸的中心榆林城，确实是大开眼界，见大世面了，自然是喜不自禁。入学后的星期天，他便和几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到距榆林城四五里外的金刚寺去玩，这是一处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很僻静的小庙宇，在那儿，没想到遇到了志丹伯伯和他们班的几个同学，父亲一行很高兴地上前去打招呼，志丹伯伯也笑嘻嘻地告诉父亲他们，乘星期天放假，自己也和几个同学到这里来转转……。到了又一个星期天，父亲又和几个同学到金刚寺去玩，让他惊讶的是，在这儿，他又碰到了志丹伯伯和伯伯的几个同学，这次父亲心里犯嘀咕了，他想：“景桂大哥学习用功是出了名的，他绝对不会连续两次到同一地方来玩，肯定是有事，会不会是在搞革命活动啊？”……事后，父亲得知，志丹伯伯确实是借游玩之名，找到离校较远又比较僻静的地方，进行革命活动。从此，父亲对志丹伯伯更加佩服、敬重。

父亲在学校，受到进步老师们的影响，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榆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志丹伯伯是成员之一，父亲也加入了。这批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年轻学子，在李子洲、王森然、呼延震东等进步老师的指导和参与下，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同年，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子洲，又在榆中成立了“共进社榆林分社”。

共进社成立于1922年10月，是“五四”运动后旅京陕西籍学生组成的进步社团，当时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共进社和共进社创办的《共进》杂志，曾经对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子

洲“推荐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武开章、张肇勤、李登霄、王季明、杨怀瑛等 20 多名进步学生加入共进社，培养学生骨干。”1924 年春，经王森然倡导、杜斌丞支持、杨虎城出资赞助，榆中学生会创办了榆中平民学校，杜斌丞任名誉校长，志丹伯伯负责校务，王子宜任教务主任，为榆林惠记工厂的工人义务上课，学生免费入学(学校一直坚持到 1927 年 6 月)。

“先后担任学校负责人的有刘志丹、王子宜、刘文蔚、汤登科、武开章、刘景向、王季明、李文芳、胡颖明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进社和榆中平民学校内，父亲和志丹伯伯有了更多的接触。志丹伯伯是师兄，他对学弟们非常关心，除了在政治上点拨、指导他们，还在生活上关怀他们，常问他们衣食冷暖的情况，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对学校自治会的工作还有何建议等等。父亲还积极参加志丹伯伯他们组织的各项活动，如推介革命书刊，参加时事研究会，听进步老师的讲座，到校外参加演讲、游行示威、募捐等活动。

1925 年 5 月，受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的派遣，耿炳光同志来榆林搞党的组建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经神木的王瀛推荐，耿在榆林直接发展我父亲(介绍人为耿炳光、刘景向)、王季明、张心斋几名榆中学生入党，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介绍给榆中党组织。之后又发展榆中学生郭洪涛、栾本植、庄培、苗从权等加入党组织。此前，在三、四月份，志丹伯伯已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父亲和志丹伯伯又成了党内的同志、战友和兄弟。榆中的党团员发展到了 50 多人，支部设在榆中平民学校。当时，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平民学校成为榆中党团组织宣传革命、唤起民众、发展组织的根据地。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工作，凡党团员在社会上公开活动，都不能以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而要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现。经党组织决定，父亲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分部委员。志丹伯伯则利用平民学校这个阵地，秘密地把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传授给父亲他们这些新党员，使他们尽快地成长。

1925 年秋，党组织决定派志丹伯伯去黄埔军校学习，消息传来，同学

们群情振奋，兴奋不已，又都羡慕至极，志丹伯伯也非常高兴。是啊，哪个热血男儿不渴望去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学习军事知识，然后驰骋疆场，以身报国呢！志丹伯伯离校那天，榆中学生几乎是倾校出动，去给伯伯送行。父亲他们送了很远，还不肯止步，志丹伯伯不断和大家挥手告别，劝大家别送了，可同学们还是簇拥着他，跟着他走，依依不舍。但父亲没有料到，与志丹伯伯这一别，竟长达10年多后才又见面。

1925年12月，父亲担任了榆中党支部书记，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着同学们和反动势力作斗争，直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按照组织决定，离开学校，回到家乡，转入地下，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1935年，父亲在神府红三团工作，当时，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暂时失利，神府的革命力量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神府苏区竟变为游击区域，神府军民一边继续坚持斗争，一边盼望着红二十六军来解围。同年8月，志丹伯伯以西北军委的名义，给神府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经过艰难的传递，好不容易才送到了神府。信中说：“我军连战皆捷，所向披靡，高桂滋被我军打败，已收缩到绥德、清涧、瓦窑堡三个城内，不敢出战。最近东北军在南线大举进攻，现我军要向南线作战，暂时不能派部队来神府作战。希望你们坚持战斗，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与发展。在今后胜利的战斗中，一定能派部队来神府和你们共同战斗。你们要动员全党全军及群众继续战斗，直到胜利。”这封信被传阅、传达后，给了神府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大家更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1936年3月，志丹伯伯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同时帮助恢复神府根据地，开辟东征部队的后方基地。3月20日，红二十八军进入神木边界，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敌军闻风丧胆，纷纷败退，神府根据地得到迅速的恢复和扩大。父亲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陈家坪开欢送并庆祝二十八军胜利的大会上，群众送给他们的慰劳品和粮食堆积如山，有些群众距离几百里路，跑来看他们时刻想念的刘志丹同志。”

父亲在神木见到志丹伯伯时，两人久别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格外亲

切。志丹伯伯详细询问了父亲离开榆中后的情况，并就神府苏区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土地分配等许多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志丹伯伯对父亲说：“现在神府苏区正在迅速恢复和扩大，根据地有许多重要工作要抓紧做，我知道你的笔杆子比枪杆子硬，搞党政工作能进一步发挥你的作用”。之后，根据志丹伯伯的提议，1936年3月间，神府特委扩大会议决定，父亲不再担任红二十一支队政委，接任神府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但父亲万没想到，这次与志丹伯伯短暂重逢后的分别，竟成了永别。1936年4月，志丹伯伯不幸牺牲，噩耗传来，父亲悲痛至极，失声痛哭，神府军民都沉浸在无限的哀痛中……父亲心中对失去兄长的无限痛楚，让他在事后多少年都不忍再提起这件事。

抚今追昔，岁月荏苒。志丹伯伯、子长伯伯等数以百计从榆中起步走向全国的共产党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我们将世代铭记他们的英名！

武开章(1905——1986)陕西省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红军第三团政治处处长，红三团十一、二十一支队政委、中共神府特委常委组织部长，神府分区党委书记兼第一河防司令部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处处长、中共绥蒙区委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新疆分局副书记、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山东省顾委副主任。是中共七大代表。

刘志丹与韩练成

刘米拉

1926年10月初，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这时，冯玉祥已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刘志丹黄埔军校毕业后，与唐澍、王尚德等被派往国民军联军工作。刘志丹被分配在总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不久被派往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马部多系回民，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和雇佣军教育，一说打仗，从上到下，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刘志丹到任后，耐心地向马鸿逵进行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鸿逵的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开展了新式练兵。回民战士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进行革命教育后，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策应北伐战争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功，这与刘志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1926年冬季，国民军联军从甘肃下来解西安之围。马鸿逵部队正在向陕西急行军。韩练成当时是警卫营的排长，在行军中发现一个穿着士兵服装的年轻人，是个陌生人，看神气像个学生，又像个军官，只见他一会走到这个战士的身边，一会走到那个战士的身边，和战士们谈话。刚下过雪，太阳出来后，路上很泥泞，所以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泥巴。韩练成心里很奇怪，哪冒出来这么个人？在我的队伍中穿来穿去，就问他：“你这个人为什么不走你自己的位？”

刘志丹笑了笑，没理他，还是接着和战士们谈话。韩练成生气了，上去把志丹从队伍中拉了出来，志丹还是笑着问：“你是班长？”

“你别管！反正这里是我说了算！”韩练成没好气的说。

志丹又笑笑，就走了。

志丹走后，有人告诉韩练成：“你惹祸了，那人是咱们总司令部的刘处长。”

“管他什么刘处长，张处长的，他在我的队伍里乱串就不行！”话虽这么说，可是韩练成的心里也不踏实，心想把处长从队伍里给拉出来，还差点给推倒在泥里，这总是不大好。不过他还是有些怀疑，按处长的地位，他应当是骑着马来，而不应当是跟着我们当兵的一块走。后来他才知道，志丹也是和他们一起从甘肃下来的。

到了礼泉，韩练成负责给总司令部放哨。晚上韩练成带哨，大约十一点左右，刘志丹出来查哨了。

在乾县时，街上雪下的很厚，刘志丹带着总司令部的军官出来帮助群众扫雪。他又是扫，又是抬的，这时韩练成才发现他戴着的军衔——一个红布牌，上面有个黑色的五角星，表示他是个少将。在扫雪的人中，就他这一个将军，当时士兵、群众议论很多，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来给老百姓扫雪，真是天下奇闻。而且都说这马总司令的队伍不一般。

在礼泉时，晚上下着雪，天气很冷。当时也是韩练成在带哨，刘志丹又是十一点出来查哨，韩练成也在查哨，和志丹碰上了。刘志丹问他：“你干啥？”

“我查哨。”

“你是什么职务？”

“我是排长。”

“你查完了吗？”

“查完了。”

“查完了到我那里坐坐吧。”

于是韩练成跟刘志丹到了他的住处，坐下后志丹问他：“你是哪里人？家里是做什么的？你为什么参军？”

刘志丹了解到他是穷人家的孩子，放过牛，读过几年私塾，就问他：“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你最想干什么？”

“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搞到三百块钱。”

“搞三百块钱做啥用？”

“有了三百块钱自己就能开个小铺，就不用给人家拦工了。就是因为东家打了我，我才跑出来的。”

刘志丹说：“就算你能弄到三千、三万，开个比三百块钱更大的铺子，那也还有更大的资本家来压迫你；还有帝国主义。主要是要革命，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开个小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依然会受到压迫。要想不受压迫，就要由近而远，就要改变整个社会！三百块钱，渺小得很哪！”接着志丹又问他：

“你认得字吗？”

他说：“认得！”

刘志丹给了他几本小册子，其中有《什么叫帝国主义》等，还对他说：“凡是和你一块的，无论是排长，班长，还是战士，只要和你的情况差不多的，他要是愿意和我谈谈，都可以来找我。”从此，他便和志丹接上了关系。

当时刘志丹给韩练成的印象是，这个人很和气，很斯文，很可亲，谈过话以后，他的心里很愉快。

韩练成以后就经常找刘志丹，觉得他说的道理很对，给人放羊，辛苦一年，只能挣一块钱，这不就是剥削吗。而且是祖祖辈辈受压迫。韩练成在他那里还找到一些新小说，比如高尔基的作品。

刘志丹谈话很有技巧，不直接提共产党，共产主义什么的，而是围绕着群众的切身利益，抓住每个人的特点，谈他们最关心的事，这样就把革命道理变成了群众的要求。

到了咸阳，准备打刘镇华，刘志丹作动员报告。此时刘镇华回西安去了。政治处的地位和其他处是一样的，甚至还受到一般军官的歧视，认为政治处是卖狗皮膏药的；而上层统治者，象马鸿逵就认为是在监视他的一个机构。而且他也怕政治处是在搞革命宣传，因为军阀和贪官污吏都有关

系。他们也知道一点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委员制，他害怕。刘志丹的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1)他必须要取得上层对他的好感和信任，而且相信他是为他们在工作的；2)要使广大官兵了解什么是政治工作。

为了取得上层的了解和合作，便于工作，他想了各种办法来做上层的工作。马鸿逵爱钱如命，时常克扣军饷，而政治处有一定的经费，而且处长的薪金也很高。刘志丹针对马鸿逵的这个特点，为了使自己能站住脚来开展工作，他提出要节约办公经费，并将节余的经费上缴。他把办公费省下来，而用自己的薪金进行工作；对周围困难的人，他私下里按时从自己的薪金里给他们的家里寄钱。他常说自己的钱多的用不完。于是，马鸿逵便在大会上说：“刘处长的办公费节余下来都上缴，为什么你们的经费不够用？”别的处长就对他有了意见，觉得你这样做，让我们以后怎么办？

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是马鸿逵的亲朋好友，一般对刘志丹都很好，志丹能抓住别人的特点开展工作，这样他的脚跟就站稳了。

在打西安前作动员时，刘志丹到连队，对韩练成说：“打仗了，你怕打仗吗？”

他说：“当了兵就不怕打仗！”“在警卫营里可打不了仗。”“那有啥办法？”

“别急，慢慢想办法吧。”说完，志丹就走了。

过了几天，忽然把韩练成调到团里去当连长。事前没有告诉过他。韩练成去报到前刘志丹对他说：“这一仗要好好打，咱们穷人娃娃要比那些少爷打得好才行！因为他们又胆小，又怕死。这一仗要打好了，咱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当时韩练成还不十分清楚这番话的意思。

刘志丹还向他交代：“要打好仗有几个必要的条件：1)要关心士兵，不能打骂他们；2)能吃苦，不怕死，打仗时要站在士兵的前边；3)不能虐待捉到的俘虏。这几条都是打胜仗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一仗，韩练成打得很好，西安城的西门是他第一个冲进去的。进了西安，他们驻在钟鼓楼上，不久，他当上了营长，带着一营人驻在钟鼓楼

上。这时，在军队里公开设立了“列宁俱乐部”，连队里组建了“列宁室”，还唱“国际歌”，宣传苏联的革命。韩练成是教唱“国际歌”的教员，这个歌是政治处教给他的。那时，就连西安的皇城也改成了“红城”。这时，整个西安都活跃起来，战士们也活跃起来了。

不久，刘志丹调到总政治部，和刘伯坚、邓小平等人在一起。后来可能又回到马鸿逵的军队。这一时期他们接触得很少。

韩练成当营长时，团里有个政治员，可能是党员，刘志丹对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对他讲。”政治处还有个秘书，姓林，和志丹很接近。后来那个政治员常拿些小册子给他看，他们还组织过士兵委员会，以后又没有了。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出潼关北伐，打倒北洋军阀！”

经刘志丹安排，韩练成见过刘伯坚一次。那次是把下级军官抽出来训练，要使每个军官都成为宣传员，要军官们既要能指挥打仗，又要会宣传革命。抽出来的军官中，只有他一个人是营长，其余的都是连长。刘伯坚和每个参加受训的人都个别谈了话，和他谈时志丹也在场，也批判了他的“三百块钱思想”。刘志坚问他：“现在你当上了营长，再给你三百块钱你还回家吗？”

“不回了！”他说。

他们告诉他：“过去的枪杆子是掌握在皇帝、官僚、老财们的手里，老百姓的手里是不能有枪的。因此你们只能给财主们放牛放羊，要是没有革命，不但你自己，你的儿子、孙子，都会是这样的。今天，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还有已经革命胜利了的苏联人民帮助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枪杆子从他们的手里夺过来，让咱们老百姓当主人。比如你韩练成同志，要是没有参加革命，你一辈子也当不上营长。第二步，我们还要打倒帝国主义。”

这时，刘志丹又向刘伯坚介绍了三年多来韩练成的情况。回去以后，来了个秘书，拿来一张表，有书本那么大，让他填。表上有姓名，文化，家里有多少地，有多少牲口，父亲是干啥的等等，他填了表。

当时韩练成才十九岁。在他的营中，排、班长和他关系好的不少。那

个秘书问他：“与你有联系的还有哪些人？要找可靠的，不要找马家的少爷。”经韩练成介绍，他们营里有十几个人都填了表。后来分散了，不知下落。

三、四月间，部队出潼关北伐。出发前，刘志丹找他们一块去吃牛肉泡馍。志丹让他有事就去找团里的那个姓吴的政治员。可是，出发时那个吴政治员病了，后来便失掉了联系。打洛阳时，韩练成当了团长，也给派来了政治员，因为不是刘志丹介绍的，所以他没敢去和这个人联系。后来和刘志丹也失掉了联系。

1927年5月，他们驻在洛阳，传来了国民党在兰州清党的消息，以前参加过士兵委员会的人被搞掉不少，军队一下子就恐慌起来，韩练成的思想负担也很重，因为他是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列宁室的主任。

刘志丹跟马鸿逵不会谈什么问题的。但是也可能会和马谈些革命的大道理。对于和韩练成在一起的营长、团长，刘志丹告诉他要有区别地和他们谈。在团长面前要服从，不要顶撞他，同那些少爷营长不要谈。

1931年，马鸿逵整韩练成，说他认识共产党员刘景桂。蒋介石问韩练成，他说是认识，你也认识，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马鸿逵也认识，难道他也是共产党员？

刘志丹很善于应付这种环境。马如龙(马鸿逵的副官长，后为兰州市政协委员)和刘志丹的关系就很好，刘志丹离开时，马如龙就曾给他拿过路费。

韩练成当了团长后，就已经掌握了一个团的武装，这样发展下去，再过一年，就可以掌握住三个团。

马有两个师，两个旅，六个团，另外还有一个骑兵旅。出潼关后，改编为军。刘志丹刚去时抓到一个连，国民军联军进西安时抓到一个营，如果时间再长一些，他就能抓到一个团了。那时填过表的军官有营长一名，连长八名，排长二三十名。连长中有两三个是回民，其中一个叫马贵才，后来还当上了马鸿逵的师长。马贵才是韩练成给填的表，填过表后，第三天他就当上了营长。他以前是个给人放牛的苦孩子，是抓兵给抓来的。他

的文化不高，话说得不太明白，经常被马鸿逵给撤职，因为他常宣传共产党。

后来虽然没有成功，但刘志丹在马鸿逵的军队中留下的影响是很深的。马鸿逵后来呆在宁夏一直不敢动，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

填表是在2、3月份，到了4月就开始清党，后来波及到基层组织。

韩练成只念过三年的私塾，刘志丹常对他讲：“穷人娃娃，一个手要掌握武装，另一个手要掌握文化，所以你们要多学文化。”从此他就开始找人学文化，后来他还考了大学。其他人也认识了很多的字。

另外，韩练成从刘志丹那里还学会了同情群众和士兵。旧军队的坏习气在他的身上越来越少，只是念念不忘共产党。越看到旧社会的坏，就越觉得共产党的好。

自从与刘志丹分手后，他一直没有与任何人联系，后来到了重庆，他才与周恩来联系上，一直是单线联系，受中央直接领导。

韩练成成为一个没有入党的共产党员，韩练成是刘志丹播下的一个火种。

他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蒋“总统”身边的“心腹人”。在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功绩。

韩练成(1908—1984)原名韩圭璋，宁夏固原县人。1925年参加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后任国民党军旅长、师长、军长，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八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兰州军管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刘志丹开创保安和陕甘边兵运纪实

曹东光 曹林鹏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共产党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先后组织和领导了清涧、渭华、旬邑等 10 多起武装起义，均告失败，血的教训告诉陕北共产党人，走井冈山道路，以各种方式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

从 1928 年 8 月至 1931 年 8 月，在陕北保安县和陕甘边界，刘志丹、曹力如等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确定的“搞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民间武装)，和红色的(公开组织革命军队)三种形式”，建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永宁山党支部。通过竞选民团团总，夺取保安县民团领导权，把民团改造成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并以此为革命据点，开创陕甘边界兵运工作，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建立党支部

1928 年 5 月 10 日，刘志丹等人领导发动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回陕北发动武装斗争。在甘泉县下寺湾，刘志丹巧遇皖北暴动失败后寻找组织的老同学曹力如。他俩回到保安县府所在地永宁山，找到同学王子宜，三人畅谈离别后的情况、保安的现状以及渭华起义、皖北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商定利用崔焕九老师担任县长的有利条件，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崔县长任命刘志丹为教育局督学，曹力如为保安县高小校长。他们成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志丹任支部书记，力如任组织委员，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他们利用合法身份，进行调查研究，派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到全县七所小学工作，秘密发展党团组织。先后组建永宁山、旦八、刘老庄、金鼎、桥儿寨、金汤六个党团小组，由赵耀先、曹力如、胡兆阳、张庚阳、屈振周、王兆基担任组长。这

六个山寨和村庄也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接待过往的革命同志，解决他们的食宿，为他们当向导准备干粮，促进兵运工作开展。1929年春荒，党支部领导老百姓“吃大户”，让地主豪绅开仓放粮，救济灾民。6月，党支部组织千余名农民，包围永宁山县政府，要求减粮、减款、免税，开展反饥饿斗争，县长郭泉山答应群众的要求。通过党支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保安县的农民、教师、学生觉悟提高，培训了一批革命骨干。

夺取民团

1929年5月，刘志丹开完中共陕北特委会议，他和谢子长、曹力如、王子宜在保安县吊坪曹力如家中秘密开会，传达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保安县的情况，决定以白色（‘白军工作’）为主，继续发展党组织，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武装。

根据党支部分工，分头到绅士家中做工作，揭露民团团总路登高（路仰之）侵吞公款、贪赃枉法的罪行，动员他们出面上书县长，要求改选团总，并利用饭馆店铺等场所造舆论发动群众，宣传：“路登高只认识麻将和牌九上的点点划划，既没有读过兵书，又没有打过仗，就会派粮要款。”“刘景桂（刘志丹）、曹力如上过武学堂，当过军官，参加过北伐，真刀真枪打过仗，比路登高强万分。”曹力如拟定“路登高文不识字，武不服众，惯于鱼肉百姓，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对于本职无所用心，以致民怨沸腾，至此兵荒马乱之年，为免贻误乡梓，请县长改选团总”的条陈，游说四乡父老签名，递交崔县长。迫于民众压力，崔县长只好答应改选，确定3日后在县高小投票选举团总。志丹、力如、子宜分头到学生、群众中宣传鼓动，争取选民。选举那天，路登高雇一些打手来投票。他们机智对付，叫来二十多名学生投票，并帮助不识字的人出主意写选票。志丹、力如得票最多，当选正副团总。

志丹、力如上任后，抓紧时间整顿改造民团，宣布新的团规，调换了各区民团团总，开除了不可救药的流氓兵痞，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废除

打骂制度，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反动的地方民团，改造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成为源源不断输送人员和弹药的大后方。

三道川兵变

1930年初，刘志丹打入甘肃驻军第四师苏雨生部，任第十六团副团长，后又打入陇东地方军阀谭世麟部，任骑兵第六营营长，驻防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的结合部三道川。刘志丹聚结起一批共产党员以及马海旺、马锡五等哥老会成员和当地贫苦农民，编为一个营，下辖两个连，成立党支部。曹力如从民团抽了十几条枪和马匹，动员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志丹的队伍。6月，谢子长把从军阀杨庚武部中通过“兵运”活动拉出来的周维奇营带到三道川，被谭世麟编为第七营。谢子长被任命为团长。当刘志丹赴庆阳主持民团军整训时，土匪张廷芝用美女、金钱、快马收买周维奇，用武力吞并周维奇全部人马，向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的六营发动突然袭击，部队被打散，谢子长脱险，志丹被张廷芝派的一个营直追到永宁山，曹力如用武力拒绝了甘肃民团蔺士殿的追捕，并布置9个岗哨，把来搜查的蔺营长及马弁吓得心惊胆丧。力如当面斥责蔺营长，让他转告张廷芝，将来老百姓总有一天要来和他算账。蔺无法搜到刘志丹，只得灰溜溜地下山，使刘志丹逃过一劫。当晚，他们用吊绳，把刘志丹吊下山寨，找熟人，借骏马连夜脱险直奔绥德，找陕北特委。三道川首次兵运工作失败。

太白缴枪

三道川兵变后，刘志丹只剩下两把短枪、一个“八印子”、两支长枪，要进行活动十分困难。曹力如把自己的手枪借给刘志丹，自己每天挂个空枪套，塞点红绸子应付县长。又从民团抽调10多个带枪的嫡系骨干，从警察局调来20多匹马，把藏起来的国民党军队的军服、军旗找出后交给刘志丹。而民团只能用绑着红布的假长枪进行训练来应付检查。刘志丹同曹力

如、王子宜等同志一起研究，决定奇袭太白镇民团，夺取武器，创建一支独立的工农武装。他们召集从三道川脱险的卢仲祥、刘约三，马福吉和从外地赴保安找刘志丹的贺彦龙、魏佑民等 29 名同志，20 多支长短枪，20 多匹战马，经过化装，到白沙川密林中，进行训练。

9 月 28 日，刘志丹穿着国民党军官的服装，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率领 29 人的骑兵部队，从白沙川出发，沿着葫芦河前进，以“商借粮草”为名，到达太白镇。借宿在李绪增的烧酒作坊。当晚，在二十四营当兵的保安人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来报告二十四营的内部情况和三个连的部署。29、30 日两天，部队分头与民团展开“交朋友”活动，以麻痹敌人。10 月 1 日上午，他们打死敌营长、副营长，第一连被缴械，第二连被打垮，中午结束战斗。

向第三连进军途中，活捉三连连长，当晚包围三连，逼其全部缴械。太白缴枪歼敌 10 余人，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 60 多支，骡马 40 多匹，震动陕甘边界。刘志丹从此组建起一支 150 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太白、南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随后，刘志丹带领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

张皮塬遭袭

1931 年 2 月，为摆脱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围剿”，刘志丹率部向甘肃陇东转移，途中宣传革命政策，扩大了革命武装的政治影响，许多农民青年参加革命队伍。1931 年 2 月 18 日，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领导的农民武装在甘肃合水固城投奔刘志丹。部队一下子增加到 400 多人。为了巩固部队，刘志丹进行改编，共编四个连，刘志丹任总指挥，卢仲祥、魏佑民、赵连璧、贾生财分别任一、二、三、四连连长，杨树荣任党支部书记。

经过两天休整后，部队向宁县转移。在宁县盘龙镇张皮塬遭到陇东军阀陈畦璋部队的突然袭击。由于部队刚刚整编，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

因此，损失惨重，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刘志丹率 100 多人突出重围，转入中部县小石崖。刘志丹与小石崖罗连成民团达成“统战关系”，暂渡难关。为保存实力，刘志丹派人与苏雨生谈判，部队被编为杨虎城部警备旅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旬邑县耿田镇。

身陷囹圄

在旬邑县耿田镇，刘志丹根据省委指示，抓紧筹集粮款和军械，整顿培训部队，设法扩充部队，三个月后，补充团扩充至 200 多人。

在筹粮中，一名土豪抗粮自杀，当地土豪集体告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指使苏雨生惩办刘志丹。由于当地豪绅告密，苏雨生对补充团早有戒备。因此苏雨生以开会为名，把刘志丹骗至彬县，扣押刘志丹，派骑兵包围补充团，大部被迫缴械，编为苏雨生的运输队，使刘志丹创建革命武装再次受挫。在陕西省秘书长南汉宸（秘密党员）和高级参议杜斌丞的营救下，刘志丹获释。

刘志丹出狱后，继续赴甘肃平凉陈璘璋部进行“兵运”工作，在陇东，打出十一旅的旗帜，很快集中起张皮塬、耿田镇失散的革命同志，张秀山任手枪队队长，彬县党组织派来一批干部，组成一支 200 多人的队伍。7 月间，河套土匪高广仁以“商谈要事”为名，在早胜镇向刘志丹部发动突然袭击，刘志丹被缴械，使“兵运”计划再次受挫。

8 月 2 日，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刘兆庆、曹继之、高景山等人为刘志丹购买枪械信件失密被捕。第二天，敌人派一个排的兵力，用绳子捆绑，架在毛驴上驮到延安，接着用架窝子把他们押送到榆林城，关押在国民党八十六师看守所。狱中他们坚贞不屈，决不招供，无奈按“倒卖枪支罪”判刑，关押在榆林监狱长达 4 年。保安县永宁山民团革命据点暴露失守。

兵运工作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刘志丹以非凡的胆略，三年多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执着地从事兵运工作，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

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在多次兵变失败的教训中，刘志丹逐渐认识到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此后，他深入陕甘边深山，改造绿林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使星星之火再次燎原！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保存下来的惟一的一块红色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曹力如（1902——1949）名崇本，字力如，陕西省保安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国民军第十军政治处组织科长、二师政治处长。1928年皖北暴动中任赤卫队大队长，后任皖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后回陕西与刘志丹一起建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任组织委员。1931年春被敌人逮捕。1935年7月到陕甘边特委印刷厂工作，恢复组织关系后任陕甘省委秘书长、陕甘工委军事部长、保安县委书记。抗战后，历任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审计室主任、财政厅副厅长、延署分区专员等。转战陕北时任后方委员会成员。后任西北局城工部部长、榆林军管会主任。1949年12月8日赴新疆工作途中遇难。

刘志丹的师生情缘

白永东

我的曾外爷崔焕九是个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员，但同情革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县长，解放后当过榆林中学的副校长。在陕北有一定的名气，特别是他的书法，造诣很深。1924年，谢子长、杜聿明、闰揆要、柳青等榆中学生毕业之际，学校专门在红石峡举行欢送仪式，校长杜斌丞特荐曾外爷题写了由李子洲提议的“力挽狂澜”四个大字，镌刻在榆林红石峡的摩崖上，以示广大师生的远大抱负。榆林烈士陵园大门上的“为人民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其功其德流芳千古永垂不朽。对革命无限坚贞前仆后继尽忠尽节虽死犹在浩气长存”的对联和横额“名炳日月”、“气壮山河”也由他老人家编写。

以后才知道刘志丹与曾外爷不仅是亲密的师生关系，而且他为刘志丹建立革命武装提供了方便和有力帮助。

渭华暴动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刘志丹进一步认识到：要搞武装，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刘志丹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派他回家乡保安县建立发展革命武装。此时正值曾外爷任保安县长，他总以自己的学生在保安的多个部门任职引以自豪。刘志丹回到保安后，先见到王子宜和曹力如。王子宜到教育局找到曹继之，请他帮忙给刘志丹安排到教育局，作教育局的督学，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借巡视教学为名在全县各处走动，进行工作。曹继之一日赞成，拉王子宜一起去见县长崔焕九。

王子宜说：“志丹回家了，让我们代他问候老师。”曾外爷听说刘志丹回来了，很高兴。

曹继之又把刘志丹夸了一番，说他如何有文才，这些年在外面又历练了不少武略，实在是难得之人才。曾外爷不住地点头，沉思着说：“景桂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当有作为，如今咱们县上……”

王子宜一看不好，曾外爷有意把志丹留在他身边，便连忙截住他的话头说：“教育是革命之本，如今咱们县上各区学校大多不成样子，万事莫若开头难。老师若是不反对，可否先让景桂到教育局任个督学，帮我们一把，待各区学校工作纳入正轨，再奉迎老师另任高职。”

曹继之也跟着说：“我已问过他本人，他说无不可。”

停了一会，曾外爷才说：“等他来时，我问问看，他如愿意去教育局，我岂能从中作梗？”

后来刘志丹去见曾外爷，没有多久他就担任了教育局督学。紧接着安排曹力如到县高小任校长，并调整了本县各区的小学校长。不久，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在永宁山上成立，刘志丹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党支部建立起来后决定，要想办法把县武装——民团的权夺过来。

民团的团总叫路仰之，没念过书，懂点武术，每日除了抽大烟就是搓麻将牌，对团里的事很少管。他是个大地主，和本县大户多有联系，以势压人，连县长也得让他三分。

支部决定先从路仰之身上开刀。派党团员四出活动，大造路仰之无能，是个草包的舆论。大力宣传刘志丹：“以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现今刘景桂、曹力如这些出去上过武备学堂，当了军官的武举，又参加过‘扫北’（北伐），能文能武，真刀真枪领兵在沙场上打过仗，不比路仰之强万分！”

看到路仰之坐不住了，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就由曹继之、曹力如和王子宜拿了有四乡父老签名的“条陈”，去见曾外爷。

曹力如、王子宜递上“条陈”正说着，路仰之也前来求见。于是双方当着曾外爷的面就民团团总的人选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由曾外爷决定对民团团总一职通过公开选举产生，并当场决定：三天后由县长主持选举。选举那天，县高小学堂张灯结彩，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尊重选举”，“慎重考虑，请选刘志丹”，“请选曹力如”。几个学生又吹喇叭又打鼓，吸

引了不少人。曾外爷走来转了一圈，很是满意，在大红票箱后面的太师椅上坐下。刘志丹和路仰之分别坐在两旁稍后一点的木椅上，下边全是赶来投票的选民。经过双方激烈交锋，最终选举揭晓，刘志丹和曹力如的票最多，路仰之落选了。曾外爷宣布由刘志丹任民团团总，曹力如任民团副团总。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

之后刘志丹等共产党人以县民团的这几十只枪为基础，吸收大批农民骨干进民团，迅速扩大武装力量，为日后在陕北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崔焕九(1886——1957)陕西绥德县人，曾任榆林中学学监，兼习字教员，民国时期曾任陕西省吴堡县县长、保安县县长，甘肃省西和县县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榆林中学副校长。是陕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刘志丹和父亲并肩战斗的日子

赵文芳

刘志丹与我的父亲赵子实及曹力如、马锡五、王子宜五人少年时代曾在保安县一个私塾念书。当时五人以兄弟相称，情谊极为深厚。

1929年春，刘志丹同志领导的“渭华暴动”失败返回陕北后，找到了我父亲赵子实，随后就落脚在父亲家里，志丹同志称我奶奶“干妈”。

父亲常常讲起这段往事：“志丹回来后不敢回家，在我家藏身时，前几个月外面风声还不打紧，能经常出来走走。后来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在陕北二十四县到处都张贴布告通缉刘志丹，‘抓住活人赏银 1000 大洋，拿来人头赏银 500 大洋’。为不连累‘干妈’，刘志丹便带着我一起钻进了腰子川森林，躲避敌人的抓捕。在一处稍沟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多年的庄子，那里有几口荒废的窑洞和饲养牲口的石槽。由于多年没有人烟，地里零散的长着一些自生自灭的庄稼。我们白天躲在窑洞里，等天黑后来到了地里挖一点洋芋充饥。稍沟里的秋天比别处冷的早，晚上我们常常在窑洞里面面对面坐着烤火。志丹同志一边给我讲‘渭华暴动’的经过，一边饶有兴趣地对着篝火赋起诗来，只记得两句：‘火烤胸前暖，风袭背后寒’。尽管当时白色恐怖还笼罩着大地，但志丹同志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常常感染着我。”

进入冬季后实在冻得撑不住了，父亲趁天黑摸进村找到一位可靠的老百姓给奶奶捎了口信。当时家里一穷二白，奶奶断然卖了家里仅有的一头小毛驴，连夜缝制出救命的棉衣，由于钱少只能做出一套棉衣。两人分开穿，一人穿棉袄，一人穿棉裤。到了晚上，他们把石槽烧热两人就躺在石槽里。刚睡下的时候石槽很烫，他们就左边睡睡，仰面睡睡，然后再右面睡睡。等到后半夜石槽凉了，露水把两人都打得湿漉漉的。志丹把父亲叫醒说：“不敢睡了，快起来，这样会得病的！”这时，柴草也被落霜打湿，点不着了，他们就背靠背坐着，分析敌情、探讨形势直到天亮。几个月的

野外生活虽然艰苦但也充实。

记得父亲还提到，有一次刘志丹由西安给父亲寄出的信件，到达延安时被国民党查出，然后又原样封好寄到保安县父亲住处，随后父亲被捕。刘志丹知道后，立即指示县政府内的地下组织营救父亲。当时参与营救的地下党有王子宜等同志。他们趁县长到延安开会之际，事先给父亲递来钥匙，放风时，父亲迅速打开镣铐逃出永宁监狱。父亲前面跑，后面的地下党同志放空枪，一边追赶一边掩护，父亲终于被成功营救了。

以上是父亲常常提及的故事，我至今难忘。

赵子实(1904——1973)字从诚，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镇人。1930年——1935年跟随刘志丹同志参加革命，曾任刘志丹同志随从副官。参加了“太白收枪”(即刘景范同志回忆录中提到的赵副官)、经历了“三嘉塬事件”。解放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西北局撤销后在陕西省卫生厅工作。1960年因为彭、高、习事件受牵连，在陕西三原县药物研究所离职休养。其妻刘美秀，是刘志丹的堂妹。

刘志丹的少年先锋队

冯亚光

201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刘志丹一生热爱党，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我的父亲冯有才，曾用名冯宏，1933年冬参加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曾任刘志丹的少年先锋队队员、班长、排长、队长等职，在刘志丹领导下战斗和成长。在此，我将父亲讲述的刘志丹的少年先锋队的故事转述如下。

一

1932年深冬，接连几场大雪，把大地染成了一片银白色。野外的蒿秆和门前的树枝上早已挂满了棉絮似的雪团。陕西省耀县生义村这个小小的村落，同其它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有钱人深居朱门大院，在灯红酒绿中寻欢作乐，穷人却在冰天雪地里不停地劳动。我从12岁由冯家桥来到生义村给地主张佩孚放羊，经常挨打受骂，一直干到18岁，连一件衣服都没挣下。夹着雪花的寒风，嗖嗖的往我破棉袄的孔里钻，冻得我嘴唇发紫，浑身颤抖。我又冻又饿，心想：“这么不公平的世道，怎么不变个样儿呢？”同我一起给地主干活的一位好心的大伯出去又给我找来两个窝窝头，让我趁热吃。他见门口没人，便说：“有盼头了，说不定这场大雪还消不完，刘志丹的红军就打过来了。”听大伯这一说，我的眼睛霎时就亮了起来。是啊！我早就听到过红军的传说，他们不喝地主的酒，不吃地主的肉，专门打富济贫，救苦救难，是咱穷人的队伍。从这一天起，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天天盼望着红军早点来。

春节前夕，一天拂晓，我和往常一样，下河给地主挑水。我刚走出村

外，只见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不远处迎面开来。队伍前头还有几面鲜红的大旗在晨风中飘扬，不用说这是红军打过来了。我高兴地像羊羔撒欢，连蹦带跳的往回跑，差点把张佩孚给撞倒。他一看是我，气得火冒三丈，立刻伸出双手扯住我的耳朵，骂道：“他娘的，为什么担个空桶回来撞我？”事到今天，我才不买他的账了，便伸出粗大的手扯住了张佩孚的一只耳朵，说道：“今后应该让你去挑水了！”张佩孚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懵了，不由自主地松开手，愣了一阵，猛然间，像一头受了惊得驴一样，直着嗓子大叫起来：“快，来人呀，冯宏这小子要反了！”霎时，那班刚从被窝爬起来的狗腿子便一起冲了过来，张佩孚喘着粗气说：“打，把冯宏捆起来，往死里打！”一个狗腿子便去找绳子和木棍，但是，只见这小子急急忙忙而去，丧魂落魄而来，既没有带绳子，也没有拿木棍。他跑到张佩孚跟前，擦了把额头上冷汗，上牙打着下牙说：“不……不好了，老……老爷，红……红军打过来了！”

“什么，什么！”张佩孚急忙问那狗腿子：“离这儿还有多远？”“太太刚在后门听人说，红军马上就到庄上了。”那狗腿子又擦了把冷汗。

“咱们都快跑罢！”只见又一个狗腿子对众狗腿子说道：“红军来了，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都是一群草包饭桶，到了急难处全是各顾各。”张佩孚唉声叹气地说：“要滚，都快滚吧！”他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朝后院走去。那班狗腿子都东躲西藏，各自逃命去了。

“叭，叭！”一阵清脆的枪声震撼了整个生义村。紧接着，由总指挥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来到了庄上，把几家地主的大院包围的水泄不通。张佩孚等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们没有能跑掉，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落网。

红军战士一面打开地主的粮仓给老百姓分粮，一面给群众担水、扫院、劈柴、垒墙，争做好事。红军还发动群众揭发、控诉地主残害人民的罪行，并召开了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按照党的政策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地主霸占的土地分给了贫苦百姓。世代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翻身了，他们纷纷从

远近赶来，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拿着红枣，有的还把准备过年的年糕送来慰问红军，大伙儿都满怀深情地要亲眼看看红军总指挥刘志丹。

刘志丹同志穿着一身旧衣服，头上扎一块白羊肚子手巾，腰里挂着一把驳壳枪，枪柄上还有一绺红穗子。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轮廓鲜明的嘴角上总是挂着善良的笑容。他一再劝群众，把送来的许多东西都拿回去。志丹说：“乡亲们的一片心意，我们收下了；但是你们刚刚翻身，生活还很艰苦。咱们都是一家人，再不要客气了。”志丹同志还利用休息时间，到群众家里走访，问寒问暖，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他还为老乡们干活儿，只要有活，什么都干。他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人们紧紧打成一片。群众都把他当自己的亲人看待，都亲切地称他：“咱们的老刘。”

陕甘红军有一个文艺宣传队，几天来，一会儿演戏、唱歌；一会儿扭秧歌、踩高跷。在娱乐的同时，利用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我和那位长工大伯高兴地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大伯摸着花白的胡子对我说：“变了，世道变过来了，你看我也变得年轻了许多。”说真的，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就像开了花似的，显得格外精神。我还同其他地主的小长工们穿着新分到的衣服，搭伙结伴地跟在秧歌队伍后面学着扭；看台上演戏时，我们还学着唱，惹得一些乡亲们捂住嘴直笑。

几个红军战士来问我们：“多大啦？想不想参加红军？”我们都兴奋地说：“我们一定要当红军。”

二

陕甘红军文艺宣传队在进行宣传的同时，在地主张佩孚的大院里设了一个报名点。经过宣传动员，许多青少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这天，我和几个小长工约好一同来到报名点。报上名后，红军战士说要领我们去见总指挥刘志丹。在不远的一座房子里，我们受到刘志丹、王世泰等红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亲切的询问了我们家庭情况及年龄，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刘志丹笑咪咪地望着我们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参加红军？”

几天来在宣传队的宣传教育下，我们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也学会了几句新词儿，于是都回答道：“为了让人人都过好日子，为了穷人翻身，我们要当红军，跟共产党闹革命。”

“红军生活很苦，经常钻梢山，翻深沟，有时一天得走一百多里路哩，你们怕不怕吃苦？”王世泰同志又问道。

“我们给地主当牛做马，吃了数不清的苦，现在是为咱们自己打天下，就是再苦再累，我们也心甘情愿。”我和几个小伙伴坚定地做了回答。

“好，像个红军战士的样子！”刘志丹满怀希望的目光落在我们几个小伙伴的身上，说：“你们在红军队伍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训练；要学会打仗，学会做群众工作。”王世泰还对我们讲了一些党对红军战士的要求和红军队伍的纪律。

刘总指挥叫我们年龄大一点的到正规部队去，年龄小的到少年先锋队去。

少年先锋队又被称作“旋风队”。那时的老百姓不知道“先锋”这个新词，把“先锋”听成了旋风，把“先锋队”叫成了“旋风队”。不过，小队员个个活泼好动、行动敏捷，就像旋风一样。少年先锋队由于直接受刘志丹的领导和教育，红军战士和群众都亲切地称“老刘的娃娃兵”；少先队员也自豪地说自己是“老刘的队伍”。

我18岁了，是旋风队新战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其实，“旋风队”里许多老战士这时也都才是十四、五岁，因此队长王应昌热情的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冯，你可要给咱们这些小弟弟们当个好哥哥，做个好样子。”“旋风队”此时有两个排，四个班，共有三十个人。我被编到二排四班。

四班有八个人，班长姓候，16岁了，他很会动脑子，办事有方，并且善于团结大家，因此全班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春节过后，“旋风队”随大部队转战到淳化一带。有一天，候班长对我说：“小冯，咱们班就数你大，小弟弟们都不会做饭，你说咋办呢？”我立刻听出了班长的意思，便笑着

对他说：“请放心，别的差事我不一定能学会，要说做饭，我一学就会。”以后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学习训练之余，专搞班里的伙食工作。团长王世泰也亲切地勉励我：“冯宏，你一定要给少先队员把饭做好，当好火头军。”我高兴地说：“请首长放心。”

红军生活的确十分艰苦。我们随大部队转战在陕北的吴起、保安、安塞、甘泉、黄陵、安定、富县、淳化、旬邑等县以及陇东的华池、庆阳、合水、正宁、宁县一带。经常在森林里或野外宿营，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但是，红军战士和少先队员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士气高昂，对未来和胜利充满信心。

刘志丹经常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让所有人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就是再苦再累，甚至流血牺牲也是值得的。”

刘志丹同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时刻把自己置身于普通战士中间，关心战士、关心群众，同大家同甘共苦。因此，他的话大伙儿不仅爱听，还真心实意地照着去做。他在百忙中，总是抽空到“旋风队”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教文化，教军事。我们少先队员大都使用的是马拐枪，他还手把手的教我们操练。他经常同我们一块儿吃住，有时还帮我们烧火，切菜，做饭，并把群众送给他的东西送给我们。

我刚到“旋风队”时，有一次，总指挥来了。他同我们又说又笑，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没有一点架子。我看着这位平易近人的首长，心里想了许多，“这么大的官，怎么没有一点官气？”我想着想着，不禁脱口问道：“老刘，你这么大的官，怎么这样看得起我们呢？”

他笑眯眯地拉着我的手说：“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干部和战士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红军之所以能不断扩大，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是因为他是穷人的队伍，为穷苦大众求解放。我们闹革命的目标很明确，不是为了个人做官，而是为了齐心协力打垮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人人都能过好日子的新社会！”

总指挥的一席话，使我们茅塞顿开，心里豁亮了许多。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共产党真好啊！”老刘说：“你们应该好好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绝不辜负总指挥的期望。

刘志丹同志不仅在理论上是我们的启蒙者，而且在实际生活中，

也是我们的光辉典范。红军转战来到南梁荔园堡。志丹夫人同桂荣在这儿专搞红军的后勤工作，当她看见志丹没有穿棉袄，并且得知他因为经常进深山，钻梢林，在湿地上宿营，身上落下了多种疾病时，便把给战士做衣服时剩下的布条，一针针一线线地缝起来，又找了点棉花，给志丹做了件小棉袄。初冬，志丹带着战士到安塞打仗去了，返回到荔园堡时，同桂荣见志丹身上的小棉袄没有了，便问：“我给你做的那件小棉袄呢？”志丹笑了笑说：“我给一个战士啦！”同桂荣看着衣着单薄的志丹心疼地说：“看你冷成啥样子了！”说毕，便把自个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让志丹穿上。一些调皮的同志开玩笑说，老刘穿着老婆的衣服。志丹高尚的革命品德，深深地感染着全体红军指战员，他以无声的力量，培育着我们少先队员的道德情操。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饿肚子是常事，但一旦弄到点吃的东西，大家都是你推我让，充分体现团结友爱的精神。

三

1933年10月，经一连一排长魏士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庄严的向党宣誓：“从现在起，永远跟党走革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时“旋风队”的少先队员大都是共青团员，只有几个党员。我入党不久，刘志丹和王世泰来到“旋风队”，向王应昌、朱奎详细询问了大家的生活、学习、训练等情况。

刘志丹还问我们队长王应昌：“你们少先队员晚上睡觉前洗脚吗？”王应昌队长回答：“大都不洗。”

王世泰说：“你们要大家养成每天晚上睡前都洗脚的习惯。这样，有助于体力恢复，第二天行军就有劲，脚也不容易打泡。”

我在一旁听了，心里暖烘烘的：多么好的首长啊，想得这么周到。

我正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们，刘志丹笑咪咪的走来，对我说：“冯宏，你是共产党员啦，更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哩！”

我不好意思地说，“首长，我做的不好。”“哎，你做的还不错嘛！”

王世泰也走过来，对我说：“你的年龄最大，要在各方面多用心思。譬如，在训练时，爬山、甩手榴弹、拼刺刀等，你就得处处为大家多留点心；打起仗来，或者在平时做群众工作，自然都不例外。”

我笑着说：“请首长放心。”

红三团转战到淳化县，在三里塬甘家嘴消灭了敌人两个连。在这次战斗中，我班的候班长不幸牺牲，上级任命我接任班长。红三团转战到了庆阳县柳村塬，同一股敌人激烈战斗，我们的队长王应昌不幸牺牲了。红三团任命一排排长赵玉杰接任队长。1935年5月，红军在杨家园、马家坪，歼敌两个营、一个连，解放安定县城。这是红军在陕北占领的第一座县城。赵玉杰队长带着一排人追击逃敌时，不幸中弹牺牲。红三团任命我接任了“旋风队”队长。

“旋风队”已有一百多人，编成了三个排。一排长叫余兔娃，二排长姓藏，三排长姓张。我当了队长后，觉得压力很大。首先是少先队员们爱玩耍，我管不住。譬如，行军时，走在队伍后面的队员朝前面的队员扔土块；每到宿营地，便摔跤的摔跤，打闹的打闹，有时还玩恼了。我说了多少次，他们仍然不听。我便跑到红三团团部撂挑子，想辞职。团长王世泰在庆阳县柳村塬战斗中负伤，此时由吴岱峰任代理团长。

我恳求着对吴岱峰同志说：“我没有能力，请首长换个同志当队长吧！”我看他只笑不语。我又说：“要不，还让我当个班长吧！”

“你是共产党员啦，应该拣重担子挑，怎么遇上这么点小问题就灰心了？”吴岱峰同志说：“共产党员应该知难而进。革命的路长着哩，一个一个的困难都在等待我们去克服，我们可不能逃避困难啊！党信任你，你就应该想办法做好党交给你的工作，再不要计较这些小问题了。”吴岱峰同志还

告诉我：要逐步摸清每一个少先队员的脾气，要善于诱导，针对具体情况，做好思想工作。

为了便于做好思想工作，我有选择的同一些队员玩耍，同时诱导他们遵守纪律。渐渐地，大家都觉得我不死搬教条，做思想工作还有门，大家也听话了。

“旋风队”同正规部队一样，每到一地都要给群众做好事。因此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我们来到陕北甘泉县的下寺湾，听说这个村里有个农民老大娘无儿无女，孤苦可怜。我便带了许多少先队员特地赶到这位老人家里，有的帮她担水，扫院；有的帮她垒墙，整修院落。看到她家里已经没有柴烧了，我们便去到距村子好几里地的一条沟里，为老大娘去砍柴。大娘望着我们背回来的一捆一捆的柴，感动的直流眼泪。她喃喃的说：“我要是能有你们这么好的儿子，该有多好啊！”我们齐声对大娘说：“大娘，我们就是你的儿子。”大娘撩起衣襟直擦眼泪，说：“那以后可别忘了来看望我。”说罢嘴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看我和几个少先队员的衣服破了，便找来针线，给我们缝补好。我们出发时，都对大娘说，我们以后一定来看望你。大娘站在院外那棵桑树下，一直目送我们走到村子的尽头。我们对群众好，群众也把我们当成自己人看待，纷纷拿出好吃的东西慰劳我们。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同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司令，刘志丹任副司令，程子华任政委。陕北红军原没有营的编制，合编后有了营的编制。“旋风队”改编为“旋风营”，有四百多人，上级让我担任营长。不久，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消灭敌人一个师，击毙敌人师长；又在甘泉同富县之间的榆林桥消灭敌人一个团，并活捉了敌团长；紧接着吴起镇大捷，红军又在直罗镇消灭了敌人一个师。1936年冬天，红十五军团在“旋风营”为各级首长挑选警卫员，然后将余下的少先队员，编成了红十五军团的警卫连。我被调到红三团三营任营长。

冯有才(1914——2008)陕西省耀县人,1932年冬参加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少年先锋队队长、少锋连连长、少锋营营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营长、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副团长、团长;全国解放以后,历任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校衔,1962年授大校衔,1975年离休。曾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于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志丹让父亲留在地方

谭永毅 谭元媛 谭永林

1933年2月，父亲谭生彬和曹士荣、马宜超、马德林等三位同志，带着陕西省委的介绍信，从西安出发，经淳化、土桥、井村，整整走了三天，到达陕甘特委所在地薛家寨(寨子下面就是照金村)，参加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团。

到达薛家寨的当日，恰逢志丹同志带部队执行任务回来。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志丹同志。志丹同志当时刚30岁，体格清瘦，说话沉稳、和蔼，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曹士荣和马宜超编入步兵连，父亲和马德林编入骑兵连。骑兵连连长杨琪同志、政治指导员惠志红同志。父亲分在一班，班长贺耀华同志、副班长李耀华同志。

入伍才三天，父亲就随部队开始了行动。先后参加了金锁关围歼战、咸榆公路伏击战、西凤山公路遭遇战、西峰镇阻击战、段家堡歼灭战等大小十余次战斗。实战的锻炼使从未当过兵的父亲日臻成熟，能骑善砍，打得一手好拼枪，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战士。

关于在红二十六军的经历，父亲平素对我们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就是终南山战斗。“兵败终南山”——这是红二十六军军史上最惨烈、最沉重的一页。对于父亲的革命经历，我们痛感知之甚少。但是，骑兵连在终南山掩护全军突围，贺耀华班长壮烈牺牲的情景；志丹同志跳上岩石，挥枪北指，高呼“工农革命一定胜利”的情景；父亲和枣红马生离死别的故事，和王兆相同志破枪出山的故事，和那对素不相识的农民夫妇的故事……父亲当年这些充满凝重深情的讲述，一件件，一幕幕，都深深地、永远地铭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

那是1933年的6月上旬，被杜衡(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后沦为叛徒)强令南下逼人绝境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刚进终南山就在

张家坪被杨虎城部一个旅包围。佛晓骤然响起的枪声、爆炸声在山谷里形成巨大的回声。父亲他们未及吃饭，冒着大雾，仓促应战。敌人仗着人多，硬将我军冲垮。部队建制全被打乱，被迫分三路突围。父亲眼里冒着复仇的烈火，跟随志丹同志带领的一路边打边撤，不时转身向追来的敌人射击。志丹同志见状，朝着他们大喊：“同志们，不要恋战，隐蔽突围！”这支百余人的队伍(三个连的战士都有)，在志丹同志带领下与敌在山中周旋多日，几次与敌遭遇，终被敌人冲散。

父亲和志丹同志失去联系后，与王兆相两人破枪突围，又被敌人冲散，后在一对农民夫妇掩护下，躲过敌人搜捕，化装成他们雇的受苦人，混出了终南山。出了山的父亲，牢记志丹同志“回照金去！回陕北去！保留下革命的火种！工农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嘱咐，辗转千里，一路揽工要饭，历尽千辛万苦，于8月初回到了延长县。

当时，延长的革命形势也很不乐观。党组织与陕甘(北)特委失去联系，全县党的活动基本陷于瘫痪。面对这种局面，父亲没有气馁，没有退缩。他的眼前，不时闪出志丹同志挥枪北指的身影；他的耳旁不时响起志丹同志“工农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呐喊——这是他坚持革命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回到村里，他迅速串联部分党员同志，大家互相鼓励着，坚定了“即便失去上级领导，也要各自为战，坚持斗争”的决心。随着阿青塬、皇庆寺塬两个支部工作的相继恢复，革命烈火又在延长燃烧起来。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和他的同志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们的活动从未停止过。他们深入农村，宣传革命，启发觉悟，唤起民众，为延长县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关于解放延长这段历史，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讲过。每次他都会兴奋地对我们讲起他和志丹同志在延长重逢、志丹同志让他留在延长工作的故事，情溢言表，激动不已。

解放延长，是志丹同志创建陕北苏区战略计划的重要一环，是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第二次“围剿”的重要一战。

1935年5月26日，时任前敌总指挥的志丹同志和高岗(时任前敌总政委)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秘密运动至延长交口一线，于28日拂晓，突然搭云梯对守城之敌发起攻击，激战三小时，以伤亡十余人的代价，全歼敌延长驻军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及民团、矿警四百余人，生俘该连连长汪镜河和县长董公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马匹、银元、辎重，一举解放了延长县城。

延长解放后，欢呼雀跃的群众把集中在城里的豪绅、地主、反动分子都扭送到红军总指挥部管押起来。县里各店铺的红布全被买光，所有群众都将其裁成布条缠在左臂，表示自己红了!延长红了!革命胜利了!

延长的解放，吓坏了周边各县的敌人：延川县城和永坪镇的敌人弃城逃往清涧县城，甘谷驿镇敌保安团一部自动向我缴械投诚，延安县的敌人紧闭城门轻易不敢外出……几个县的广大农村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红军攻城前，父亲带领广大党员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阿青塬党支部在支书肖彩峰带领下，组织几百农民为红军送粮送水，场面热烈感人。

延长解放的第二天，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又组织大批农民进城，迎接红军，庆祝胜利。进城后，急于归队的父亲，于当天下午就直奔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去找志丹同志。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伪县政府院内。父亲走进指挥部窑里，看到志丹同志正和高岗、杨琪(时任前敌副总指挥)研究明天军民大会的议程，参加会议

的还有董耀卿同志。父亲抢前几步，“啪”的一个立正，挺胸收腹，向志丹同志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总指挥，骑兵连一班战士谭生彬前来报到!”志丹同志先是一愣，接着就伸出双手惊喜地叫道：“是你?!早听说你出山后又回延长搞起了地下工作，今天总算见面了!”父亲紧紧握住志丹同志的大手，使劲摇晃着，泪水模糊了眼睛。志丹同志摆了一下手，对在会的同志说：“你们先研究，我和老谭(志丹同志虽长父亲九岁，但从来不摆架子，在部队时就这样叫他)出去一下，有话要说!”

他们在院子里边踱边聊，谈了约个把钟头。志丹同志向父亲详细了解了地方上的一些情况，父亲也向志丹同志询问了部队上的一些情况。最后，向志丹同志提出了重回部队的要求。志丹同志略微思考了一下，笑着对父亲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本来就是咱红二十六军的人嘛！只是延长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你是本地人，情况熟悉，我个人认为你留在地方比回部队作用更大。”停了一下又说：“这事你也别太急。到底怎么办，等我们和西北工委商量后，由高岗总政委告诉你。”父亲离开志丹同志，回到前指的窑里。高岗、杨琪和董耀卿正在研究一份《反动豪绅地主名单》。看到父亲进来，大家抱在一起，又是一阵惊喜的欢笑和寒暄，格外亲切。

5月3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庆祝红二十六、七军伟大胜利和纪念五卅惨案大会”为会标，在延长召开了一个上万人的军民大会。志丹同志、高岗、朱镜清（第一高小校长）、李志公（第一女子高小校长）在大会上讲了话。父亲和延长石油厂的工人一起，坐在会场的前面。志丹同志在讲话中，着重讲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他的讲话深入浅出，极具鼓动性，与会群众十分振奋。大会结束时，由高岗当众宣判，当场处决了国民党反动县长董公绶和延长县头号反动豪绅刘向臣。

6月1日，志丹同志率红军离开延长，开往甘泉。留下高岗带一批政工干部帮助延长、红宜、延川等县整顿地方工作。出发前，前敌总指挥部将群众捕送来的那批地主豪绅和反革命分子又处决了几个，剩下的全部移到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由省府保卫机关审查处理。

父亲望着浩浩荡荡开走的红军队伍，想到自己重回部队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部队开走的当天下午，高岗通知父亲和董耀卿召集一些地方党员开会。会议开始后，高岗见大家有些拘谨，便笑着说：“生彬同志和耀卿同志我早就认识，其它同志还都是头一次见面。咱们先自报家门，来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看到高岗态度平和，没有架子，心情都放松了许多。

“同志们——”高岗随后说：“这些年来，延长党的同志，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为我军这次解放延长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西北工委和前委对延长党的工作是肯定的！”听了他的这番话，大家心里都特别激动。高岗挥了挥手，继续说道：“这次延长的解放，意义十分重大。它加速了苏区版图的扩大，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唤起了广大的民众。当前，为巩固和发展延长新区，前委和西北工委要求我们，下一步必须完成这样几个任务：第一、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第二、组织赤卫军、少先队，把群众武装起来；第三、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会后大家马上下去，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为落实这三项任务，会上当场成立了几个工作队：父亲和李春光、高永光、肖彩峰、肖佐汉、冯瑞珍去南区；董耀卿和小董去中区；李志钦和高岗去西区；黑志德、赵正化回红宜县。

散会后，高岗对父亲说：“生彬同志，志丹同志让我正式通知你，考虑到巩固和发展地方政权的需要，经前委和西北工委研究，决定你还是留地方工作……”看到父亲失落、沮丧的样子，高岗笑了。他重重地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严肃地说：“小谭，老刘就怕你想不开，所以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向你讲清这个道理。你是党员，做事情、想问题要顾全大局，要服从组织的决定！”父亲无话可说，默默地点了点头……

1935年6月下旬，延长县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经赤卫军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志丹同志提名，经前委和西北工委决定，由父亲担任革委会主席。

1935年8月，延长县苏维埃政府经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父亲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作为延长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正式权力机构的带头人，父亲诚惶诚恐，深感责任重大，唯恐辜负了志丹同志的期望。他和白如冰、王士俊等党政领导同志一起，以“扩大红军”和“土改分地”为中心，带领广大党政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为巩固和发展延长苏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延长县各级(乡、区、县)苏维埃政府建全巩固了；各级党、团组织建立了；各级赤卫军大队(连)建立了；各级工会和农会建立了；妇女工作、少先队工作也都搞得有声有色，虎虎生气；“扩红”、“支前”、“征粮”等许多工作多次受到陕西省委和省府的表扬……

1935年冬，红色政权给农民颁发了《土地证》，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被劳动人民土地所有制取代。这是延长县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广大农民分得了日思夜盼的土地，无不颂扬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大恩大德，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整个延长，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县份、东南门户和抗日前哨。

1937年10月，延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父亲又当选为第一任县长。1940年10月，父亲调延安工作时，延长各界群众还曾联名上折予以挽留。所有这些，都是党和群众对父亲在延长工作的最好评价和最好肯定。

可以这样说，从1935年6月到1940年10月，整整五个春秋，留在地方的父亲，没有辜负志丹同志的信任和委托，圆满完成了创立、建设、捍卫和发展延长县红色政权的历史任务。

每当忆起这段历史，父亲都会感慨万千。

父亲说他一生最感得意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东征时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另一件就是参加了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父亲说：“参加红二十六军，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在志丹同志领导下，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人民的解放，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过，这是我一生的光荣！”父亲又说他也有一件最痛心的事情，这就是在他接受志丹同志让他留在地方建设红色政权的命令十个月之后，志丹同志就壮烈牺牲在东征前线。从此，他再也不能当面向志丹同志复命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33年了。我们相信，33年前，父亲初到天国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志丹同志，像当年在延长那样，挺胸收腹，“啪”的一个立正，自豪地向志丹同志大声报告：“报告总指挥同志，骑兵连一班战士谭生彬向您报到——我领导延长县第一届

红色政权，胜利完成了您赋予我的历史使命！”

谭生彬(1912——1980)字志博，陕西省延长县人。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2月参加红二十六军。先后任延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第一任县长。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抗战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延属分区专员公署副专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司长、部长助理，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化工部科技局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等职。1945年当选中共七大代表。

父亲追随刘志丹的战斗岁月

刘海风

刘志丹的革命一生是短暂而悲壮的，刘志丹的功绩却是独特而光辉永存的。他在陕甘宁一带领导的革命影响了无数的人，我父亲刘懋功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老家甘肃华池县紧邻刘志丹的老家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和吴旗县)，父亲他们这一辈人是听着刘志丹闹革命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在刘志丹带领人马到南梁(在华池境内)创建根据地时，17岁的父亲就毅然决然参加了革命。

父亲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是他即将从游击队转为主力红军战士时。当时，陕北著名的大恶霸、大豪绅张廷芝进犯苏区，驻扎在楼坊坪。刘志丹集结了红军骑兵团和庆阳、合水及保安游击队共400余人，并亲自挑选了100余人做突击队，队长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父亲有幸被选中了，他参加了刘志丹召开的作战动员会，看到刘志丹和大家一样，在10月的冷天里穿的还是单衣，但是笑眯眯地分析敌情，进行作战动员和部署，说话干脆，动作利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战斗由于提前暴露了部队行踪没有完全达成作战意图，刘志丹又沉着指挥骑兵团顶住了敌人，掩护装备不好，作战经验不足的游击队安全撤出了战斗。

父亲第二次接触刘志丹是在南梁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这时他已加入了刚刚组建的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当时的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是阅兵，从筹备组织到训练都是刘志丹一手操办的。红二团也在阅兵序列中。成立大会上，刘志丹、习仲勋又先后做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会场气氛非常热烈，父亲和大家一起举起枪，高呼口号，兴奋的心咚咚直跳。

父亲同刘志丹直接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是在红二团奉命护送刘志丹北上陕北时。刘志丹这次北上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刘志丹同谢子长在赤源县灯盏湾会面，商谈了陕甘边同陕北两支红军、两块

根据地联合的大计，主持了周家硷会议，从组织上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的联合，指挥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创建了后来成为中国革命落脚点和出发点的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而光辉永存的贡献。

父亲那时在红二团一连担任经济员(即司务长)，在团政委胡彦英的带领下，只知道任务重大，要尽心尽力保卫刘志丹的安全。与别人不同的是，一路上挑选了四个人跟随刘志丹身边行动，父亲是其中之一，这使他能更多、更直接地观察、学习刘志丹。刘志丹沿路指挥部队在白沙川灭火，练兵，机智灵活地穿越高桥、李家塌敌人据点，到陕北后一天到晚紧张地工作，开会、指挥作战、创建红二十七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晚年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这次随刘志丹同志北上陕北，是我一生中参加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亲身感受到刘志丹的许多优秀品质，使我终生受益。”

父亲多次参加刘志丹亲自指挥的作战行动，每次都深受教益，终生难忘。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团开始一直担负侧翼战场的作战任务，到靖边攻坚战时才会合主力部队参加主战场的作战。红二团接受的作战任务是，与红三团协同，攻占靖边城墙东南角的城楼，然后向敌县政府、保安队、警察局进攻并营救监狱中关押的同志和群众。

接受任务后，红二团开始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制作攻城云梯，练习攀登技术，检查武器弹药，看地形，找向导等。父亲作为连队经济员，还协助团经理处长筹集干粮，解决天热部队饮水问题等。刘志丹不断跑上跑下到各团、连了解检查备战情况，和战士一起说笑拉话，两三天到红二团来了好几次。

6月27日傍晚，红二团向靖边城开进，夜行军80多里，次日凌晨两点左右到达靖边城东的芦河岸边。这时，刘志丹又来到红二团，向孔令甫团长、胡彦英政委询问部队情况。他说这里离城只有两里多路，切实注意不

要发出响声，不要吸烟，以免声响和火光惊动敌人。

还特别交代涉水过河时要注意安全。刘志丹亲临一线，深入细致，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耄耋之年的父亲记忆犹新。

定仙墉战斗是刘志丹领导红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仗，我军毙伤敌正太护路军第三旅六团副团长齐汝英以下 200 余人，俘虏 1800 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 6 门，重机枪 12 挺，轻机枪 50 余挺，步枪 1000 多支。是反“围剿”以来首次歼灭整团之敌，给担负东线“围剿”的阎锡山晋军当头一棒，迫使晋军大部撤回黄河东岸，其余的只能凭借坚固的工事据守，不敢轻举妄动了。

刘志丹在定仙墉战斗中巧妙用计，让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北上，诱使晋军第三旅六团在旅长马延寿带领下渡过黄河，进入我军预设的埋伏圈，以致全军覆没。

红二团在战斗中肩负正面阻击的任务，敌人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向红二团疯狂反扑，企图打开一条向西南的通路，以便向定仙墉之敌靠拢。红二团顿时承受到很大压力。刘志丹当时正在红二团阵地上指挥，见此情况，急忙调动兵力围歼敌人。但不巧他身边的参谋人员都下到各团去了，只有一个警卫员在侧。于是他命令我父亲说：“懋功，你马上跑步到三团传达我的命令，叫他们从侧面猛攻！叫义勇军从侧后方猛攻，堵住敌人退路！”这是父亲第一次直接接受总指挥交给的任务，不由得一阵激动。他把命令复诵了一遍，顾不得头上横飞的子弹，立刻提着枪猫腰跑去，一口气跑了四五里路，传达了两个命令。

等他再返回刘志丹身边复命时，敌军已全面崩溃，被我军压缩到金不烂沟里，失去了反击能力。我们的部队冲下山沟，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吼声，敌人的武器弹药丢得满地都是。到中午 1 点左右枪声已经沉寂，战斗胜利结束了。

劳山战役是我军战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当时红二十五军已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师，组建了红十五军团。西北红军实力壮大，中央红军北上，

使蒋介石寝食难安，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又委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动东北军“围剿”西北红军。

刘志丹有“活地图”之称，对陕甘宁一带的地形烂熟于胸，他提议在延安南边的劳山设伏，打击东北军。红十五军团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此役共毙、伤敌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以下 1000 余人，生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近 4000 人，缴获火炮 12 门，重机枪 24 挺，轻机枪 162 挺，长短枪 5000 余支。战利品中还有许多棉军衣、棉大衣，这也是红军过冬急需的物品。

在这次战役中，父亲所在的红七十八师预伏在劳山中部和南边公路西侧山上。当七十八师二三四团三营在营长孔令甫(原红二团团团长)、教导员王四海率领下从西山冲下来向敌进攻时，父亲冲到白土坡前面时正巧碰见刘志丹。见到父亲，他立即喊住说：“懋功!你马上通知你们营长、教导员，不要管川道里的敌人，你们营赶快过河去抢占对面的山头，一定要坚决堵住敌军南逃的通路!”父亲马上跑去把命令传达给营领导，王四海教导员立即带领七连和九连跑步过了白土坡下的公路，跨过河沟，向对面山上冲去。

敌军见状，从侧翼扑向山坡，和父亲他们展开了“爬山比赛”。双方几乎同时到达山顶，但敌人在我军猛攻下滚下山坡，我军乘机猛追向山下溃退之敌。此时，太阳已经西沉，敌军已成强弩之末，攻势趋弱。彻底消灭这股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营长的命令下，父亲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七九步枪，顺着山坡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一部分敌军被刺死，大部分缴枪投降，哀求饶命。

父亲最后一次在刘志丹指挥下战斗，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解决了“肃反”问题后。那是 1936 年初，刘志丹被中央任命为北路军总指挥，率领红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扫除横山、绥德、米脂等县境内的几个主要敌军据点，消除对中央驻地瓦窑堡的威胁。父亲听说又要回到刘志丹指挥下战斗，非常高兴。红七十八师到瓦窑堡集中后，在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会上，父亲又见到了志丹同志。这次会上，他还见到了被“肃反”的大部

分同志，互相交谈了被“肃反”的情况。会后，北路军举行阅兵式，由周副主席检阅，刘志丹等站在检阅台上。阅兵后，刘志丹来到红七十八师驻地看望部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讲了话。刘志丹说干革命就像爬山下沟一样，磕磕绊绊的事是难以避免的，受委屈的事也常会碰见，不要计较，更不能记恨同志，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出发，以革命利益为重。他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找他谈过了，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后什么事都好办了。他还特别嘱咐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一定要尊重原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学习他们打仗的经验，搞好上下左右的团结。

父亲回忆说，刘志丹的讲话，使他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体会到刘志丹宽广的胸怀，以革命利益为第一利益的崇高精神。

这次随刘志丹出征，有两次战斗父亲难忘。第一次在出征开始后几天时，当时刘志丹、宋任穷、田守尧等首长都随父亲所在的前卫营（“肃反”后，红七十八师只余一个团，父亲的营是该团二营）行动。一天拂晓时，父亲他们看到行进的前方距武家坡约4里的半山坡上有个村子，前卫连正到村子下边，尖兵班已过了村子，突然间从窑洞里冲出10余敌人。前卫连由正面立即开火阻击，尖兵班返回从敌侧后冲上小村子，两面夹击，将敌打垮，有的被打死打伤，有的跳崖了。

随后部队掉头上了南山，到达与寨子相连的西边山头上（寨子与西边山头岷岷被挖断）。敌连部就驻在这个寨子里。刘志丹仔细观察地形，这个寨子筑在高崖上，背依高山，前临深沟，地形狭窄，兵力很难展开，他决定留父亲的二营钳制敌人，主力北撤。约定二营晚上北撤并向点火方向撤。

到下午两三点钟，有敌人出了寨子，向二营西南一个山头迂回，妄图抄后路。父亲派一个连包抄到该敌后面，将这股敌人击溃。敌军对地形熟悉，四处逃散，未抓到俘虏。二营全营北撤，于傍晚翻过几条山沟，爬了几座山头后，见到火光信号，顺利回到了师部。

第二次在北路军继续北上，进抵横山东部无定河南岸的响水堡，准备围攻响水堡，引诱榆林之敌增援，伺机歼灭增援之敌。没想到战斗打响后，

北边榆林之敌按兵不动，西边横山县城的守敌一个多营来驰援。这股敌人本来想从我军背后发动攻击，没有料到刘志丹已在来路上设下伏兵。这次伏击战歼灭敌军一个营，只有少数漏网逃回。

响水堡战斗打完后，北路军西进到横山县城西边一条川道里宿营。二营刚到驻地，一个骑兵通讯员来叫父亲，说刘总指挥叫他去，他立即去了。刘志丹一见他就问道：“去年9月打横山时，你来了没有？”父亲说来了。他说那就好，命令父亲带全营立即返回距县城西南不远的那个少家坨子村，宿营时严密布防，防止县城敌军夜问偷袭。父亲接受命令后立即带全营出发。虽然连夜要返回20里路，但部队信任刘志丹，毫无怨言。到少家坨子后，父亲和副营长冯有才仔细观察地形，布置了警戒。同时要求部队随时准备战斗。没想到还没睡下，敌军就从城里出动，妄图偷袭我军在川里宿营的大部队。他们没有想到刘志丹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还安着一颗钉子。二营立即展开，迎头给予痛击。敌军丢下一片尸体退回了横山城。第二天一早见到刘志丹，父亲向他汇报了战斗情况。刘志丹一贯胆大心细，虑事周密。这一次又是他的预见，保障了部队的安全，让父亲钦佩之至。

北路军的作战行动进行了一个多月，完成了巩固后方，保卫中央安全的任务。这时东征即将开始，父亲所属的红七十八师要归建了，他恋恋不舍地向刘志丹告别。刘志丹又嘱咐他，要尊重原红二十五军的同志。

父亲最后一次见到刘志丹，是东征期间在白文镇巧遇。当时，父亲的部队和红十五军团骑兵连在白文镇宿营，第二天早上出发时偶然碰见了率部经过白文镇的刘志丹。父亲行色匆匆，只来得及向他敬礼，略致问候。刘志丹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又叮嘱了几句，父亲就急急忙忙去追赶部队了。父亲年过八旬后，回忆起这件事还非常遗憾，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父亲对于在白文镇分别后不久刘志丹就壮烈牺牲，痛惜了一辈子。他在晚年说起时，归罪于刘志丹被迫离开了自己创建的主力部队，他说如果他们这些红二十六军的老人在这的话，不会发生这件事。

东征归来，父亲的部队红七十八师(即原红二十六军)召开追悼烈士大会，会场布置的很简单，搭起一个台子，拉上横幅，左右两边挂着挽联。当宣读东征牺牲烈士名单时，全师指战员脱帽肃立，怀着满腔崇敬、惋惜和悲痛。

会上首先宣布了刘志丹壮烈牺牲的消息，父亲一下子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消息太突然了，使人无法相信，使人不敢相信。短暂的惊愕、静默之后，2000 多人的会场立即响起一片哭声，父亲当时哭得伤心极了。刘志丹的骤然离去，使他肝肠寸断，不能自己。原红二十六军老战士哭得特别伤心，没有见过刘志丹的新战士听老战士说的故事多了，心中也树起了这座丰碑，同样伤心得泪流满面，以致于追悼会难以进行下去。

刘志丹牺牲时年仅 33 岁。用今人眼光看只是个毛头小伙子的年龄。他的一生实在太短暂了，但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惊天动地的独特贡献。父亲从见到他，到追随他革命、战斗，满打满算一年半的时间，更加短暂，但他对父亲的影响持续了父亲一生。父亲晚年每每回忆起那段往事，总是心悲伤，气难平。悲伤的是刘志丹牺牲得太早了，气难平的是痛恨那些不顾历史真相往刘志丹身上泼脏水的人。

历史发展难免曲折，然而谎言终究不可能永久歪曲历史。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对刘志丹的评价：“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红军模范”，又重新光明正大地公之于世，传之于世，还了历史一个公道。刘志丹是当之无愧于这些评价的。

刘懋功(1916——2009)甘肃庆阳人。1934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十五军团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团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1937 年进入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营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团长、旅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师长，参加了宜川、扶眉、兰州等

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航空学校政委、校长。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后任空军军长、空军指挥所主任、军区空军司令员。是中共九至十一大代表。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记刘志丹二三事

张西宁

在土地革命战争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刘志丹带领西北红军创建了西北(包括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刘志丹领导下的红二十六军第三路游击队任政委的父亲张仲良，曾深情缅怀与刘志丹并肩战斗的二三事，赞叹刘志丹是一位胸怀宽广、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家。

设口袋阵诱歼顽敌

第三路游击队初创时期，只有平子、旬邑、淳化、照金等四个支队，每个支队少者七八人，多者三十余人。虽不过近百人枪，但扼踞西北反动统治中心西安之喉，刀锋所向，直刺心脏。敌人自然把这支队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这里布设重兵，每当春夏之间，都要进行“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更可恶的是当地土豪劣绅组织的民团多如牛毛，这些人多半是土匪出身，地形熟，枪法准，胆大妄为，给开展游击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刘志丹决定由第三路游击队为主打个硬仗，灭掉当地一只最凶顽的民团，以振军威。于是刘志丹选中了甘肃正宁县一个有名的民团开刀。该民团盘踞在四村垣，王郎坡子，头头是个姓赵的二杆子，外号愣娃(在西北谁撒野不怕死就叫愣娃)。有一次他穷追旬邑游击队几十里路不放，杀气腾腾。此害不除，队伍周旋不开，周边群众亦难发动。刘志丹决定避免硬拼，诱敌全歼。红二十六军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巧布口袋阵，只等诱敌人瓮，如何诱敌便是成败的关键，刘志丹将重任托付给了父亲。父亲决定挑选几个有胆量的部下一同化装成土匪，去该民团辖地抢劫一家富农，激怒对方出动，就这样父亲当了一次土匪头子。父亲身高一米八〇，相貌堂堂、声若洪钟，

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只是装土匪缺了点儿匪气。队长陈学鼎特意给父亲搞了个半截子皮袄穿上，父亲又留了毛喳喳的胡子，这一打扮颇有些落草为寇的山大王的味道。战斗当日，父亲带了部下一路张扬进村，踹开一个富农家的大门，朝里胡乱放了几枪，故意恫吓那个富农逃命求救。接着又掀锅砸碗，闹得鸡飞狗跳，再拉了头小毛驴驮上几个包袱，扬长而去。赵愣娃听到报警说，有人敢在他的地盘上造次，赶紧带了民团一路狂追。父亲领着小队，边打边撤，走一节丢一个包袱，直到逼进前面一条大沟，此时刘志丹正亲自率部埋伏在沟的两侧。父亲领着几个人时快时慢地撤入沟中，赵愣娃傻追不舍跟了进来，从沟口一直追到沟底。刘志丹沉着地按兵不动，待到父亲一行爬上坡顶，立即发动进攻，将这伙顽敌干净利落一锅端，赵愣娃被活捉后公开处决，为当地除了一害。此后，第三路游击队又集中四个游击支队的力量，消灭了柴声子民团二十余人，在淳化消灭了敌民团一部。几个月时间内连续战斗，游击队力量倍增，震动四方，红二十六军第三路游击队，从此成为当地反动势力谈虎色变的一支人民武装。

唤起民众广结盟友

红二十六军第三路游击队创建初期，曾处于顽敌压顶，四面受敌的艰难境地。1934年秋，刘志丹在杨坡头召开了一次第三路游击队部分干部的会议，他在会上讲解了游击战争的策略，对指导关中地区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刘志丹同志说：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争，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一场广泛的农民战争，因此，在战争的进程中始终不要忘记，一定要向广大农民群众敞开大门，这样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或者向农民弟兄关门，必将日渐孤立而走向失败。刘志丹同志这些话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也完全符合当地的实际。父亲领导的第三路游击队，正是按照刘志丹同志的这个讲话精神，每到一处都把组织农民群众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唤醒农民觉悟的基础上，组织农民赤卫队和基干赤卫队，继而扩充和发展红

军游击队，是第三路游击队克敌制胜、生存壮大的重要保证。刘志丹同志又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制定了统一战线政策和实际操作方法。遵照他的嘱咐，第三路游击队在唤起并组织民众的同时，努力争取各方政治势力及地方武装，使他们保持中立或同情革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反动营垒中最顽固的敌人。关中地区哥老会、民团和土匪很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我方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逐一分析排队，有针对性地分化、瓦解和争取，成效显著。盘踞在小石崖和建庄的两支民团实际上是称霸一方的土匪武装，枪兵众多，桀骜不驯。经仔细分析了土匪武装的构成和行为，尤其是主要人员的出身，刘志丹认为这支队伍人伦未泯，是非尚存，可结为友邻。父亲遂率人从外围做转化工作，或动用其他社会关系施加影响，均收效不大。经请示志丹同志并得到他指点后，父亲带着刘志丹同志的期冀，只身亲赴小石崖、建庄二地。他亮出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开宗明义地阐述民族大义和红军宗旨，当他说道自己是受刘志丹之托来结盟时，对方早已听说刘志丹的威名，就说：“刘志丹的人咱信得过！”。小石崖与建庄的两支民团遂与红军主力部队和第三路游击队结为盟友，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为游击队送粮草，寄养伤兵，甚至补充兵员。

刘志丹同志高屋建瓴，适时制定了符合当地客观实际的斗争与发展策略，亲力亲为将其普及推广，使之成为全军上下一致的行动准则，获得了百姓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真诚拥护，有力地推动了游击战争的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倡导民主平等待人

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领导，特别是刘志丹重视发扬党内民主，他平等待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从不阻塞言路。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杜衡等人的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红二十六军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家心情舒畅，团结如一人。当红军主力北撤后，敌人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疯狂地对第三路游击队进行“围剿”，当

父亲他们甩开敌人奉命进驻南梁，与红军主力再度会合后，上级根据形势的变化，又让他们返回原地区活动。这时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召开了一次分析当前形势的师委会议，父亲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对该地区的形势看得严重了，过多地强调了困难的一面。刘志丹同志全面分析了敌我形势，既指出了困难的一面，又指明了有利的一面，父亲一时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不肯接受他的意见，和他当场争辩起来。一位同志建议说：“你们不要争辩了，回去按实际情况办好了。”后来的斗争发展证明刘志丹的意见是全面的、正确的。刘志丹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赤诚相见、诲人不倦的良好作风是永远值得学习和怀念的。

张仲良(1907——1983)，陕西耀县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红二十六军团政委，关中军分区保安司令。1946年3月，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被党中央派往陇东分区工作，任司令员、地委书记、专员，很快稳定了那里的局势。1979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年底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任党组书记。他列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10 周年

张援远

刘志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革命事业的奠基者和领路人，是毛泽东同志著名的井冈山道路在湘赣边以外最成功的践行者，也是为处于低谷的中国红色之舟提供了落脚点和出发点的旷世功臣。没有刘志丹同志的伟大贡献，没有他的智慧、胆略、胸怀以及他对信仰忠贞不虞的人格魅力，中国革命就有可能遭遇重大挫折，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也有可能被彻底改写。自从他在 33 岁的英年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刘志丹同志已在家乡的黄土高坡上长眠了 77 年。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和他一起浴血征战的战友以及他们的后辈们也没有忘记他。

我的父亲叫张策，小刘志丹同志八岁，参加革命前是渭北高陵县船张村的农家子弟。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刘志丹同志有过一些接触。1927 年，16 岁的父亲经人介绍考取西安中山学院，即我党办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介绍人就是当时在该院任教官的刘志丹同志。后来父亲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高陵县党部，“四一二”后因“清党”失去了组织联系。在苦苦找党的几年中，他多次打听刘志丹同志革命活动的消息，直到 1932 年，党组织才派人找到父亲，要他出任高陵县的特支书记。身为地下党，父亲主要工作是领导当地贫苦农民“缴农”，反抗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扩大党员队伍，并为在渭北活动的红军游击队输送战士和购买弹药。

两个人真正见面认识大约是在 1933 年的夏秋时节。就是在这年的夏天，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不顾刘志丹等一大批红二十六军干部的反对，执意把部队拉到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父亲获知红军要途经渭河渡口，特意前去了解情况。船工夸奖红军纪律严明、待人和气，尤其感谢赠给他们一头骡子作为酬劳。但是，此时的父亲

并不知道，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正一步一步走进敌人布下的一张网。红军南下行动遭遇惨败，省委书记的被捕叛变使白区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父亲等一批地下党员已无法在家乡立足。7、8月间，父亲和郭炳坤同志结伴前往被敌人称作“北山匪区”的照金。赶到红军驻地的第二天，部队就向薛家寨方向转移，当晚宿营陈家坡。他听到会场传出阵阵激昂的争论声，不知何故，事后才知道，这就是对西北革命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陈家坡会议。一个多月后，刘志丹和部分南下的同志历尽艰难回到了照金，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军事指挥，经过整编的部队力量更加充实，士气空前高涨。

刚到红军时，父亲对军事完全是个门外汉，组织上分配父亲当经理员，负责部队的财务和生活。后来在他的请求下，安排他到战斗部队当普通战士。这样，他就和刘志丹同志有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我与他同吃、同住、同行军。我们在一起不仅谈论革命的重大问题，还常常谈笑打趣，亲密无间，形同兄弟。”（张策：《我的历史回顾》）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使父亲受到不少教益。他亲眼看到刘志丹同志是如何沉着指挥作战，又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如打张洪镇，打合水县城，解决杨谋子问题，打甘泉县城，消灭庆阳城壕川的民团，以及毛家沟门战斗等。部队的连续作战和接连胜利很快扭转了南下失败的被动局面。那时打完仗往往要快速转移，远距离行军，有时一天一夜要走二百多里路，累了就住在村子边的破窑里，围着火堆和衣而睡，鞋也不脱，以便随时投入战斗。一次，行军到了午夜还找不到宿营的地方，部队人困马乏，刘志丹爬到最高的山头上，借着朦胧的月光观察了一会儿，回来对我们说，“有办法，跟我来”。大家就跟着他，沿着山间小道急速行进，不到一个钟头就找到了一个村子，大家都称赞老刘是个“活地图”。还有一次，由于消耗大，缴获少，补充不及时，个别同志流露出悲观消极情绪，一个同志问：咱们啥时候才能打出一个局面？刘志丹回答的干脆而肯定，“还不是三五年嘛！”令父亲和同志们精神一振，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刘志丹为人忠厚，作风民主，品格高尚，深受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的

爱戴。他总是以身作则，在物质上从不伸手，分配东西时坚持先把好的分给战士，结果一次只剩下一条女人穿的花面棉裤给他，他就翻过来穿，毫无怨言。每到宿营地，他都要亲自查看地形，布置岗哨，派出侦察员，办完这些事后，就挽起袖子为大家烧火做饭，听到大家说饭菜好吃，他的脸上就挂满了笑容。他的夫人大家都叫“刘嫂子”，总是为战士们浆浆洗洗、缝缝补补，父亲就穿过她亲手缝制的衣服。

1933年秋冬，父亲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委特派员的名义，去以华池为中心的南梁创建新的根据地，此后的一年多中，他和习仲勋同志一道从事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政权建设工作，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委员会。刘志丹同志指挥红军胜利作战，成为根据地扩大和巩固最重要的外部条件。1934年11月初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时，刘志丹同志亲率红军及游击队三、四千人枪前来参加盛大阅兵，大大振奋了革命群众的士气，震慑了反动势力的气焰。到了1935年，刘志丹同志又指挥红军游击队成功打退敌人围剿，连续夺取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并以这样的局面迎接北上的中央红军。

但是，在1935年夏秋进行的错误“肃反”中，刘志丹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悉数获罪，身陷囹圄，数百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幸亏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及时赶到，父亲和上百名陕甘根据地的中高级领导才死里逃生。中央为他们平反后，父亲对“肃反”主持者深恶痛绝，不愿与之为伍，而刘志丹同志却毫无怨言地教育受迫害的同志要顾全大局，听从中央安排。他说：“让中央在以后的实际工作和战争中考验我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吧。”刘志丹同志血洒东征的噩耗传来，父亲和陕甘大地的人民群众痛哭失声。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和我们全家都把“刘嫂子”同桂荣老夫人和刘力贞大姐当成我们家的成员。1984年我陪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了刘妈妈和力贞大姐，索氏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在所著《长征一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讲述了刘志丹的传奇，还原了一个气贯长虹、光辉照人的革命

家的高大形象。

让我们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烈，永远学习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吧！

张策(1911——1998)陕西省高陵县人。1927年毕业于西安中山军事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高陵特支书记、红二十六军政治部科长、中共陕甘省委常委兼白区工作部部长、东北军工委委员、关中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陕西省委委员、蒲城中心县委书记，冀南区委民运部部长、组织部长。中共白城子地委书记、东蒙工委书记、吉林省委常委兼吉南地委书记，松江省委书记。1952年后，历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八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端起饭碗来想起刘志丹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10 周年

马晓文

2013 年 10 月 4 日是西北人民群众的革命领袖刘志丹诞辰 110 周年。至今，在陕北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端起饭碗来，想起刘志丹。”刘志丹的革命事迹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他的历史功绩永远不可磨灭，他的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会一代接一代传下去。

1998 年 8 月 5 日，在纪念刘志丹诞辰 95 周年前夕，习仲勋和我的父亲马文瑞合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一开头就说：“志丹同志虽然比我们长十岁，但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却感到他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随和的好导师，好领导，也是好朋友，好兄长。他的确是一位光芒四射的革命家。”文章的结尾说：“他的革命精神将万古长存。”

一、刘志丹是绥德饥民斗争的指路人

1928、29 年，陕西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灾民多以树皮、草根为食，陕北灾情更加严重。定边、安边、横山等地连树皮、草根也被剥挖净尽，灾民饿死无数。习仲勋的父母、马文瑞的二哥马文彬也在灾荒年间先后病饿而死。广大农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各地自发斗争不断涌现。

1929 年春，共青团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代表会议。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米脂县委书记白明善代表特委参加指导这次会议。时年 16 岁的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中共绥德县委委员马文瑞第一次见到了领导渭华起义的、鼎鼎大名的刘志丹。刘志丹修长清秀，一副平民装束，平易近人，革命激情奔放。马文瑞向刘志丹、白明善详细汇报了绥德饥民斗争的形势，提议组织饥民斗争。因为灾荒已经遍及陕北各县，蜂拥的饥民已经将生死

置之度外，如果党组织能够乘机组织领导饥民同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做斗争，必然应者云集。刘志丹指出：“你的意见很好，你们应该坚决组织领导饥民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展要食粮、要救济的斗争，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这就是当下最重要的革命任务。”同时指出，只要深入发动群众，一定能取得斗争胜利，并且支持马文瑞挺身而出，勇挑革命重担，积极组织饥民斗争。马文瑞回到绥德后，向绥德县委委员传达了会议精神，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灾民进城要食粮、要救济的斗争。随即就以中共绥德县委和共青团绥德县委的名义，向全县东西南北中五区发了内部书面通知，用“鸡毛传帖”的办法，迅速传到各区、各村，要求各区、村派党团干部带领农民群众进城。

1929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十)清早，绥德各区经过充分动员和准备的四、五千农民，背着预备装粮食的口袋，手里提着棍棒，从四面八方朝城里涌来。中共党团县委指派绥德师范的党团员在绥师团委书记李光白、学生会主席吴志渊及白如冰、白寿康、贺晋年等人带领下，也拢了羊肚子毛巾，化装成农民，挤在农民中进行工作。马文瑞负责县城协调指挥。农民就像山洪爆发一样冲开城门，饥民们一路高喊着：“我们要饭吃，我们要活命”冲进了县政府。国民党县长和驻守县城的敌营长张建南跑了。饥民们跑到大户人家要粮食、要救济，大户人家也都躲起来。愤怒的饥民把一家生产蛋粉的鸡蛋厂给砸了，抢蛋粉，砸机器，整整闹了一天。敌营长张建南见农民不散，同躲在城外的县长商量，决定拿出一笔钱发给进城的农民。马文瑞召集各区负责同志党永亮、李光白、胡永华、崔田夫等人在南关二郎山商量对策。大家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敌人答应发救济款，参加斗争的饥民得到了实惠，也算一个不小的胜利，决定接受敌人的救济款。张建南派人在城区南关搭了一个台子，讲了一通话，就开始发钱。大家挨个排好队，每人发一块银元，大约四五千。农民们喜气洋洋，把胜利比作见了晴天，大家称赞领导这场斗争的崔逢吉(田民)同志为“大天明”，而田民同志对这种赞誉很不自在，就将“逢吉”改为“田民”，意为“种田人”，

体现了他扎根群众，同劳动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本色，这就是崔田民同志改名字的来历。

这次绥德饥民斗争，是我们党在陕北领导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饥民斗争。在刘志丹的正确指引下，在绥德党团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一大批革命骨干参加了组织饥民斗争，由于组织严密，斗争的结果也令人满意。马文瑞是一线的总指挥，在斗争中也受到了应有的锻炼。这次斗争，使统治者看到了广大民众的力量，也不得不低头屈服于这种力量。这是与刘志丹的果断、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

二、刘志丹与在三边搞兵运的马文瑞

1934年1月底，陕北特委召开了曹家砭会议，会上决定派马文瑞到三边杨虎城部谷连舫警备骑兵旅领导兵运工作，因为那里已经有许多党团员骨干，且都是他认识的同志。马文瑞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搞党、团建设及群众工作，从来没有如刘志丹、谢子长那样专门搞过兵运，那年他21周岁。

当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1933年11月3日至5日，由刘志丹主持，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战略方针转移的问题。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任命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为参谋长。决定建立一、二、三路游击区，在子午岭大梢林掩护下，分别建立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说：“兔子还有三个窝呢，我们力量小，打不了为什么不会跑？为什么不搞它三个窝？”并以主要力量着重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上旬，因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搞兵运，师党委决定刘志丹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年轻的马文瑞到三边搞兵运，离陕甘边刘志丹和南梁根据地更近了，他加强了与陕甘边和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的联系。

1934年4月，在国民党杂牌军孙殿英部进行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艾稚卿和刘天民（非党员，府谷人）来三边活动，想联络谷连舫部的骑兵旅同孙

殿英一起打宁夏。艾稚卿见到马文瑞说：“孙老殿为打宁夏想同红军取得联系。”马文瑞说：“想联系可以，一个办法是你自己去，另一个办法是由我想办法去找，你自己去，长袍马褂行动不便，很难找到，还是由我给刘志丹写封信，派人去联络。”于是马文瑞就给刘志丹写了一封信。马文瑞以党内写密信的办法写到：“志丹同志：米脂相别，不觉已数年，甚念。我受陕北特委派遣来三边谷连舫部搞兵运。适逢孙殿英部派人来，想同红二十六军合作打宁夏。我以为此举有利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亦可乘机扩大红军，补充给养，促进兵运工作。请你接信后，考虑可否派人来三边见我，以便同孙部来人取得联系。顺致革命敬礼！马文瑞。”马文瑞派了两个从神木来的可靠的农民（一个姓刘，一个姓高）去送信。安顿说：“此信事关重大，望你们务必送到。”两位忠实可靠信使昼夜兼程，赶到南梁，见到刘志丹。刘志丹展读后，完全同意马文瑞的意见，也认为是打击敌人、发展红军的好机会，立即派出曹士荣（保安人）赴三边同马文瑞接头，然后去孙部。不料曹士荣出了南梁，路过保安时上旦八寨子探家，被敌人发觉，枪杀了。马文瑞始终没有见到刘志丹派的人来。直到孙殿英打宁夏失败退了兵，也没有见南梁有人来联络。后来马文瑞到南梁见到刘志丹谈起这事，才知道曹士荣被敌人杀害了。

马文瑞到三边后，联系到了部队中的党、团员同志，成立了党支部，指定薛毓瑞、王治岐、师发直为负责人。神木来的王治岐到段佑庵团，安定来的十多人到张廷祥团，张廷芝团有师发直、姬振元等。1934年4月，孙殿英率部打宁夏马鸿宾部失败退走不久，杨虎城命令谷连舫旅从庆阳开往西安整编。为发展兵运工作，马文瑞决定随部队行动。部队一路开拔，马文瑞紧随其后，军官们骑马，马文瑞步行。从三边走到庆阳。到了庆阳，师发直按照马文瑞的意见，拉出一个排20多人，10多支枪，按照预定计划，夜里从城墙上把人一个一个系着绳子吊下去。他们到了南梁根据地，随即编为合水游击队。师发直后来同强世清回了陕北红军一支队，任安塞游击队队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薛毓瑞等同志到西安后，按照马文瑞的意见，

全部回陕北去，参加安定游击队。薛毓瑞 1936 年 11 月 18 日在靖边县张家畔战斗中壮烈牺牲。

三、刘志丹与政治教员马文瑞

1934 年 11 月初，马文瑞上了南梁荔园堡。荔园堡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马文瑞原来打算路过一下就返回陕北特委。没想到，一见到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他们很热情，劝说马文瑞留下来，承担当时迫切需要培训大批干部的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学工作。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吴岱峰任军委参谋长、干校大队长兼教军事课，教员除兼职的蔡子伟、龚逢春之外，正好缺少一个教政治课的全职教员。马文瑞就答应暂时留下来当政治课教员。

马文瑞上任的时候，正是第二期学员报道的时候。学员有 70 多名，有陕甘边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也有部分来自陕北的干部。学员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因此习仲勋同志后来回忆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刘志丹同志经常亲自给学员们上军事课，还上过实地打靶课，使用的是自己兵工厂生产的子弹。刘志丹住在陕甘边军委驻地寨子湾，离军政干校所在地豹子川张家岔村有几公里山路。道路崎岖，杂树丛生，刘志丹每次都是翻山穿林而来，讲完课后又徒步返回寨子湾，非常辛苦。有时讲完课，他也住下来，和吴岱峰、马文瑞一起商量工作。学校的设施虽然很简陋，但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都很正规。马文瑞教的政治课主要讲“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和“六大决议(十大纲领)”等。每天清晨，学员们都集中在沟底的河滩上出操，口号山响，威震豹子川。这是马文瑞同刘志丹朝夕相处的最美好的日子。虽说是军委主席，刘志丹一点架子也没有，对习仲勋等年轻的党政干部都很尊重，这使马文瑞终生难忘。在几个月的相处中，马文瑞进一步认识到，刘志丹不光懂得军事，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高，分析问题全面客观，处理问题实事求是，是不可多得的

文武全才。他对刘志丹和谢子长一样，都是深深的信任和由衷地敬佩。

四、刘志丹亲派马文瑞开辟陕甘边东区革命根据地

随着陕甘和陕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反动势力的惊恐。1935年春，国民党蒋介石统帅部开始调集西北各省军阀，共5万多人的兵力，对陕甘、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瀚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北上。他们先到陕北根据地安定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组织第二次反“围剿”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完全的一致。谢子长说：刘志丹来了，一切就好办了。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2月18日，刘志丹起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在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领导下，我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轻重机枪300挺，迫击炮14门，子弹数十万发。开辟了甘泉、宜川、中部、宜君、富县、洛川等新区，实现了陕甘边与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新局面。

1935年2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在陕北作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骑兵团东进甘泉、宜川、韩城、合阳一带活动。骑兵团横扫国民党民团，组建游击队、赤卫军，扩大了红军影响，推动了农民斗争。回到南梁的杨森，向陕甘边特委报告了甘泉、宜川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等情况，要求派得力干部去开辟东区，建立地方政权。经刘志丹、习仲勋建议，陕甘边特委决定派马文瑞去开辟东地区工作。刘志丹亲自找马文瑞谈话，交代任务。马文瑞接受任务后，带领胡自禄(陕甘边苏区粮食部长)、张彦福(原华池县赤卫队长)、徐克昌(知识分子，天津人)等同志，还

有军政干校的几个干部，带了 30 多人的警卫队，开赴东地区。经过半年多开辟工作，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的配合下，在甘泉、宜川、洛川一带广大农村普遍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摧毁保甲制度，成立县、区、乡革命委员会。1935 年 3 月 28 日，在临镇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书记的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6 月间，成立了东区革命委员会，马文瑞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实行土地改革，调查登记土地，分配土地。马文瑞整天下乡跑农村，吃住在农民家中，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咱们马主席”。开辟这一带对于巩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对于把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具有重要意义。这充分体现了刘志丹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1935 年 5 月 28 日，刘志丹指挥红军攻克延长县后率部来到临镇休整。马文瑞同刘志丹再次会见，相互高兴的交谈了开辟扩大根据地问题，那时同志们都说“志丹是平民政治家，精明的军事家。”

五、光芒四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36 年 4 月 14 日，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在东征山西省三交镇战役中裹革沙场壮烈牺牲，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彻底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6 年 4 月 23 日，刘志丹同志的遗体运到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北边黑山梁北山角的砖瓦窑。遗体安放在窑洞里。警卫员谢文祥等去瓦窑堡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汇报。周副主席悲痛地流下了眼泪，一时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说：“刘志丹牺牲的电报接到了，志丹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的损失。我们要永远纪念他！”接着又说：“刘嫂子病重，正在住医院，等几天她的病好一些再开追悼会。”党中央决定为刘志丹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陕西省委指定由秘书长马文瑞为刘志丹写一个简传。对于刘志丹的革命经历，马文瑞大体了解。为了准确无误，马文瑞到中央组织部去查阅刘志丹的档案。出人意料的是，马文瑞发现在刘志丹的干部登记表上，竟然写着“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等话语。这使

马文瑞感到诧异和沉重，实在难以理解。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嘛！

马文瑞含着热泪写完了《刘志丹史略》。4月24日，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在瓦窑堡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大会的干部群众有丽三千人。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神情悲戚，语调沉痛，动了感情，与会者许多人都哭了。周恩来在悼词中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为他说了公道话，平了反。博古在追悼会上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讲了话。郭洪涛代表陕西省委念了《刘志丹史略》。

在干部登记表上批着“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件事，直到刘志丹逝世，唯有刘志丹自己知道，但他从来未向任何人提起。只有他的夫人同桂荣说，刘志丹在出征前，曾经对她说过：“今后对我仍是严重的考验。事实会证明一切的。”直到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认为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为刘志丹彻底平反。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第六届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为刘志丹平了反。在刘志丹牺牲九年后才盼来了在全党实现彻底公道的这一天。像刘志丹这样的群众领袖，能够这样顾全大局，能够这样特别能忍耐，能够这样特别任劳任怨，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刘志丹真正不愧为光芒四射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六、刘志丹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刘志丹同志牺牲的时候仅仅32周岁。他离开我们已经77周年了，西北人民、全国人民、全体党员至今深切怀念他，纪念他，仍然是“端起饭碗来，想起刘志丹”。刘志丹的好处永远说不完。

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势下，纪念刘志丹诞辰110周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学习刘志丹善于学习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切合实际的、独创性的历史贡献。

我们要学习刘志丹坚强的党性，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经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

我们要学习刘志丹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刘志丹一生只知吃苦，不图享受，完全和普通战士一样，身穿千补百衲的粗布衣，脚蹬自己编织的麻草鞋，牺牲时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除了身上穿的一件旧大衣，衣袋里只有几份党内文件、一根小半截铅笔头、两根舍不得丢的半截烟头和 6 支香烟外，其它一无所有。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没有给家人、后代留下任何遗产，却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志丹啊，真不愧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红军模范”，“共产党员的模范”。

我们要学习刘志丹善于做团结工作的精神。高举起大团结的旗帜，像爱护眼睛一样为维护全党的团结，为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永远的怀念

——纪念刘志丹伯伯诞辰 110 周年

李君燕

在我们小的时候，志丹伯伯常常出现在父母亲讲给我们的传奇故事中，一直到我们长大了，到了可以协助父亲整理他的回忆录的时候，志丹伯伯的形象又一步步的丰满起来，渐渐的亲切起来。

1934 年 8 月，父亲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后，他立即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八支队的战斗，9 月他去探望已身负重伤的带领他走上革命道路良师谢子长伯伯时，子长伯伯认为他不宜再做党的地下工作，决定调他到即将命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以下简称红一团）工作，要他拿起武器和敌人斗争。这是他们久别重逢后的最后一面，第二年 2 月，子长伯伯逝世。从此，父亲开始了他的革命军人生涯。

红一团下辖两个连，父亲被任命为红一连的政治指导员兼管红二连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父亲从 1927 年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来没摸过枪，有的战士还习惯称他为“李先生”，因此他下定决心不辜负子长伯伯的重托，钻研军事带兵打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另一位良师志丹伯伯走进了他的生活。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一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从 1927 年 10 月清涧起义开始，在陕西境内和与周边甘、宁交界地区，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就没有平息过。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探索中，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面对敌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屠杀政策，西北共产党人经历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不屈不挠“蹒跚”前行的历程。党的组织、红色武装和革命的力量在抗争中不断成长，无数先驱用生命去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恰如毛泽东同志所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

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短短的几年中，陕西革命武装力量在聚聚散散，分分合合中陆续成立了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1931年9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2月)、红二十六军(1932年12月)、红二十七军(1935年1月)等主力部队，游击队、赤卫队更是遍布陕北、陕甘的广大区域。红色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陕甘、陕北根据地相继形成。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西北各路红军先后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在战斗实践中逐步形成符合实际、适合我军发展的极具西北地域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成长起一大批优秀的红军将领，磨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主力队伍，找到了建立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在吴志渊同志编著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中，他分别引用了谢子长、刘志丹两位革命先烈、群众领袖的话，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装备工农，建立和逐渐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谢子长)“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西北红军在志丹伯伯的统帅下，从首战告捷的杨家园子战斗开始，历经马家坪战斗、解放延长、李家塌白刃战、靖边攻坚战、慕家塬战斗直至此役的最后一战定仙娥战斗为止，西北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势取得胜利。从5月1日至8月下旬，共歼敌正

规军 5000 余人，民团 3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枝 8000 多支，轻、重机枪 300 余挺，迫击炮 14 门，子弹数十万发。战斗中主力红军由第二次反“围剿”初的 2100 多人发展到 9000 人；游击队由 1500 多人增加到 4000 余人，解放县城六座和 800 里辽阔的广大农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靖边、环县等游击区，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完全连成一片。

在与志丹伯伯朝夕相处的几个月里，在密集的战斗中，父亲对每一次战斗的部署、实施、完成都用心记录。志丹伯伯对每一次大战的总结，父亲更是铭记在心。他听到的是志丹伯伯所阐述的他的军事思想的脉络，在讲述中，志丹伯伯总是结合刚刚完成的鲜活的战例和他多年的作战经验，在判断各种力量的运动变化、利与弊的相互转换、主观客观条件的科学运用等等方面，把他的思想和方法传授给大家，使全军思想一致、步调一致夺取胜利。西北地区的各支部队携手同心，休戚与共，既是志丹伯伯精心培育的结果也是胜利的保证。

在志丹伯伯的口传身授中，在战斗的实践中，父亲得到了迅速的成长。在攻打延长的战斗中，他接替牺牲了的刘光贤同志就任红二团政委，他的努力得到了指战员的肯定，得到了志丹伯伯和上级的信任，红二团也成为反“围剿”斗争中一支骁勇善战的主力尖刀部队，并一直保留至今。同时得到成长的还有一大批红军指战员，西北红军的威名由此而成。

父亲的一生曾作战无数，获胜无数，创下不少完胜(我方无一伤亡)的典型战例，和志丹伯伯一起战斗的岁月他引以为豪，常常提起。数十年后，说起当年的情景还恍如昨日。当他再次与志丹伯伯的夫人同桂荣妈妈，女儿力贞姐姐相遇时，感慨万千。当时，他和母亲虽身处逆境，仍对她们关心体贴、尽其所能的帮助她们，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情感。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在粉碎敌人对我陕甘宁苏区第二次‘围剿’的全过程中，刘志丹同志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事实证明了他所采取的军事战略战术之英明、正确。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卓越的领导才能，身先士卒

勇于牺牲的高尚品德，赢得了陕北红军和陕北人民的衷心崇敬爱戴。”

志丹伯伯的这一代人离我们已渐行渐远，那些故事也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每当我想起父辈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总感到一缕缕光芒在闪烁，这是他们这一代人信念的光芒，智慧的光芒。他们在荆棘丛生的莽原中寻求道路，做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把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特别是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的精粹相结合，以他们的忠诚和智慧在千难万险中坚韧不拔地前进，无私无畏、无怨无悔，以血肉之躯开拓出一条道路，带着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直至今日，宛若灯塔，依然照耀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引导着一代又一代人一路前行，他们也将得到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永远的怀念和崇敬。

李赤然(1914——2006)原名宗贵，陕西省子长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安定县区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连指导员、团政委，红十五军团师政委。1937年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团政委。1946年后，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旅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师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军副政委、高级防空学校政委、空军军政委、军区空军副政委。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张源

我的父亲张达志是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他在世时曾撰文深切怀念刘志丹同志。特别是回忆到1935年4月，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和义勇军北上，同陕北的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同志任总指挥，我父亲任党务书记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委，与刘志丹同志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直到崂山战役后他被错误路线“肃反”运动迫害被捕入狱才分开。父亲对刘志丹同志印象深刻，且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父亲常讲：

刘志丹同志虽然出身于学生，但他毫无一点书生之气；他虽是西北红军的总指挥，却毫无一点官架子；。他虽被誉为西北人民的领袖却始终置身于群众之中，甘当孺子牛。他从来也没有以领袖自居过，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总指挥，摆架子，耍威风，搞特殊。他总是把自己看成红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当时，他只有一匹马，一个马夫兼炊事员，既没有勤务员，又没有警卫员。指挥部只有二个通讯员负责送信，传递命令。行军作战命令，统统由他自己亲手起草，每晚的口令也是由他自己拟出，然后由通讯员分头传达到各部。他的乘马遇到伤病员时，就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却徒步行军。他吃的穿的和全体指战员一样，所不同的是比其他同志多了一件破呢大衣，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坐垫，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一双布鞋当枕头。夏天穿一件破单衣，冬天穿一件破棉衣。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从不另起炉灶。当群众慰劳送来猪肉、羊肉、白面时，他总是先分给先锋连和义勇军，然后按数量多少分给各部队。如慰劳品少而分不过来时，则采取这次分给这个部队，下次分给那个部队。他自己从不先吃多吃，轮到最后才留一点给总指挥部的同志们吃。处处表现出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

志丹同志有一手炒菜的本事。有次，部队在安塞消灭了李家塌的守敌

之后，群众送来些羊肉慰劳部队，志丹同志高兴地亲自动手爆炒了羊肉丝给大家吃。还有一次，部队在准备攻打吴堡慕家塬子的行军途中，由于长途跋涉，整整走了一夜，指战员们很疲乏，到宿营地之后都蒙头睡觉了。当大家醒来之后志丹同志用攻打延长后仅剩的一块白洋买了一只小羊，给我们大家包了一顿饺子吃。从这些小事也可以看出，志丹同志是多么爱护和无微不至地体贴干部战士。

志丹同志和蔼可亲，赤诚待人，同志们和他情同手足，他身为西北红军的总指挥，可全军指战员和当地的老百姓，很少称呼他的官衔，而总是亲切地称他为老刘。正因为这样，同志们有话愿意向他讲，也敢向他讲。

特别是行军作战，每到一地一村，志丹同志从不顾吃住和疲劳，总要先找当地一些群众拉拉家常，了解情况，找当地党、政同志和游击队的负责人，询问情况，布置工作。志丹同志这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由于志丹同志有这样崇高的品质，使他在红军和群众中赢得了十分广泛的爱戴和威望。老百姓都会唱“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志丹同志是西北苏区和西北红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长期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中，自然地形成了领袖地位。志丹热爱人民，人民热爱志丹。记得在打罢吴堡慕家塬子战斗之后，当部队返回驻地宋家坡休整时，有二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从几十里以外跑来探望志丹同志。他们首先找到我，问：我俩能不能看看老刘？我说：能哩！于是我就带两位老人去到志丹同志住处，一进门，我说，这两个老人看你来了。话音刚落，只见两位老人迎上前去，一把拉住志丹同志的手激动的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他们颤着嘴唇说：“啊！你就是老刘？啊！你就是老刘吗？”志丹同志也很激动，他热情地连声回答着：“对，对，我是老刘”。

以后，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谈到陕北革命斗争史时，也曾向我们介绍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故事。他说，他同志丹同志一起到绥德义和镇附近住宿时，有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专程从远处来看刘志丹。他一见到志丹同志就激动地颤抖着双手，直把志丹同志全身摸了个遍。从以上

事实看，志丹同志不愧为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所高度赞扬的那种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今天我们晚辈纪念刘志丹同志，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尤其是他密切联系群众，维护人民利益，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这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

张达志(1911——1992)陕西省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佳县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委，西北军委委员，第十五军团民运部部长。1936年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陕北独立一师政委、八路军120师团政委、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绥蒙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陕北军区司令员、第二兵团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书记、炮兵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难忘的岁月

杨亚新

东方就一个红，太阳就一个升，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一首高亢的陕北民歌把我带进对父辈们的怀念之中。

记得 1988 年的一天，父亲向我讲述了他在陕北跟随刘志丹干革命的往事。父亲说：那是 1935 年初，为统一和加强领导，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围剿”，中共陕北特委、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父亲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父亲看到刘志丹沉着干练、性格爽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下子就拉近他们的距离。

父亲回忆说：1935 年 5 月，刘志丹指挥红军在杨家园子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战后在玉家湾的祝捷大会上，刘志丹作了重要报告。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战斗经验，指出了当前斗争的任务，讲述了党的政策。他的讲话精炼果断，饶有风趣，使会场的气氛热烈活跃，参会人员不时发出笑声和掌声，他的讲话激发了战士们的革命斗志，坚定了革命信念。他身上体现出的群众领袖风范，给人印象深刻。1935 年 6 月，父亲奉西北工委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的指示去安塞县处理问题，行前父亲去请示刘志丹，刘志丹对我父亲说：你到那里第一要认真调查研究；第二既要肯定那里的成绩又要指出那里存在的问题；第三要严格按照苏维埃政府的决定行事。他和马明方的指示对父亲去安塞工作教益很大，他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从那时起、因工作关系，父亲一直和刘志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父亲回忆说：1935 年 7 月，在陕北共产党的领导下，陕北苏区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陕北苏区迅速扩大，安定、安塞、保安、靖

边等六县全部解放，陕北、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有近 20 个市、县建立了党政领导机构。这时西北工委派父亲为特派员，去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延水等县视察工作。适逢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为支援神府苏区，在秀延县东部，绥德、米脂、清涧西部南沟岔一带与敌高桂滋部激战，歼灭敌人一个多营，击伤敌团长艾捷三。刘志丹挥军乘胜向绥、吴方向追击敌人，又消灭了吴堡县慕家塬等处晋军几个连。部队在吴堡宜上坪休整时，父亲去前指将敌情和地方工作向刘志丹作了汇报，他听后说：“今后要继续搞好形势教育和宣传土地政策、肃反政策及扩红政策；要把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动员起来，借助主力部队胜利的形势开展人民战争”。父亲按他的指示做了安排。几天后，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围困定仙娥之敌，在金不烂沟消灭晋军李生达增援定仙墉一个多团敌人，并击溃敌一个旅后续援军。这就是刘志丹指挥的著名的“围点打援”战术的巨大胜利。我军在东线和北线的胜利沉重的打击敌人，巩固扩大了陕北苏区根据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斗志。

在 1936 年 3 月 15 日左右，刘志丹奉中央命令率领红二十八军到神府准备东渡黄河抗日，父亲当时任神府特委书记、独立师政委，正在神府负责那里的工作。记得父亲说：两人相见紧握双手，久久不分开，最后，刘志丹说：“哎呀，和亭同志你辛苦啦。”从那时起二十多天里，父亲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积极为红二十八军渡河做准备工作。1936 年 3 月底，父亲送刘志丹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没想到，那一别竟是他们的永别。说到这父亲眼里闪烁着泪花。父亲说刘志丹是一个真正的群众领袖，人民群众爱戴他拥护他，敌人害怕他，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父亲说，和刘志丹在一起的战斗岁月中，刘志丹对他的指导、关怀使他终生难忘，他的好领导好兄长刘志丹永远活在他的心里。

杨和亭(1910——2003)名善谦，字和亭，号益斋，陕西省子长县人。1928 年 1 月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神府特委、绥德地委书记、专署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民委主任，中共新疆分局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一件黄呢大衣的故事

——纪念刘志丹将军

高赛峰

我的父亲高维嵩早年参加革命时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陕甘人民的革命领袖刘志丹部队中的一名战士。听爸爸说，在1935年夜间行军时，由于天气寒冷，军服缺乏，他披着被子走在队伍中，正好刘志丹同志经过他身边，马上将身穿的一件黄呢子大衣（也是刚刚缴获敌人的军大衣）给爸爸穿上，并且笑着说：“你个头大，穿上正合适，留下做个纪念吧。”刘志丹的爱兵行动给他留下极深刻的记忆，在他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将这种爱兵精神传承下来。他对部队的干部战士视为亲兄弟，关心倍至，爱护有加，受到广大指战员的好评和爱戴。

为怀念刘志丹将军，我的父亲将这件大衣一直保存下来，打仗搬迁什么东西都可以丢，但就是这件刘志丹送给他的大衣一直保存完好。革命胜利后交给延安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展览至今。

高维嵩(1916——1985)陕西省安定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陕北红军，历任共青团安定县委书记，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营教导员、红三十军二六三团政委，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团政委，第一野战军师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青海省军区、陕西省军区政委，兰州军区副政委。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九大中央委员、十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幅挽幛的历史追踪

——记刘志丹与刘林圃的革命情谊

郭 林

刘志丹将军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那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高尚品德，善于团结、机敏睿智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可以说，刘志丹将军是一位集忠诚与智慧、豪情与胆识、刚毅与柔情于一身的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他所以深受人们爱戴，除了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更多的是从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感人至深的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对同志和亲人的无私大爱、深厚情谊和侠骨柔情。我这里所要记述的是刘志丹与刘林圃两位烈士之间的一段感人故事。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刘志丹将军为纪念刘林圃烈士牺牲一周年而亲笔提写在三块白布上的两幅挽幛。展柜里两幅挽幛并排陈列。上幅书：英雄志向实伟大；下幅书：勇气流血最光荣。上款题：刘林圃同志永垂不朽。下款落：一九三三年刘志丹敬挽。中幅书：英勇就义。上款题：刘林圃同志一周纪念下款落：渭北武字区全体刘志丹敬挽。

虽然白布陈旧，有的字迹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但将军那饱蘸墨汁、刚劲有力又显峻秀的笔迹，既显出历史的苍凉更映出作者饱含真情的内心，使参观者心中为之感动。这是目前发现的由刘志丹同时题写的唯一两幅挽幛，也是他留字最多的墨宝。它既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两位烈士真挚友情的见证。

刘志丹与刘林圃之间有着怎样的过往？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题写下的这幅挽幛呢？这要从刘林圃的革命经历和陕甘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1932年说起。

刘林圃是陕西耀县刘家河人，1909年出生，1932年9月牺牲。他16岁参加国民军，北伐期间考入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在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辗转于唐山、平津一带秘密进行兵运工作。在天津时认识了谢子长，并曾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工作。1930年，在平津地区组织群众斗争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敌人的刑讯逼供无果，他被关押11个月后释放。1931年春夏，刘林圃回到家乡，在老同学张仲良、杨再泉的介绍下，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遂在耀县活动。这时刘林圃不仅学习了军事，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学会了英、俄两种语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刘林圃愤恨不已，奋笔写下了《满洲问题与中国》一文，倾吐爱国之心，探寻救国之路。现在这篇文稿作为烈士遗文保持在陕西省档案馆。

1931年，正是刘志丹积极组织兵运之时，并于秋季在合水县太白镇倒水湾，建立起陕甘边地区由中共组织独立领导的第一支红色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同年底，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合水县林锦庙一带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6日，发生了三嘉塬事件。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这时暂时离开，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就在西北反帝同盟军组建不久，1932年1月间，刘林圃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曾到正宁县三嘉塬同盟军驻地住了几天，认识了刘志丹等人。刘林圃是一个正直且爱动脑子思考问题的人，他敏锐地发现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三嘉塬回到耀县后，他给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建议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他将《意见书》交给耀县特支书记张仲良，张仲良看了后认为很有价值，遂转交渭北特委，请特委转中共陕西省委。1932年农历三十，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到耀县石人小学见到张仲良时说，刘林圃的意见书写的很好，并

与刘林圃见面交谈。此后，刘林圃被调到陕西省委任军委常委。

这时，也正是刘志丹到省委汇报工作的期间。刘林圃热情接待向省委和省军委汇报工作的刘志丹，十分关心陕甘游击队的建设，协助省委选派干部充实部队，多次派人给游击队送文件、情报及物资，帮助部队解决困难。刘志丹与刘林圃同为黄埔军校培养的革命军人，同样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和兵运工作的艰辛，他们由相识到相熟，结下了战友情谊。不久，刘林圃于3月下旬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赴陕西凤县与甘肃两当县，与隐蔽在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习仲勋等同志汇合，准备发动革命兵变。

1932年4月1日，这支部队换防走到两当县。傍晚，中共营党委书记习仲勋秘密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于当天晚上12时发动兵暴。在刘林圃、习仲勋指挥下，经过局部战斗，拂晓，起义部队200多人沿广香河北上到达太阳寺休息。在这里，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继续北上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同时宣布了干部任命。刘林圃任第五支队政委，习仲勋任队党委书记，许天杰任支队长，我父亲吕剑人任一连连长。

“两当兵变”是由中共组织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革命起义，也是甘肃兵运史上第一次武装行动，它震慑了陕甘两省的国民党当局，在两年多的兵运工作中宣传了群众，教育了士兵，锻炼出一批共产党员骨干力量，策应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开展，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时，刘志丹正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在陕西礼泉、乾县、永寿一带作战，并准备接应起义部队。不幸，由于敌人正规军和地方民团的尾追堵截，起义部队在深山老林里经过十多次战斗，艰难行军数百里，在行进到麟游县岳御寺时，遭到当地大土匪的围击，起义部队被打散，受挫失败，没能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

1932年5月初，刘林圃与吕剑人辗转回到乾县西天堡吕的老家。第二

天，刘林圃换装后，即赴西安到陕西省委汇报。9月的一天，刘林圃在北大街被兵变部队的一个副班长马腾云认出出卖。敌人把他逮捕后关押到国民党陕西第一监狱，虽遭受到严刑折磨，但他始终英勇不屈，三天后，在西安习武园刑场英勇牺牲，时年23岁。在押往刑场的途中，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员为真理而献身的高尚气节。我父亲也于当年5月中旬，在西安准备与省委接头期间被敌人逮捕，先判死刑，后经组织营救和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的帮助，以“兵变协从罪”，判处十年徒刑，也关押在第一监狱，与刘林圃隔几间牢房。他们在狱中相见，相互鼓励。父亲亲眼目睹了刘林圃被押出牢房时大义凛然的形象：他神情自若，站起身，放下手中正在写的诗稿，向大家挥挥手，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狱中战友群情激愤，为烈士举行了悼念活动。

1933年6月下旬，在杜衡“左”倾路线的错误决定下，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在强敌“围剿”下于蓝田流峪口遭受重大挫折。刘志丹等分别突围，在秦岭山中转战两月余，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刘志丹才与王世泰等人会合。8月渭北地下党在箭峪后沟找到他们，这才走出大山，先到渭南休息，后绕道蒲城、洛川、保安、正宁、耀县等十县，于10月4日回到照金薛家寨。

就在这途中，经过耀县时，刘志丹一行专程来到刘林圃家中探望慰问，并写下了上述的挽幛，深切悼念这位相识不久就英勇就义的同志和战友。刘志丹高度赞扬刘林圃是有着伟大志向的人民英雄，他勇于流血牺牲的无畏气概，光照千秋。刘志丹在挽幛上两次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深深表达敬佩之意和怀念之情。而令人更慨叹不已，倍感痛惜的是，仅时隔两年半，刘志丹将军壮烈牺牲在东征前线，为党、为人民、为中华民族慷慨捐躯，树立起人民英雄的又一座丰碑。刘志丹和刘林圃两位烈士相会在马克思面前。

刘志丹对刘林圃的深情厚谊，只是刘志丹战友情深的一个事例，他对同志、战友和亲人的无私大爱是感天动地说不尽的。在纪念革命先烈刘志

丹将军诞辰 110 周年的日子里，述说他与父辈的故事，就是要学习、传承他矢志不渝、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密切联系群众、脚踏实地的优良作风和光明磊落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永远以他为榜样做人做事。

吕剑人(1908——2002)陕西省乾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陕西省委交通站站长、团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华县县委书记。1930 年至 1932 年在国民党十七路军中进行兵运工作，参与组织了由习仲勋、刘林圃领导的“两当兵变”。1932 年 5 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直至 1936 年 5 月出狱。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联络员、陕西省工委统战部部长，中共西府地委书记、西府总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宝鸡地委书记、中共新疆分局常委、统战部长，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是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

永远的记忆

朱 红

在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10 周年之际，深切缅怀，无限思念、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刘志丹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陕西的革命领袖之一。他和战友们领导和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和出发地，为党和人民，为建立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我的父亲朱开铨(省长级)、母亲罗培兰在陕甘边革命时期在刘志丹同志身边工作，并和他的家人战斗、生活在一起。深感他们忠诚党的事业，坚持实事求是，为老百姓、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全国解放后，在江西工作的我们的父母亲，非常怀念战争年代在陕甘根据地和延安时期的那些老战友、老百姓和“老刘”、“刘大嫂”、“贞娃”、“南梁”、“三孔窑洞”、“红二十六军”等等。他们在有生之年将亲身经历的这些有关西北根据地的战斗回忆经常对我们子女讲述。

妈妈罗培兰(1935 年加入共青团，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说：“1934 年夏加入红二十六军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到南梁政府时，窑洞里正在开会。仲勋正在窑洞跟前与我谈话，这时，窑洞里走出了一个人，手里拿着旱烟，边走边说，‘听说来了一个女红军，就是你嘛？哪里人？’我母亲说：‘老家是关中乾县的。’他和仲勋说了几句话，又进窑洞开会去了。仲勋告诉我：‘他就是老刘’。当天还见到了志丹同志的夫人刘大嫂和四岁的女儿‘贞娃’”。从此，在南梁政府，她们一起开展妇女工作。并得到他们在政治上的爱护、支持，生活上的无私援助，共同渡过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也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爸爸妈妈回忆：1935 年 9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视下，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陕甘边的领导干部被释放。妈妈

说：“刘志丹对她讲：是中央救了陕甘，救了根据地，救了同志们，我们要感谢中央和毛主席，注意团结，在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妈妈深情地说：“老刘党性强，时刻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父亲朱开铨，1901年9月18日出生在江西瑞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巡视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五局特派员，遵义委员会委员等。1935年9月18日，到达吴起镇，与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一起工作、战斗、生活。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副主席职务，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36年，经组织介绍与我母亲罗培兰（时任陕甘省政府民政科长、红二十六军女干部，曾在南梁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妇女工作，任过郿县妇女主任）结婚，相濡以沫60载。

爸爸妈妈在战争年代，与刘志丹、习仲勋、同桂荣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父辈的情感正在一代一代的延续着。今年我们做子女的，正筹备出版母亲罗培兰回忆录。力贞大姐得知后，深情地题写：“红二十六军优秀妇女干部罗培兰。晚辈刘力贞”，“瑞金南梁后人。刘力贞”以示祝贺。

光荣的历史，深切的回忆，鼓舞着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国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忘我奋斗。

罗培兰（1915——1995）女，陕西省乾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妇女代表、内务部民政科长，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副科长、陇东专员公署科长。解放战争中在中原人民政府军管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江西瑞金专署、宁都专署科长。1953年后，在江西省民政厅、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971年离休。

父亲敬仰刘志丹

孙晓东

1933年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陕西地下党与中央几乎失去联系，大家心急如焚。尤其是1935年9、10月间，原本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陕甘北地区的革命形势，由于“左”倾错误“肃反”的干扰已濒临险境，刘志丹等一批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被整肃关押，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错误“肃反”，保住了革命根据地，使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大家心潮澎湃，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1936年6月底，我父亲孙作宾应邀与孙蔚如见面。受孙蔚如将军之托，肩负临时省委之命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经过几天跋涉，到达了红区，当走到陕北的山坳里时，父亲听到一段歌声：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一个刘志丹……二月里来刮春风，刘志丹跟的是毛泽东……男当红军女宣传，裤腿褊在大腿弯，一心要抗战……

听着嘹亮的歌声，品着其中的真情，父亲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刘志丹的敬仰和爱戴，为之振奋。父亲晚年时曾对我们讲，他当时听到老百姓对刘志丹这种发自肺腑的歌颂后心想：人民群众对刘志丹这么爱戴，说明刘志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革命领袖人物，他为革命队伍中有这样的英杰非常自豪和骄傲。因此更坚信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后来说到刘志丹同志年仅33岁就牺牲时，父亲不禁潸然泪下。我父亲虽未有与刘志丹谋面之幸，但他从习仲勋、赵伯平、张秀山、李濂（黄埔军校四期学生）、马豫章、杜俊杰、张毅忱、牛化东、杜鸿范等同志口中知道刘志丹是黄埔四期学生，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在干部和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正是由于有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不懈坚持、正确指挥和领导，才使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归于失败，为中国革命创建了这么一块硕果仅存的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根据地。1935年10月，

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落脚在这片土地上，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刘志丹坚决服从党中央、维护党中央，批评错误路线的同时，劝慰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充分展现了革命领袖顾全大局的风范。

山坳里的歌声并非表演、也无观众，更不是为了赢得掌声，而是人民群众对革命领导人的发自肺腑的崇敬和爱戴。

在党中央所在地保安，我父亲先后向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罗迈(李维汉)等汇报了有关情况，带着毛主席写给孙蔚如的信和中央文件回到西安。

孙作宾(1909——2002)陕西省西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十八军中共军委书记、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甘肃工委书记、甘宁工委书记、陇南特委书记、陇东特委代理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咏赞刘志丹先烈

赵秦胜

(一)

志为工农死，
丹心可对天。
将士齐奋勇，
军威立陕甘。

(二)

百姓呼青天，
世代歌相传。
功高盞日月，
勋绩满秦关。

(作者系赵伯平之孙)

纪念刘志丹诞辰 110 周年

——记父亲刘培基几则难忘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刘玉兰

人们都知道，“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刘志丹，但对其父亲知之甚少，在今天纪念刘志丹诞辰的日子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他的父亲刘培基先生，看看他是如何影响刘志丹的成长和支持他的革命事业的。

一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边远山区更是一片混乱，土匪横行，山贼趁乱打劫，人心惶恐不安，民不聊生。地方恶势力、县官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此情此景让父亲刘培基和乡间一些有志之士担忧和不满，常常在一起讨论天下不平事，百姓怎么办？

1919年，保安县(今志丹县)西上区百姓推举父亲为代表，他联名乡间十几名秀才、举人、开明绅士商议要到县衙门请愿，要求县官王崇寿减免税捐。祖父刘士杰支持儿子正义之举，写了状纸，列举了王崇寿的八大罪状到县衙请愿。十六岁的大哥刘志丹和他们同学、乡里的玩伴一起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到请愿行列中去。榆林道台镇守使井岳秀接到请愿书后，将王崇寿革职，派自己的亲信周某某上任。消息传开后，民众拍手称快，都夸刘培基勇敢，有本事，为民请命为民除了害，出了气。但是，好景不长，王崇寿利用亲属张凤翔在首府的影响，将案件在省城翻了过来，反诬陷父亲刘培基“聚众闹事，对抗官府，图谋造反”。官府到处缉拿他，父亲无奈何不敢在家待，四处躲藏不能露面。祖父出面让人帮助协调，官府放出话来要一千两银子了事，被逼无奈，父亲同祖父商量卖掉金汤街上的商铺，又将三姐卖给长她十几岁的二婚男子为妻，才凑出八百两银子了结此事，家中也因此倾家荡产。直到晚年，说起此事父亲感到十分内疚，感到对不

起三姐。经过此次打击，父亲刘培基对世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天下无理可言，无公道可讲，百姓无人保护，只有任人盘剥，父亲慢慢明白了什么叫“官逼民反”，也激发了他奋起反抗的决心。

二

1923年7月份，在榆林上学的大哥志丹放暑假回到家里，父子俩谈起时事，充满了忧虑与愤恨。大哥对父亲讲外面的形势，说道城里人被逼的活不下去了，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搞罢工、罢市、闹学潮。父亲得到启发，他说：那咱们也搞罢农、罢牧，看他官府如何收税捐！在乡亲们和大哥的鼓励和支持下，父亲出面游说乡亲们，又带头鼓励乡亲们集体抗捐税，在西川发起了声势不小的“交农运动”。看到乡亲们的抗税热情，十三岁的二哥景范也跟上乡亲们行动起来，乡亲们罢种、罢养，把农具交到县府。周边的乡亲们听说西川闹“交农”，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在保安县农潮一浪高过一浪。他们聚集了二、三百民众到县上，将县衙包围了四五天，县官不敢出来见民众，被迫让人出面说和，答应减农杂税，免一年羊头税，乡亲们胜利了，个个欢欣鼓舞，直夸刘先生有本事，为乡亲们办了件好事，父亲的威望在家乡愈来愈高。

三

二十世纪初年，陕甘一带土匪、乡霸、山贼横行，政府贪腐无能，百姓遭殃，怨声载道。1923年秋冬，父亲刘培基为保境安民，取得乡间有识之士的支持，倡议建立了“西上区乡民自卫团”。乡亲们积极响应，自愿参加，出力的出力，出资的出资，父亲四处筹钱，自己出钱买回八条长枪作为自卫团的武器，大家推举父亲当团总，于是父亲又多了一个头衔。他带领自卫团铲除匪患、盗贼，保卫家乡平安，自卫团纯粹是民众的自卫组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家乡平安，维护乡间正常秩序，让百姓过上安定

的日子。乡亲们都认为刘培基又为民众办了一桩好事，得到乡亲们的拥护和支持，那是很自然的事。

1926年，民国政府招安了绥远省包头的惯匪赵立成，先驻扎在金汤镇，后来他打着国军旗号移驻保安，其所部均为骑兵，有二个营的兵力，当地人叫他们“马二营”。这支队伍无军纪可言，匪性不改，白天回营盘，晚上出来放抢，在上下川道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们纷纷求助于祖父刘士杰。他们历数赵的罪恶，将状纸呈递到榆林道台镇守使井岳秀手中。井岳秀怕马二营的罪恶引发民愤闹事，遂下令安边地方民团张鸿儒前往清剿。因赵立成的“马二营”打的是官军旗号，一般民团对他无可奈何。当时父亲刘培基的乡民自卫团已被安边地方民团收编为骑兵二连。张鸿儒耍滑头，将任务交给了父亲的骑兵二连，让他们去拼杀，借此削弱他们的力量，父亲不得不奉命清剿。父亲因为是保安人，熟悉地形、地貌、民情，乡亲们又信任他、拥戴他。那天，天下大雨，将“马二营”两个连的兵力隔在了洛河对岸，父亲看到这个有利时机，说道：“天助我也！”于是，率部在乡亲们的齐力协助下，抓住有利战机，一举歼灭了“马二营”这伙土匪，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马匹、物资，百姓齐声称快，一时间骑兵二连名声大震。但就在这时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尤其是张家父子(张鸿儒、张廷芝)的担忧，担心骑兵连实力壮大。不久，张鸿儒果然巧妙的夺了他的兵权，给他了一个挂名的“副官”。从此，父亲又多了一个“刘老副官”的头衔。

就在他“升官”后不久，他便带上母亲和四哥景星(四喜子)到榆林、神木、府谷转转看看，还参观了神木地毯厂、烧酒厂等作坊，了解其生产状况和工人工作生活情况。有一天，父亲一行人在去神木的路上，遇见一件怪事，令他十分气愤。在集市上，几个官兵硬让赶集的农民交税，农民因为驴还没有卖掉，无钱交税，只见官兵抡起棍子就打，打的农民双手抱头四处乱窜。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厉声喝道：“住手，为什么打人？”官兵一看是当官的，立即停手。父亲问农民缘由，农民回答说：“交不起税就

狠狠的打，打的你受不了，你人就跑了，你的牲口就成了他们的……”父亲听到这里，怒斥官兵：“你们咋像土匪一样，大白天抢人。”这一幕幕的情景使他更进一步的认识到官府腐败无能，必然官逼民反的道理，也更加了解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令父亲为无助的老百姓担忧，也进一步意识到时局必定要变。

四

1920年夏，大哥志丹(景桂)的几个永宁山小学的同学曹力如、王子宜等要去老榆林中学，他们满怀信心也鼓励大哥一起报考榆林中学。榆林中学当时在陕北，乃至整个陕西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中学，不是一般人能考上的。校长杜斌丞先生是位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在陕西教育界是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教学有方，最早在陕北传播马克思主义，支持发展党的组织，魏野畴、李子洲、王懋廷、呼延东等共产党员，都是校长亲自从北京请来的。他们给榆林中学乃至陕北大地带来了新思想、新风气和新风尚。大哥当然盼望考上榆中，其实凭他的实力和品行应该可以考上。他信心十足，满心欢喜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可是父亲没有答应，让他十分沮丧难过。父亲当时考虑的是全家如何渡过眼前的生活困境。一则，大哥的母亲刚刚不幸去世，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家中留下一堆娃娃，还有年事已高的祖父母，家中只有十岁的二哥是男丁，谁来照顾这个家？二则，父亲经常外出打拼，无暇照顾家里农活和其他事物，即便是与人家合伙种地，或者雇帮工干活，也需要一个主事的人操心、指拨才行。考虑到诸多原因，父亲还是挽留他在家料理家事，毕竟他已经是十七岁的男人了，应该顶上事了。大哥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对家里的事都不在意，但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和对家庭的责任，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把上榆林中学的事压在心里，可经常闷闷不乐。一晃半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春上，父亲觉察到大哥还是想上学，父亲讲到留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孩子有他的远大理想，就让他去吧！于是，同意他报考榆林中学，大哥这下高兴了，那种欣喜的样子

无以言表。父亲叫大哥和二哥兄弟二人赶上毛驴，驮上羊毛和羊皮，到集市上卖掉，给大哥筹集学费盘缠，送他去上他梦寐以求的榆林中学。大哥一去就考上了榆中，因为插班与王子宜成为了同班同学，大哥让王子宜帮助他补数学课，王子宜谦虚，让大哥帮助他补语文课，他们在学习上、思想品德上，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大哥下定决心一定要认真读书学习，广泛团结同学，热心公益事业，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校期间曾写了一首《爱国歌》，全文如下：

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
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
救我中华万万年。

五

1929年(民国十八年)，父亲辞去“副官”回家务农。身居农家小院，不忘关心时局的发展变化，更是关心志丹、景范两个儿子的命运，心疼儿子常常为他们担忧。他清醒的意识到大哥和他们的战友的生命危险和事业艰辛。看到大哥和战友们对革命忠诚，对事业执着，是真正的“提着脑袋干革命”，这种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令老父亲感动不已。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有正义感的人，也有过不平常的革命举动，反抗过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现在看到大哥他们发动民众与反动统治作斗争，决心推翻反动政权，是正义之举、伟大之举。但父亲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革命之路是多么的漫长与艰辛，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甚至牺牲生命才能成功。父子二人对时事的看法相同，都看到了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搜刮民脂民膏，腐败堕落，老百姓反过来还要养活庞大的反动官僚机构、军队和警察，百姓无任何权力可言。这样反动无能的政府不打到它还待何时？

父亲也担心大哥他们势单力薄，与对手力量悬殊，怕出问题，懂乱子，

给自己和家人找来杀身之祸，遂告诫大哥：“蛇之将死，其毒未尽，国民政府虽腐败无能，但毕竟有军队、警察、保安团、地方势力支撑着，不容易一下打倒，这是一个漫长的斗争”。当时局紧张和大哥被拘押时，父亲为儿子的性命担忧，经常夜不能寐，食不味甘，常常一个人坐在炕上闷闷不语，一锅一锅的抽着旱烟，时而长吁短叹。母亲看到父亲为儿子揪心，常常为他宽心：“不要怕，好人天地宽，他们都大了，你的儿子你知道，啥都解下哩(方言：解发嗨音，下发哈音，’明白、懂的意思)，你放心不用愁。”事实上大哥也因为自己的行为连累父母、连累家人而感到不安，他常常是在深夜悄悄回家，天不亮的时候又走了，以躲避敌人的监视和抓捕。每次回来，父亲看到他消瘦的身体，胡子拉碴的，精神紧绷，父亲就心疼不已，不时地提醒他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大哥是个大孝子，他完全理解老人的心情，他常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让老人家放心、安心，不能在家尽孝道，反让老人替我担惊受怕，我真是不孝呀。”为了减轻父母的担忧，不管多晚都要和父亲交谈，讲述党组织和队伍的发展状况，告诉父亲党的宗旨，说党有坚实的民众基础，广泛的民众支持，让父亲放心。他说：“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严明的组织原则，铁一般的纪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推翻压在劳苦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我们的宗旨，建立民主政权是我们的目标，让民众得解放，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娃娃们有学上是我们的理想……”。

通过多次的交谈，父亲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自己年青时的愿望吗？意识到这个愿望将在儿子这一代手中实现，他感到万分的欣慰。时常对家人讲：“来生子(刘志丹乳名)做的是大事，我们都要帮衬他。”也对大哥讲：“你做的事情是为国为民谋福祉的大事情，对着哩，你自己多注意安全就是了。”父亲决定卖牛卖羊支持大哥，给他们队伍上购买枪支弹药，他把从民团带回来的枪支弹药全部送给了红军，还有两只自己心爱的小手枪也给了大哥让他防身用。家里的草料粮食，只要部队需要尽管来拉。父亲想多给红军做些事，给大哥他们多些帮助，但也要考虑周边的环境和敌情。有一次，

张策等同志来家里拉粮食和草料给部队，临走时，父亲叫张策将自己反绑起来放在硷畔上，等同志们走远了，他便大叫：“来人呀，救命啊！”，这实际上是给外人看的，家里人都躲在大门里面偷着笑，笑父亲的办法妙。

楼子沟地处偏远山区、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不易受外界注意和知晓，自然就成了同志们的联络站。二哥景范住的上窑、羊圈的地窖子都有暗道通向后山和脑畔，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撤退。这里变成大哥及其战友如王子宜、马锡五、张策、王四海、赵耀先、王世泰、刘约三、王耀华、赵子实、白冠五等同志开会、养伤、藏身的地方。1929年谢子长同志来家里养伤，和大哥他们开会研究工作都不止一次到过楼子沟，父亲都接纳他们，尽一切招待他们，母亲和嫂子们做饭洗衣服，照料他们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1936年大哥牺牲后，秋天，习仲勋等同志专门来楼子沟家里看望父亲，在下院大窑里住了一夜，与父亲长谈，安慰道：“干大(干爹的意思)你放心，志丹不在了，我们就是你的儿子，一定会关心照顾你的，有啥事你尽管找我。”仲勋带来了慰问金、白糖、点心和一套毛衣等衣物。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送仲勋到大门外，一直看着他们走远了，父亲忍不住放声痛哭了一场，释放了压在心底的痛楚。

六

1936年4月大哥牺牲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永远纪念刘志丹。1939年，在志丹县选举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代表时，父亲刘培基被选为议员，后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大会，但参议员们仍然选举父亲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父亲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代表党中央向他表示慰问，邀请他共进晚餐，席间谈古论今，气氛非常好。父亲即兴赋小诗一首：“中央到陕北，边区大变样。陕北好地方，物丰人也强。军民齐动员，敢叫日月换新天。”大家齐夸父亲的诗好，父亲说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新体诗还在学习。

大哥的战友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王世泰、曹力如、马锡五、王子宜、张策、赵伯平、张邦英等也经常来看望他，嘘寒问暖，让父亲感到温暖。

1941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和1946年4月召开的第三届参议会父亲都参加了，并且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父亲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烈属双重身份当选的，享受公职待遇，配备服务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认真履行参议员的职责。在两届参议会召开前，他都在乡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会议期间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提案。如：1941年11月提出《发展商业案》；1944年10月，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十一次联席会有关经济建设的提案中提出《为提倡植树造林案》《提议对植树造林应加注意案》。在这两个议案中，他建议政府规定每人每年植树一株，负责存活，赏罚分明。还提出植树管理的具体办法，强调政府每年要加强绿化宣传，大力宣传绿化对水土保持、对空气和对人的好处，同时建议建立督促检查方法，使之落到实处，确保植树造林有成效，造福民众。为确保植树成活，对植树保活的人家个人要奖励；对破坏植树的人要批评教育以至于处罚。

在有关文化建设提案中，他着重讲述了提高人们对文化教育的认识和应有的方法，建议充分利用识字班、读书组、夜校等方式，更广泛的结合青年农民，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在方法上可以形式多样，可以用排秧歌、演小戏等多种方法，使民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在他提出的《为发展国民教育案》中，强调小学教育是民众的基础教育，尤为重要，应推广民办公助，更为广泛的开展，切合农村实际，效果会更好；强调教育是为民众教育子女，为国家培养人才；强调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师资教学水平是提高教育水平的保证；边远山区政府应派公办老师；大力提倡尊师重教之风。他还提出了《提议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地区普遍创办“轮学”案》。“轮学”就是轮流设点上课，以此解决更多偏远地方的青年农民、孩子们的受教育问题。这一提案，充分的说明了父亲重视教育、爱民如子的思想，生怕他们将来成为文盲和无知识无文化的“粗

人”，而应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家庭的顶梁柱，对国家对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看到陕北教育落后，不识字的人还很多，深感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故而，一有机会，他都会大声呼吁重视教育，普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这也是父亲的亲身体验。他传承了“耕读传家”的家风，身居偏远小山村，考中秀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做人做事都得益于受教育。他还提出《为推广医药卫生以利减少人民疾病与死亡案》。在陕北绝大多数农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们普遍没有卫生常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也不接受新的卫生观念，一切都按老习惯、老办法，得了疾病实在扛不住就找江湖郎中，往往耽误病情。尤其是妇女处于封建传统观念下，有些病难以启齿，更是误事。为此，父亲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边远地区医疗机构，印发卫生手册，广泛的宣传卫生常识和培养基层卫生人员。这些提案在参议会得到通过，并作为草案试行。父亲真的了不得，近七十年前就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建议，真的太伟大了！在1946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上，他还联合其他人提出了《实行调剂土地案》《禁止买卖婚姻案》《请求拨济志丹、吴旗、靖边等县灾荒案》和《普及医药卫生案》。在此提案中特别强调妇女卫生，确保妇女儿童的健康，因为这就是关心国家的未来，父亲非常有远见。说实话，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一些边远地区还是没有像样的医疗机构和公派医务人员。

七十年前，父亲刘培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两次边区参议会上，信心满满地提出了议案，许多议案都是立足于解决民众生活的实际问题，符合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是他从青年时代起一贯为民解忧排难思想和主张的体现，尤其是绿化山川和解决妇女儿童健康的提案，更是超前，非常的难能可贵，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说明老人家是位有深厚文化素养、有智慧、有思想的爱国爱民且很有远见卓识的爱国人士。关于他在参议会上的提案和每次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都保存在陕西省档案馆内，成为了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物。

父亲是位饱经风霜、不屈不挠、可敬可爱的老人，他的一生是艰难坎坷、勤劳智慧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大哥刘志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父亲同样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家人，我们为有“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大哥而自豪，为有可亲可敬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而骄傲。

关于我的父亲、我们的大家庭，还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因篇幅有限就此搁笔，欢迎大家批评指正。